炎黄春秋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507 刊号:CN11—2817/K

1984年1月邓小平听取袁庚汇报

萧克 费孝通 程思远谈
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于光远:一次党内高层真正民主的会议

文化发展方向上要不要强调民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 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

启动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的袁庚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的产物

打"老虎"除"五毒"激流中的民主人士

郭琇:成也"三疏",败也"三疏"

7
1998
总第76期

■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全景

■ 萧克（中）、费孝通（右）、程思远（左）在主席台上

■ 会场一角

■ 萧克第一会长与顾问雷洁琼亲切握手

炎黄春秋

专 稿

2 萧克、费孝通、程思远、谈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

4 一次党内高层真正民主的会议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
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于光远

8 文化发展方向上要不要强调民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曾彦修

春 秋 笔

11 启动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的袁庚………鞠天相

19 毛主席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杨奎松

求 实 篇

25 “三反”“五反”激流中的民主人士……………庞 松

31 我所知道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张培森

殒 星 篇

38 周恩来赴沪迎接李宗仁…………………………高建中

44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穆 欣

49 彭雪枫与《拂晓报》、拂晓剧团…………………王申红

文 荟 苑

52 说“我前世一定是中国人”的泰戈尔…………刘作忠

58 听吴作人先生谈艺………………………………刘大为

60 将军吟
——拜读《萧克回忆录》,成散曲一组,申敬仰之意……李沥青

遗 闻 录

62 孔宋违法结购外汇案五十年后曝光…………郑会欣

时 代 风

66 矢志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刘正夫

古 今 谈

71 郭琇:成也“三疏”败也“三疏”………………肖 冰

古 镜 台

75 放眼世界、革故鼎新的洪仁玕…………………邱远猷

信 息 窗

78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在京举行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茹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藏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ONII - 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刊号:
ISSNI003 - 1170
社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64031144转2191或2004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 - 507
订购处:全国国际国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 80元

传统文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历史使命

● 萧 克

今天，我能和大家到这里聚会，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我谈一点想法，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文化究竟负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也就是说，信息、科学、技术的生产、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未来国家、区域以及世界竞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将是知识生产和创新体系的竞争、高科技生产和创新体系的竞争、知识和信息传播与应用体系的竞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潮流，我们当然要勇敢地迎上去，发展知识经济，利用知识经济来造福国家，造福人类。同时，在这种挑战和机遇面前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还应当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做些什么工作，这对于我们从事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社会团体来说，是一种责任。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奋斗，起先是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中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将继续是我们的工作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也一定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传统，将激励我们在知识经济时代抓住时机，重振我泱泱大国的雄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献身的传统，将激励我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华民族亲和团结的传统，将激励我们共同把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能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充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也关系到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未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其自身的价值和目标，应当是引导人们努力追求真、善、美，将科学精神、道德精神、艺术精神融合为一体，使人实现真正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了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把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发展与知识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将更有利于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

这些问题，我想的还很不成熟。请大家一起来思考，来讨论。我们的研究会要办推动文化发展的各种实事，更要引导大家关注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团结奋斗，

弘扬优秀传统，实现“文化自觉”

● 费孝通

今天，与这么多老同志、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我感到很高兴。

继承、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我们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五千年来，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说的炎黄文化，就是以炎帝、黄帝为象征，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从我的认识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源远流长而始终未曾间断。很明显，着力研究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十分有益的。

当今世界，是经济趋向一体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的格局。这就为我们思考文化问题提出了新课题。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振兴的新时期。这样的好局面，更加重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责任和使命。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一大任务，就是跨文化交流。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前景。我们中国人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占据主动地位，首先需要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实现“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才谈得到让人家来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我们有责任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建设现代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成立七年来，从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建设国家和完成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我希望在第二届理事会任期内，在研究、发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方面，做更多的实事，取得更大的成绩。

为弘扬中华文化开拓新局面

● 程思远

今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全体理事会在这里召开，我们大家躬逢其盛，十分高兴。首先请允许我向全国各地前来出席会议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这一次盛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黄文化即中华文化。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文化渊远源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成为增强中华民族牢不可破的凝聚力量。而研究中华文化，让全世界了解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则又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会的中心任务。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七年来，依靠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工作正在顺利开展：一系列的学术研讨活动，推动着炎黄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炎黄春秋》杂志办得很好，越办越好；炎黄二帝巨型塑像已在郑州的黄河之滨兴建始基，资金筹措也在积极进行。我们第二届理事会任期正处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一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久经患难，历尽沧桑，中华儿女乘时奋起，浴血战斗，战果辉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97年香港回归，接着明年澳门回归，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转折点，展望前途，一片光明。深望本会各位理事以及全体工作同志，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广泛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为祖国强盛和民族振兴贡献力量。

党内高层一次真正民主的会议

——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王惠德和我的三次联合发言

● 于光远

今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二十周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使这个年底召开的以农业为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转为对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的会议，并为稍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这两次会议为我国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举行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会为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召开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个会上做出的，因而这个会与三中全会是联在一起的。邓小平在这个会的闭幕式上所作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此，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活动，一定要把这个会包括在内。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惠德分在一个小组，我们三人曾在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言。现在，他们俩人都已先后作古，我对他们十分怀念，这篇文章也算对这两位老朋友一个缅怀的纪念吧！

这次工作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人有两百多；规格也很高，十一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到会，现在常说的“三副两高”中的党员和军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第一把手，以及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第一把手也都到会。两百多与会者中，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占三分之二，占十一大当选者百分之四十多，另外还有七十多与会者不是中央委员，其中有十一大开会时还没有彻底平反的老中委，如习仲勋、宋任穷这样的老同志，还有曾涛、胡绩伟、杨西光、王惠德等比较年轻的同志。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思想解放，充分发扬民主，既不限制发言时间和次数，又不限制发言范围。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一共开了36天。会议的内容大大突破了原先提出的讨论农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继续平反老同志冤假错案的问题；中央机关的人事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工作会议闭幕后，休息三天，从12月18日到22日又开了五天会，即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西光和我一同分在西北组。这个组的召集人是胡耀邦、汪锋和霍士廉。组员除我和杨西光外，还有王惠德和江一真。

在这次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和杨西光、王惠德一起有过三次联合发

言。第一次发言是在11月13日，由我主讲，内容是就天安门事件，讲充分发扬民主的必要性。我们在发言中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一定要谈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有相应的改变。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在这里，有一个观点应该在党内明确，那就是我们党在成了执政党之后，仍然应该站在人民群众之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不等于争取民主的任务完成。正好相反，在我们国家中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而且今天我们的国家政权，还是列宁指出的那种'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经常受到这种或那种侵犯，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仍旧应该继续下去，而且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而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从领导群众争取民主这样的革命立场出发，党应该对天安门事件明确表态，指出它是伟大的革命事件。在'四人帮'即将动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广大群众奋不顾身地起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完全应该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执政的共产党，一方面站到群众之中，继续领导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夺取了的政权，去保障人民的民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配合群众自身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把这两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运用国家政权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做的一件大事。这样我们就要加强社会主义的司法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过应该指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民主，法律如果不是在人民群众斗争中产生，不是经过民主程序来制定，它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充分重视和充分信任。如果法律不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制定出来，不充分反映民主，它就未见得能够真正实施，并且很容易受到破坏。"

在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前的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小组的发言中，就讲到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一次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看到简报上陈云同志的发言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研究，决定做一个联合发言，目的有两个，一是响应陈云同志，二是就这个事件谈我党充分发扬民主的意义。王惠德对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言论作过系统的研究，那句'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的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场

是他背出来的。杨西光和我认为，列宁这句话是个一般真理，并且特别符合我国的实际。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发言要讲的内容定下来了。当然，这个发言不止上面所讲的内容，其中我们还引用了社科院法制研究组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由中央政法小组起草法律的文章的批评，还讲了必须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办法和对康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杨西光的消息很多，在准备这次联合发言时，他讲了不少的情况，使得我们这个发言生动而具体。

第二次联合发言，王惠德没有参加，只有杨西光和我，发言的时间是在11月26日。这时，新华社关于“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消息已经发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报纸已经发表。我和杨西光想通过这件事来批判“两个凡是”，宣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时，我们感到，批判“两个凡是”，不能不对粉碎“四人帮”后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同志提出批评。他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是这个会议的领导，这时还没有人点到他的名。我和同组的江一真交换了意见，决定点名批评汪东兴。

江一真在26日上午发言。他讲道，他与汪东兴从长征到延安就在一起工作过，总的印象是好的，希望他多听听别人的批评意见。接着，江一真批评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并举了卫生界发生的一些事例。下午我和杨西光就做了个联合发言。这次联合发言由杨西光主讲，中间我插了一些话。在这个发言中我们说：“最近几个月，广大群众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最近一个时期这个问题又取得较大进展。比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广大群众用童怀周的名义，坚持不懈地宣传天安门诗文和革命行动；有些工人同志编出话剧《于无声处》；许多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迫害的英雄们报告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遭遇等。我们的宣传战线，包括报纸和《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也作了积极的配合。但是，正当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的时候，却有人在那里横加责难。我们想在这里举一件事，这就是所传张耀祠同志（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负责人，中央委员）11月3日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手头有一封《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是中央编译局几个同志写的，信中引用了张在讲话中讲到天安门事件的一段：“有人说，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火烧汽车，冲大会堂呢？‘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周总理，但也有坏人乘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这是什么话！”从这段话看，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对着群众的舆论，进行阻挠。”

杨西光接着代表他和我两人说：“说到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可以说一件事情。今年6月25日，汪副主席找宣传口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其中有这么一段：香港报纸登周总理的展览，有那张劝总理休息的大字报。第一次刊登的大字报有康老、谢富治，这次民族画报刊登时没有了。香港报纸把这两张大字报都登出来，说康生是和‘四人帮’站在一起的。这对党的团结有影响，这个关没有把好。中宣部写了材料给中央。中国人也是这样，也有人在挑。政协会上，《人民日报》的余焕春6月8日对天安门事件讲了一大篇话，认为这个案没有彻底翻过来。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这样讲不是反毛主席反谁？这个问题还要登简报。这本来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要翻，翻谁呀？余焕春说，《人民日报》在运动中揭露出大量的事实，说明‘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捣了很多鬼，这是对的。可是余焕春说，当时毛主席和政治局都受了‘四人帮’的骗，那就不对的嘛！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这能翻案吗？余焕春说，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两周年时，《人民日报》编了一个天安门诗选的专页，领导又不让登。那是攻击华主席的，怎么能登？余焕春还说，天安门这个事一定要解决，否则人民不平。他是《人民日报》记者，是个党员，不像非党员那样不了解情况，党员能这样说吗？”

杨西光在讲了汪东兴这段话后说：“不让人讲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像这次会议那样解决好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问题。”接着，杨西光讲，“除我之外，参加这次会议的张平化、

朱穆之、黄镇、曾涛、胡绩伟、熊复、张香山等同志都在场。我提出这段话的意思,也是希望汪东兴同志总结一下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中,还说了张耀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发表。但有的人说好的很,有人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表态。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张耀祠向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杨西光接着说:“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特别指出:“张耀祠讲话中说‘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的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的分量是很重的。杨西光对这些事情很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这次发言全凭事实讲话,我们表示,如我们的讲话与事实有出入,希望到会的人包括汪东兴、张耀祠出来补充与更正。

当然,这个联合发言很长,我也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的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等等。

在 12 月 14 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又做了第三次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后作的。这次由王惠德主讲。在发言中,我们除了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外,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我们说;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讲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不再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当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在阻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 6 月 15 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曾经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报纸上报道邓小平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主席的话就不精辟吗?同时,汪东兴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呀?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科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的联合发言最后指出:“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除了同我(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联合)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立下了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我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刊,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的组织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他和我们的联合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这个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

——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

● 曾彦修

延安时的毛泽东

延安时的张闻天

在59年前即1940年的延安，由党中央的两个领导人同时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

依时间先后，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毛提出的则是以向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一个十分强调“民主”，即使在解释“科学的、大众的”两个特点时，也是密切联系甚至是围绕着民主的发展而立论的；一个则几乎未涉及民主这个实际上是灵魂、核心的问题。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光辉道路与方向的杰出代言人。毛泽东对“民主”这个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果说因为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就可以不谈民主方向了，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既要解放全人类，还要社会的各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最大的真民主，怎么能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便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民主看成互不相容的呢？

但是，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一言堂早就存在了。以延安当时集中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干部、文化人于一小地而言，它恐怕是世界上文化思想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了，难道对这两个不同提法原则上的不同也看不出来么？当然不会。笔者当时正在延安，以笔者当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也明显地看出了，我问过一些当时的青年同志，也都说看出了。但都是因为不愿或不敢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提就过去了。80年代初，笔者同“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的程中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我颇为扼腕。程告诉我：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始终支持张闻天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找出《邓选》一看，果然如此！原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在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在太行山采用的是张闻天的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提法，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和佩服！

下面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1月初在延安开了一次文化盛会，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在1月5日做了一个主题报告，毛泽东于1月9日到会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当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报告的题目叫做《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最精采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一个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历史虽然已过去了59年，但这个提法的光辉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的，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顽固而普遍的存在，历史就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张闻天报告中这段精采的语言是：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成自己实践的指南……

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张闻天选集》第252—256页)

张闻天在这里响亮地提出了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一连串战斗的、常新的口号，这是对"五四"传统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对科学的、大众的这两个口号，也决不是就科学解释科学，就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解释大众化。他所解释的科学也是服从于民主要求的，所以他的科学化要求，就是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反愚昧这些内容，是服从于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总要求的。他对"大众化"的解释，更不同于很多人的解释，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局限在或者把重点全放在表现形式上，而主要是把它解释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和提出人民大众的真实要求的这些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大特征，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着重在阐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对形式问题他虽然也做了很好的解释，但在他的文章中，这终究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他着重谈的是内容，即文化发展方向的持久战略问题。当然，这是更远为重要的问题。

从张闻天上述对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特点的说明来看，它们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民主这根本重要的一条，那么，其他科学的、大众的两个要求就谈不到了。所以，张闻天提出的文化思想路线的根本精神或总精神是突出地强调民主精神和民主方向，是要把民主精神贯彻到各方面去的。这一点，张闻天的文章表达得很明白了，并不是今天替他做的新解释。

在张闻天发表这个基调报告的四天以后，即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也到大会上讲了，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而闻名于世。毛提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方向，是至今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项。这里使人感到疑问的，是未提"民主的"这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仅仅是在解释"大众化"这个特点时才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而细读毛的"大众的"这个特点，包含的内容很多，颇不易抓住它的中心意思。例如，其中讲革命文化运动以至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要占一半的篇幅，讲进步文化人应当如何工作的又占去了很多。而这些又都不是同"大众化"这个问题有太大关系的。因此，对"大众的"这个特点颇难道出其中心意思。总的说来，毛在解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特征时，对张闻天所反复强调的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号召，并没有怎么提到。同时，对上引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的解释，也颇不易理解。因为，宣扬封建伦理的、迷信的、反动的、色情的、各种宿命论的"文化"，通俗的大众化的东西倒是多得不得了，因此，决不能保证大众化的东西就是民主的、反封建的，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毛泽东在谈"大众化"时，确也似乎多是谈表现形式问题。他不是曾多次讽刺过作家们，"请你(大众)化一下"给我看么？所以，以"大众化"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是难于理解的，道理上也说不通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的十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而且，毛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提法，显然带有解释他为什么不提"民主的"特征的意味。即"大众的"就包括"民主的"内容了，已经够了，用不着再提"民主的"这个方向了。更由于毛是在张之后几

天讲的，因而毛的这两句话，又似乎有针对张强调“民主”方向的意味在内，即“民主的”不宜或不必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提出了，有个“大众的”就够了。

从这里可以明白看出，张、毛的重大区别是很明显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而且，从当时的事实经过上看，张是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原则区别的。但是，张始终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决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来迁就毛。事情的经过是：毛著《新民主主义论》是首先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1940年2月15日)，1940年2月20日在《解放》杂志上又第二次发表。张当时不可能不细读这篇文章，因为当时全延安的干部都是在仔细学习和讨论这篇文章。但张对他本人的报告仍照原样在同年4月10日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即晚于毛文的50天以后发表，两个明显的分歧已十分明白，可见张对毛的提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

当时，我党正虎虎有生气，还能多少容忍某些不那么关系到紧张斗争的问题上某种不同看法的存在。上述史实就是一个例子。历史证明，只要有个“两家争鸣”，真理也就会明显多了。

这个问题怎么又会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呢?

原来1941年5月，邓小平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对我军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 洛甫同志说（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24页)这里，邓小平毅然采用了张闻天提出的战略性定义，而且至今不改。其实，这时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早已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一年多了，邓对毛的文章也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他的报告又是专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的，就不可能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在仔细比较研究之后，邓毅然大胆地采用了或者说接受了张闻天的提法，这里恐怕很难用偶然性去解释的。毛的小册子早已人手一册，张的文章只在《解放》杂志上登过一回，要在太行山区里把一年几个月前的旧杂志找出来，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从这件重要事情上，就可以看出邓在当时就是如何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的。而大家都知道张闻天在30年代初，是曾经一度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33年初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就协同博古等展开了反对本来是正确意见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极其错误的斗争，在江西，开始阶段就是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反对邓小平的面对面的斗争（张闻天早已真心承认过他过去的左倾错误，此处不赘)。于此也可见邓的胸怀之博大。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分歧，现在再拿出来讨论，意思也就不大了。但问题决不是如此。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今后历史时期内，如果我们还是避开民主，仅在传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原则的笼罩下，听不得文化学术上一点点民主要求和呼声，那么，“科教”本身的兴旺就会发生问题，要靠它去兴国就更难了。所以，我以为张闻天提出的文化工作（原本就是广义的，科学、教育自然包括在内）方向的四个原则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方向，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古董。

有人会说：你怕弄错时代了吧，那是对民主革命时期说的，而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了，你在向谁要民主? 我回答说：不是向谁要民主，而是没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应该肯定，有些文化学术口号，是没有时代阶级性限制的，其是否正确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都会起类似或相同的作用。例如，学术民主的口号，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学术民主，那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不会取得文化科学的大长进，甚至会引起大退步。在西方，“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二千几百年来就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百家争鸣”的口号，自春秋战国直至今日，也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和绝对缺少不得的。同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广义的）路线，也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正确的、必不可少的。这些口号里没有“国际性”字样，但民主的、科学的两句口号也可以包括此点了。因为科学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大大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也正是文化科学大开国门的时候，就足以证明此点。

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学术方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我国应遵循的文化道路的正确指引和总结。它既吸收了我国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遗产，也吸收了西方文化科学传统中最优良的遗产。因此，它既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产，又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只应把它发扬光大，而绝不应该无视它，遗弃它；更不应该坚持个人迷信，一定要以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为正确。

(1998年5月4日)

(责任编辑：方实)

启动舆论工具
对权力实施制约的袁庚

● 鞠天相

从1978年末倡仪兴建蛇口工业区起，袁庚历任工业区基建指挥部总指挥、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长之职，始终处于第一把手的位置，袁庚在这方热土上放飞着自己的理想。蛇口的管理方式及其带来的新观念、新办法、新作风被称作“蛇口模式”。

邓小平曾经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在“蛇口模式”的若干内容中，邓小平这段话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袁庚也因而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

“《蛇口通讯》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即使于十余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袁庚在十余年前公开接受批评，以启动舆论工具对权力实施制约的壮举，仍不失为他诸多大手笔中的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事情发生在1985年2月初，蛇口工业区正在筹备首届社会经济战略理论研讨会。一切关注蛇口命运的人，都在热情地期待着这次会议能为蛇口的未来指出一条光明大路。

2月5日，创刊两个月的小报《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给袁庚送来试刊第2期的报纸。其间，袁庚对韩耀根说：“《蛇口通讯》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于是，这条意见不胫而走，先在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中传开。

同时，《蛇口通讯》编辑部也在琢磨、理解袁庚的这一指示。他们认为：社会舆论承受力的强弱，应该与经济改革的成败成比例。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比例往往失当。他们也在思索：自己手中的这块舆论阵地能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可不可以让民主舆论来监督领导？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中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里所说的绝对权力，似是指没有制约与监督的权力。

袁庚在做出“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指示之前，已经多次就“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等问题大发感慨。

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他在干部培训班授课中就提出了一个大家尚无法想象的问题，他说：“干部培训毕业就进入大大小小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进入大大小小的权力圈子中去。有了权，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权力对人往往有副作用，像抽鸦片烟，越抽越上瘾。”

袁庚对权力副作用的认识，最早与行路有关。1973年9月袁庚获释出狱，经过一段时间体能恢复后，时常骑着自行车外出，途中常被擦身飞驰而过的汽车吓出一身冷汗，因此心中对驾驶员的举止大为不快。安排工作后，上下班车接车送，往往越是着急，汽车越是因为给自行车让路而难以正常行驶。于是，他又对那些有碍交通的骑车人大为不满——因为

这时他的屁股坐在了汽车方面。袁庚讲述这段故事时总是加上一句：可不能让屁股指挥脑袋呀！

后来，当有关新闻机构呼吁给厂长、经理松绑时，袁庚又以自己的感受，发出了与之不同的声音：

"现在经理的权力特别大，我主张要削弱经理的权力。因为，企业是谁的，是全民的！但权力却是个人的。按理说，有绝对权力就负绝对责任。香港谢利源金铺是个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大企业，一旦宣布破产，老板吃一百五十多片安眠药自杀了。还有妙丽集团宣布破产后，不仅老板自己，连老婆、孩子、全体家属都不知所终。为什么？因为财产不是全民的，是个人的，因而权力也是个人的，他对公司拥有充分的权力，但他也负有绝对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破产了用性命补偿。我们也这样能行吗？不行！我们的经济法规远不健全。有些年轻同志当上经理，简直威风八面，权力相当大，但亏本的时候，他工资照发，责任负得很小很小，所以我说，经济立法很重要……"

袁庚看到了权力过大的危害，但同时他更明白，经济立法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谈何容易。如何解决滥用权力的问题呢？他想到了监督。

正是由于上述思想观点的作用，袁庚才会在自己辖区内的新闻载体刚刚问世不久，便提出了"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的要求。在当时条件下，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也只能如此启动舆论工具，实施权力监督。

然而，从谁做起呢？

工业区报纸批评工业区领导的文章可不送审

蛇口人的素质委实非同一般。12 天后，便有一位理解了袁庚良苦用心的人首先做出反应。

1985 年 2 月 17 日。一个电话打到《蛇口通讯》编辑部。

——我准备写一篇批评袁庚的文章，你们敢登吗？

1984 年 11 月邓小平听取袁庚汇报

——你敢写，编辑部就敢登。

对话十分简练。

两天后，即大年三十（2 月 19 日），署名甄明伲的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摆上了编辑部的桌面。

大年夜，总编辑韩耀根趁向骨干读者拜年之际，就此发出口头征询。结果几种看法与他们内部的意见基本吻合：赞同者有之，忧虑者有之，劝罢者也不乏其人。

2 月 21 日是大年初二，夜里 10 时，韩耀根几经犹豫，终于拨通了袁庚家的电话。

相比之下，袁庚闻情后的第一反应倒是极其敏捷果断。

"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我们就是要在这块地方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否则，要我们一千多干部来干什么？"

尽管袁庚的回答干脆利落，次日晚上，韩耀根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考虑，还是亲自赶到袁庚家中。但主人不在，他便把稿件留下了。

这天夜里 11 时许，他接到了袁庚的电话。

——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可以一字不改，照发。

——可否做些技术性修改？

——不必。

大年初四早晨，当他取回稿件时，发现了

袁庚的批语：

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基本符合事实，可以一字不改加以发表，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刊登讨论。

这是袁庚针对这篇稿件的第三次表态。第一次：不必送审；第二次口头表示：照发；第三次则白纸黑字一目了然。

袁庚于明确表态之后，又建议修改了对他本人的称呼(注：原稿称其为袁庚先生)。

明伲同志似是这里的一位干部，是否可征得其本人同意改为“同志”，这样更亲切。

可以猜出，袁庚走笔至此，仍然沉浸于一种激动的心情之中难以自拔。因此他言犹未尽地又加上了一段文字。正是这段文字，触动了几十年来的新闻传统——

只是建议，不是审查，以后也不要送审。除非牵涉根本方针政策，本人又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多征求大家意见总比编辑部少数人意见更全面。

寥寥数字，语不惊人，但却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稿件)以后不用送审。如果说，借舆论工具来监督制约权力是袁庚欣然纳谏的初衷，那么，稿件“不要送审”这条内容，就是因善良的初衷而引发出的一个更具风险意蕴的突破，或者说是一次冲击禁区的挑战。

在报纸送往广州付印期间，袁庚亲自召开了一次直属公司全体干部会议，向与会人员预告了即将面世的《蛇口通讯》要发表批评他本人的文章。并特别强调：“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

袁庚此言，是严密的：作为共产党人，他有坚强的党性，不许反对共产党；作为一方开放地区的领导人，他勇敢地引进了西方文明的一项进步内容：尊重个人隐私，不许进行人身攻击。更为关键的是，他在上述两大前提下，巧妙地对“可以不审稿”的范围做了界定：“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而已。这一界定既严格又科学。因为两大前提的范畴十分广泛，因此完全有必要对被批评者的身分加以限制。作为工业区最高领导人，袁庚也只能在自己的领空中自由翱翔。

有了袁庚的亲笔批示，《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一文，于 1985 年 2 月 28 日在《蛇口通讯》试刊第 3 号头版发表。署名甄明伲的致袁庚的信，一开头就自我介绍并表露自己的心迹说：“我是一名仰慕您的威名而投奔蛇口的青年，来此已有两年多了。这两年间，蛇口在全国的声誉与日俱增，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越发光辉夺目了。然而，在我和一些生活在蛇口的青年人心目中，忧虑的阴影却也在不断地扩大。我希望能借《蛇口通讯》的一角，向您直率地进一言。”来信在称赞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的开创者”“大胆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口号”，表明了他的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胆略之后，坦诚而又尖锐地批评袁庚说：“但是，我觉得您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因为，蛇口工业区从 1981 年底基本完成‘五通一平’基础工程建设后，逐步进入了一个更加艰难的企业管理（或者说是社会管理）的阶段，我们却没有明显看到您表现出一个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管理能力。工业区的整体管理水平很不理想，您不能不负主要责任。”接着来信一一列举了诸如管理机构膨胀，人浮于事；不少合资企业经营不佳，董事会形同虚设；不少合资厂的工作效率不如独资厂；以及人口剧烈膨胀，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来，等等现象和问题，以说明蛇口工业区“在全国对外开放、体制改革方面确实是走在前面的，然而在管理上却是落在后面的。”

极有趣味的是，这期报纸上还专门配发了一篇《“恐惧”，告别吧！》的评论。评论说：“甄明伲敢于直率进言，一是为公，二有勇气。无私无畏即自由。能作‘自由谈’者，一定是出于对袁庚同志的信任。然而，甄明伲似像匿名。作者大概有难言之处，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恐惧’心

理。这说明工业区民主风气的形成,尚需要一个过程。美国历史上领袖人物曾说过:要有消除恐惧的自由。美国人尚且敢于把它刻在碑上;以勇于探索为崇高使命的蛇口工业区人,岂能再让'恐惧'禁锢自己的头脑。'恐惧',告别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袁庚成为新闻热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所引起的轰动之大,影响之巨,恐怕连一手促成此事的袁庚本人也始料不及。

报纸还在广州印刷机上滚动时,广东省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闻讯,以最快的速度向《蛇口通讯》约下稿件的转载事宜。报纸出版后,广州、香港乃至全国的一些大报亦及时发现了这条新闻,纷纷予以热情关注。一夜之间,袁庚成了闻名中外的新闻人物。3月21日,《羊城晚报》发表的文章,在两天之后,便被中国最具新闻权威的载体《人民日报》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袁庚发扬民主——**支持报纸指名道姓批评自己**》为题转载于四版头条位置。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以《蛇口新事:袁庚闻过则喜》为题做了报道。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信报》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新闻。

虽然上述报道的侧重点,已经背离了袁庚2月5日指示的本意:凭借舆论来制约权力。但是毕竟为他实现目标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

来自蛇口工业区决策层的反应,就足以证明。

时任香港招商局副总经理的江波刚从瑞士出访归来,兴致冲冲地登上工业区培训中心的讲台,向新学员发表演说:"我们工业区在一片赞扬声中确有不少问题,读了第3期《蛇口通讯》后,感到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甄明伲同志建议学习管理,这不仅对袁庚同志,也是对我们这些处在领导岗位的每一个干部讲的。问题提得好!"

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今贵针对内地一记者所说的"批评袁庚的信最好登内部简报"的话,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们以前的观念不对,好像一公开批评谁,谁就得下台。依我看,在蛇口这类批评多了,大家就慢慢习惯了。"

《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所带来的冲击波,一直持续了数十天时间。

继各大新闻媒介争相报道之后,《蛇口通讯》在3月30日出版的试刊第4号上发表了长篇通讯《"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详细披露了袁庚同志本人正确对待批评的细节"(《蛇口通讯》用语)。见报次日,《南方日报》在头版转载。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针对这篇通讯的评论文章《蛇口的第一声春雷》。《南方日报》复又转载了该篇评论。据悉,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走廊上设立了专栏,主题是《中国新闻改革在前进》,副题是《〈蛇口通讯〉一则新闻的反响》。广东话剧团排演话剧《裂变》,也将此情节吸收其中,搬上舞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新闻系的师生亦专程赶来蛇口调查研究……

1986年6月,1985年度全国好新闻评比揭晓,仅仅四个特等奖中,《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便是其中之一。

一个尚未公开发行的内部小报上的文章,居然荣获了全国好新闻的特等大奖,有关权威人士认为: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一笔已经肯定无疑,甚或能够成为后无来者的绝唱。

《蛇口通讯》终于出现了麻烦

《蛇口通讯》试刊第3号上刊载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第4号上刊载了《"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4月30日出版的第5号上就出了麻烦。主要原因是总编辑韩耀根忘记了或者原本就缺乏一个普通的常识,在中国,公开发表高级领导人的观点,必须经过本人或有关方面审查同意。

当然,也不排除他忽视了袁庚多次对"(稿件)不要送审"一说所做的权威解释,即仅限于"蛇口工业区领导"的范围。好在新闻不长,特录于兹,题目是:"经济特区怎样建设

更好——**姚依林袁庚坦诚交谈**”

本报讯　南下考察粤闽两省及四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本月25日到蛇口工业区，就特区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实行管理线管理、发行特币等问题，与袁庚做了交谈。

姚依林对蛇口的建设表示满意，说：这个建设速度是难能可贵的。他认为：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袁庚说：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会“性命难保”。

姚依林问：那你说怎么办才好？

袁庚答：可以从100CC减到50CC，然后逐步递减，帮助自身的组织“功能”恢复才成。

当介绍到日本在蛇口投资厂的管理时，姚依林说：联邦德国“奔驰”厂管理得好，工人有“奔驰”的自豪感，外国的先进管理我们要学，但不能照搬，完全照搬是危险的。

就这篇报道在一版头题前位置发表，个中“果断地拔掉‘针头’”一说，引起了“轩然大波”(袁庚语)。

有人说：这是一个谣言。

事情经过大致如是：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于4月25日下午3时许，在视察珠海特区后，来到蛇口工业区。姚依林此次南行，主要是视察广东、福建两省，调查了解这两个特区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蛇口前，他已去过广州、珠海两市，之后还将视察汕头、厦门等地。深圳市负责人梁湘一行和袁庚等负责人陪同姚依林视察了蛇口有关地方。

袁庚首先向姚依林简要地汇报了蛇口工业区经济发展概况，还汇报了工业区、南山开发公司和渔工贸发展总公司三个经济实体不同特点的改革情况。当汇报到管理局机构设置精干，由17个工作人员掌管28个图章时，姚依林笑了。听到工业区4月24日进行了民主选举第二届管委会，他连声说：好事，好事。

结束汇报时，姚依林兴致未减，还要袁庚再多讲几句，除介绍经验以外，还要讲讲这几年搞建设的主要体会。

抓住与中央领导人汇报的机会阐述观点，索要“政策”，争取支持，是袁庚的拿手好戏。于是，他坦率地讲了自己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但缺少了制定具体的经济政策，具体措施也跟不上，因此各省、市、地、县、企业都根据文件精神，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各行其道。现在看来受到了一点惩罚。袁庚又谈及经济立法是非常重要的等等。

汇报结束，姚依林登上微波山观看了工业区全景，并先后视察了面粉厂、赤湾港、集装箱厂、华益铝厂，游览了工业区市容。

姚依林还和袁庚交谈了特区的经济发展和深圳特区实行管理线管理、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此后，便有了一段极具新闻价值的对话。

姚依林：这个建设速度是难能可贵。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袁　庚：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性命难保。

姚依林：那你说怎么办才好？

袁　庚：可以从100CC减到50CC，然后逐步递减，帮助自身的组织“功能”恢复才行。

最后，袁庚请姚依林就蛇口工业建设，特别是建材工业的发展和一些产品的出口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打个招呼，高抬“贵手”，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姚依林笑说：抬的不是贵手，也不会殃及池鱼。

大约4个小时后的19时15分，姚依林一行告别蛇口，前往深圳视察。直至九年后，姚依林于1994年12月11日逝世，1995年1月香港《争鸣》杂志发表文章攻击姚依林时，还专门以“拔针头”为例，指责他反对特区建设。

如果仅从新闻角度出发，《蛇口通讯》上

这篇报道的确抓住了姚依林与袁庚两人对话的要害，但作为蛇口工业区的一张小报，未经审查就擅自发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观点，无疑是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纪律。何况，又是“拔针头”这样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为此，袁庚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当众解释——

“我和姚依林同志有三段对话，有人听了说很精彩；也有人不高兴，说某些谈话是谣言，要辟谣。我说要辟谣的话只有姚依林同志和我才有资格，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对话，别人怎么知道它是谣言?”

“对《蛇口通讯》我们不主动审查它的稿件，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理论：一个同志，你既然认为他可以当总编或叫主编，那当然是你认为他有水平。没有水平为什么要任命他为主编?他把稿件审查好了，你却要他把稿件送到宣传部门审。现在的宣传处长是谁?（有人答调走了）那他下面还有些助手。我就不相信宣传处长助手的水平比韩耀根的高。如果《蛇口通讯》的编辑认为他对某一稿件发表没有把握，要求领导审查，那又另当别论。这是我们定下的规矩，错了我们检查，用不着韩耀根检查，但他可以从中取得经验或教训，也就是以后刊登国家领导人谈话要慎重一点就是了。”

袁庚坦言：要免除一种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

同年夏秋之交袁庚在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下，欣然接受了一次来自两名小人物的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

那是在 1985 年 8 月 23 日蛇口工业区例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纪检会和公安局首先就工业区近期 6 起案件做了通报并点了一些人的名。之后，袁庚情绪激动地发表了一次演讲，对有关丑闻案件和危险苗头进行了措词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培训中心一位教师违反海关禁止黄色刊物进口的规定的错误。谈及这一错误时，袁庚如是说——

“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三教九流都有，藏龙卧虎之所。不是有个黄色杂志叫《龙虎豹》吗?在香港确实有。但我未想到，在我们这个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小小地方，居然也出现了个别同志欣赏《龙虎豹》。这种事确实令人痛心。个别同志所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且使得海关对我们从香港回来的同志的行李严加检查，我拥护海关的这种做法。任何一个同志，他做了损害集体利益的事情，你不能在旁不管，认为这个与你无关，如果这样想，就错了。”

“我们，主要是我本人过去亦喜欢说些好的情况，这叫报喜，每当中央首长来时，我们就拍着胸膛说，蛇口工业区六年以来，从来没出现过恶性的刑事案件，说到‘恶性’两字的声音不是很高，而‘刑事案件’这几个字的声音抬得很高。所谓恶性刑事案件是指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强奸。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对外讲的。至于其他呢，藏污纳垢，与别的地方差不多。”

会后，培训中心按照要求召开职工大会，帮助那位携带黄色刊物《龙虎豹》过境的教师。不料想，有两位教师对袁庚的演讲和纪检会的通报提出了公开批评。

培训中心图书馆馆长顾承原在会上发言认为，袁庚同志和纪检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做法，使人感到工业区党委又要搞一次政治运动了，袁庚要开始整人了。

另一位教师姚中也在会上联系自己历史上受过的委屈说：袁庚和纪检会这种疾风暴雨式的做法，容易出冤假错案，不要等到 10 年后再给人家平反。

会议气氛因此而紧张起来，没有达到预定目的。

很快，袁庚便掌握了第一手情况。

显而易见，两位教师的发言过于尖刻了，甚至启用了诸如“政治运动”、“整人”、“冤假错案”等一些久违了的词汇。反批评的措词之尖锐，与袁庚的演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呢?袁庚当时的心情，笔者无法揣度。能够提供给读者的，是十余天后，他的又一篇讲话摘要。其主要观点，建立在使人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基础上。

袁庚说："我想，随着重视人才、重视知识和尊师重教成为一种社会公德，将会带来一个崭新的社会面貌。任何一个国家，它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发展，如果没有造就大批人才是不可能的。知识的更新、科学的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往往是成正比例的，就是说一个愚昧无知的民族，如果期望在经济和物质上有所兴旺发达，那简直是幻想。知识人才、科学技术的发达，实质上是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范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起码的政治上民主的气氛，就很难造就人才；心情不舒畅或心有余悸，学术上也就停滞不前。"

在这篇讲话后部，袁庚提到：四十多年前，美国比较开明的罗斯福总统提出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经常都是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袁庚曾与人谈及，他是从毛泽东口中第一次得知罗斯福与四大自由的。那是 1945 年，他刚 28 岁。

194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称，要"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三天后，在蒋介石三封电报邀请下，毛泽东毅然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其间，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了 12 个问题，请毛泽东答复。

第 10 个问题是：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复："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一内容曾刊于 1945 年 9 月 27 日重庆《新华日报》。而袁庚则是从香港报纸上读到有关内容的。

1985 年 9 月 10 日，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袁庚在蛇口工业区的庆祝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讲话，以极长的篇幅高度评价顾承原和姚中两位教师，在公开场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做法。

袁庚陪同胡耀邦视察蛇口

袁庚说："'四人帮'横行时代，许多教师是在屈辱的日子里度过的，他们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老师都得表态，否则就是跟党不一条心。知识分子有他傲雪凌霜的骨气，违背自己的良心被迫表态是一种精神折磨，是对人的尊严最大伤害。这样的一个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前几天，培训中心开了一个会，内容是讨论一位同志从香港返回蛇口时违反了海关禁止黄色刊物进口的规定，受到了海关罚款、批评。在会上，有两位老师，就是图书馆的顾馆长和培训中心的姚老师，能够鲜明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肝胆照人，铁骨铮铮。他说，我感到袁庚想整人了，一场政治风暴将要开始，用不了十年、八年又要为某人（指违反海关禁令的同志）去平反的。这些话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讲出来的。我看了这个会议记录后（不一定和原话一样），内心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高兴，说明蛇口是有人才的。因为他们不是吞吞吐吐，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仨仨俩俩去讲，而是在正式会议上、在讲台上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我说，知识分子就应有这种凌霜傲雪的精神。这里不是评价他们当时的讲话内容是否正确；而是在于他们这种光明磊落，不畏'高官权贵'的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在大半年前，全国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正聚集在'海上世界'座谈时，我感觉到蛇口不

袁庚与谷牧合影

致力于办好这样一件事，就很难以发动千军万马办好蛇口工业区，这就是使所有的同志首先在政治上要免除一种发表政治意见的恐惧心理。让人家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只要不是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的，一律不许有任何打击报复、穿小鞋。今天我谈这个问题，旨在希望能倡导这样一种风气。我想，如果蛇口工业区没有许多像顾馆长、姚老师这样的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事业就很难正确地继续下去。

“对于政治上、组织上、人事上有不同见解的同志，应该有顾馆长、小姚同志这种精神，在大会上侃侃而谈，面不改色，这样才是真正大丈夫所为，蛇口人的风度。我们要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主张蛇口人首先是干部有良好的透明度。人们都能肝胆相照，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蛇口的政治局面将会朝气蓬勃。

“今天，利用这个机会重点说了知识分子、干部（当然也包括三百多名在座的老师）要有良好的政治透明度问题，推行政治上直接参与的民主，使得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共同关心和共同办好工业区，这个决心我们是下定了。”

说到这里，台下掌声雷动，群情激昂，反映良好。

培训中心女教师王晓敏说：袁庚9月10日的演说，是我所听到的讲话中最振奋人心的一次。蛇口确实真正地给人以免除恐惧的自由。袁庚并不以为人家向他提意见是在蔑视他的权威，这就证明他所考虑的是蛇口的前途。

培训中心教师孙玉贵说：我赞成袁庚的意见，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一个人说了算，那是封建式的管理。不管哪个地方，搞封建式管理，经济是绝对发展不起来的；没有政治上民主做保证，哪怕经济暂时上去了，也是短命的。

原准备挨袁庚批评，没料想得到表扬的图书馆馆长顾承原，会后激动不已，夜不成寐，奋笔给袁庚写了一封信：

……现在各级领导的思维方式，倘若只遵循向上负责、向下追究的原则，而不是强调颠倒过来的话，民主永远是一句空话，蛇口也永远根除不了“官不畏民，民畏官”的劣根。因此，发扬民主应先从蛇口最高行政机关——管委会开始，而袁庚同志更要带头提倡民主作风。

培训中心和其他方面的反应，更加鼓舞激励了袁庚。不久后他又一次在公共场合里发表演说，把二位老师“反批评”一举的意义再度引向深入。他说：两位老师所发表的意见可能失之偏颇，但就其公开阐明自己的意见，抨击工业区最高领导人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对于敢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人，要像对待稀有珍贵动物——熊猫那样加以保护，以免“绝种”。

这段演说的主题思想，后来在著名的“蛇口风波”中经袁庚自己演化为一句广为流行的格言：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摘编自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纪实》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木　易）

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下）

● 杨奎松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俄国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大大松了一口气

整风的目的，在于求得思想统一，进而求得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发动整风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实现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意图。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从1942年8月起，中共中央就陆续制定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关系问题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一步步提出了规范上下级关系和全党服从中央的具体模式，力图解决各根据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的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提出目前的书记处办事方式不够精练，作为政治局日常办事机构，书记处也应大大精简，并有权随时处置决定日常工作。只是，在刘少奇到达延安以前，这个问题一时还不能提上日程。

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辗转山东、晋北等根据地回到延安。刘是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1921年5月曾与任弼时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一年后归国，一直从事工运领导工作。同毛泽东一样，刘也喜欢独立思考，常常与中央领导人意见不尽相同，因而直到六届四中全会才得以补选为中央委员，五中全会人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仍旧不免屡屡被"左"倾中央批评为"右倾"。

遵义会议后，刘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到陕北后即被派往天津领导华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其独立思考的特点逐渐显露其优势：抗战开始后，刘力倡独立自主和开展华北游击战争，与毛遥相呼应；刘主持华中局工作后，新四军工作亦开展得有声有色，因而倍受毛泽东的欣赏。

到1941年九月会议时，刘已被党内众多领导干部视为毛泽东以外中共党内另一位正确路线的代表。陈云称赞"刘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王稼祥也明确讲：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康生也都将刘与毛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如果临时中央由刘少奇负责，白区的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此，在当时的会议上，与会者已经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会议结束不久，毛在起草"决议草案"时，也特别点了刘的名字，称赞其在白区工作时的贡献。10月份，毛泽东更两度电召刘来延安工作。只是因为刘一行通过日军封锁线颇费周折，再加上山东根据地领导人之间出现矛盾，毛泽东令其暂留山东帮助解决，所以才耽搁下来。

在刘少奇回到延安两个月后，张闻天也被召回中央。政治局很快进行了三次讨论，由任弼时拟定机构精简调整方案，刘少奇提议以毛为主席，大家一致拥护，遂于1942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称：

> *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
>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他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所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
>
> *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

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四同志组成之，以毛为书记，王为副书记，负责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中央党校、文化委员会、出版局等宣传文化部门。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八同志组成之，以刘为书记，负责管理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等组织及政策部门。原先设立的各类党的部门，一律归口合并或撤销。

这一《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而以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得力副手，更分担了前两年时间里必须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毛泽东确有如虎添翼之感，觉得现在“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在中共中央形成了新的领导核心，一切工作都感到得心应手之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电报称：“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向各支部公布关于解散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共产国际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原因在于，这种国际联合的集中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个国家共产党进一步发展成为本国（本民族）的工人政党的需要，并且还成为其障碍。”

毛泽东迅速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电。据当时莫斯科派驻延安的联络员报告说，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条件和需要，因此是该解散了。还说，毛泽东特别批评了党内那些不听中央的话，只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话的人们。据说是王明告诉俄国人说：“毛和他的拥护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双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责任感也不会有了。尤其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现在可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了”。报告又说预计在对待“国际派”那些人的问题上不会有任何改变，这些人“甚至可能被开除出党”。

不管俄国人这时的报告是否完全准确，共产国际的解散，对毛泽东来说，确实可以看成是一次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大解放。深为自己领导下的中共发展壮大而自豪的毛泽东，迅速流露出对莫斯科过去遥控指挥方式的不满。他公开宣称：“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三次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远离各国革命斗争实际的共产国际，当然“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中共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大因素，照《解放日报》社论的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独立地创造性地，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客观条件正确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毛泽东说，谁对谁错已经很清楚，再不认错，就有走向敌人的危险

王明于 1941 年 10 月 13 日躺进中央医院以后，陆续有中共领导人前去探望。对毛泽东、任弼时等，王明总是做足表面文章，表示愿意接受批评，诚心检讨。而对王稼祥、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王明则每每大吐苦水，他见王稼祥时说：毛这个人太厉害，睚眦必报，现在整我们，你过去也反对过他，你也跑不了的。见周恩来说：现在整风不过刚刚开始，你我错误一样的，一定会整到你头上去的。见博古说：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担心，那边（按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见张闻天说：这次主要是整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为曼努伊斯基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听了这话大发脾气，你的教条比我多，我自己不过是因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等等。特别是对在延安的俄国人，他更是一有机会就要进行煽动和挑拨，打探莫斯科有无进一步指示来。

1942 年 5 月，毛泽东、朱德等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合影

王明的两面手法，毛泽东初时尚不十分了解。但随着1943年初王明重新开始在背地里密谋串连的情况为毛所知后，使他渐渐意识到王明才是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

早在1941年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研究苏维埃后期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并陆续对这九份文件写出过文字批判的笔记。只不过，在当时，毛的主要批判对象还是博古，情绪也较为平和。这时，毛泽东重读这些文件，重看自己原先的笔记，就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够了。于是毛在修改后的笔记中不仅加上了王明，而且把王明视为那条"左"倾路线的祸首。

这份修改过的笔记，第一篇就是评论王明起草的、1931年9月2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文件。毛泽东改变了1942年上半年的估计，否定了六届四中全会，并肯定王明是这个时期"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笔记写道：

这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全党代表大会第四次中央全会以后王明同志（即陈绍禹）为首的中央发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此形成，并由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继续发展，到后来成了一条比较立三路线还更完备的极端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对于这条路线，王明是创始与支持者，博、洛等人则是发展者与执行者。

当时的四中全会是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目标的。这种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在三中全会上已经基本将立三路线从基本上批判过了，……王明等人重新挑起这个问题来批判，是别有用心的，其证据就是在其后出现的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比立三时期的结果更坏。……因此四中全会是完全错了，从此种了以后的恶果。

按照胡乔木的话来说，毛泽东的这个笔记是"喜、笑、怒、骂跃然纸上，情绪化色彩甚浓"，纯粹是"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渲泄"。下列笔记中使用的语句，颇能反映出毛这时对王明当年上台所带来的一切深恶痛绝的激愤心情：

王明反对立三路线夺取中央权力以来还不到九个月，就又恢复了立三路线，可见他反对立三路线是假的，不过借着反立三路线之名，行夺取党权之实。至其思想，完全和立三一模一样，都是反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野心家。……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璜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与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是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其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为鉴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

毛泽东特地将这篇批判王明的笔记送给新成立的书记处的另外两位书记刘少奇和任弼时去看。在得到政治局主要成员，对于发动批判王明的理解和支持后，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针对王明背后爱搞小动作，再次强调把肃清"小广播"作为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重视。其次，针对共产国际来电坚持把国民党视为民族联盟，与王明的观点遥相呼应，提出加强阶级教育，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特别是从7月开始，结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和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调集大军围迫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公开批评王明等人自抗战以来即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不正确的了解，犯了许多错误，至今尚未彻底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7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抗战以来，我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捉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认

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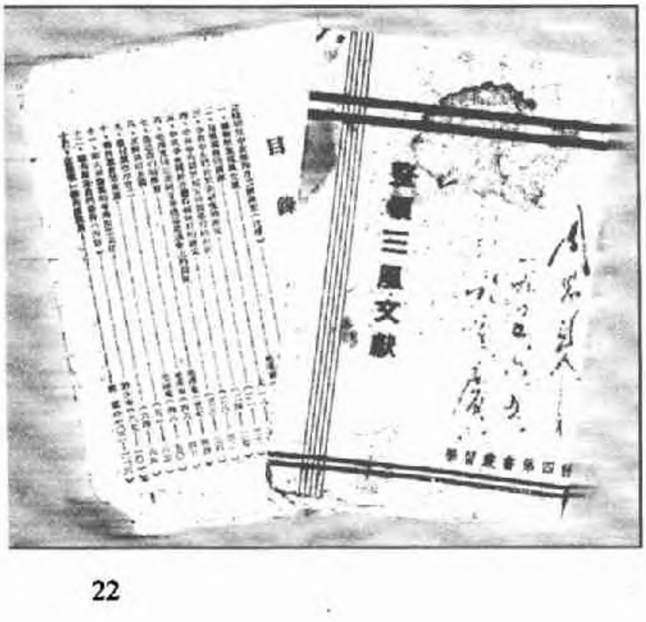
毛泽东进而提出：谁对谁错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而我们党内现在还有人坚持错误观点，还有人搞不清过去的历史，我们今天必须把这些搞清楚，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弄清楚，对党外也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

中央决议：王明的投降主义，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

由于整风运动发生在对敌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背景之下，毛泽东从1942年下半年就逐渐开始把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同阶级斗争、组织清洗联系起来了，从而使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延安的政治空气也渐趋紧张。胡乔木对整风运动的回忆明确讲过这种情况。他说，当时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很紧张，“因为整风很紧张，所以才会一下子转到审干”。“如果没有那个气候、土壤，不可能一下子转入审干。”在这种空气之下，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越来越严重。

1942年6月，毛泽东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当时由康生领导的审查机关更是唯恐找出的坏人不够多。由于“逼供信”真的“逼供”出来一个所谓“红旗党”，查出一批所谓国民党特务。再加上苏联方面也有情报告诫中共确有奸细在帮助国民党，毛泽东对反革命“内奸”的担心自然更加严重。

1943年3月16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一边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一边整反革命。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著名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公开提出：自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两方面有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整风的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随后，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反内奸斗争委员会，整风也由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和思想革命，迅速转入疾风暴雨的组织清党，即审查干部阶段了。



4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万人大会，传达贯彻《四三决定》，号召所有“失足分子”自动自首坦白。不出三个月，经过大会控诉，小会揭发，个别谈话，康生宣布已经有450人“坦白”了他们是国特或日特。

随着“坦白”人数不断增加，进入8月份，毛泽东也不能不相信延安确实是“特务如麻，到处皆有”了。因此，审干一夜之间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延安除了那些中央领导人以外，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热潮之中，光是一个2500人的中央党校，据称，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由于在审干中对敌情作了不适当的估计，以致出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共中央8月15日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著名的审干九条具体方针，特别强调要严禁主观主义的逼供信。后又明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从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再度讨论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第一次坦率地说出了他多年来对王明不满的两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见长期被压抑，党的工作不断受到不应有的巨大损失；第二是无论在江西，还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处篡党夺权，即使在六中全会以后，延安实际上仍是诸侯割据，一国三公的局面。时至今日，王明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党仍存在发生破裂的可能。因为，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举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只剩下6个人，其中只有毛和刘两人是受“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其余多是拥护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说，王明宗派长期控制了中央码头，并且打着“国际”旗号，用马列的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们的罪恶，需要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当然，毛泽东表示，即使在内战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也是王明，博古、张闻天是执行者和发挥者。

博古在会议上明确表态赞同毛泽东关于抗战初期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肯定一条是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为首的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并断言，这条错误路线经过长江局统治了东南局，影响了华北和边区，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完全抹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完全是叛变无产阶级革命。

在毛泽东表明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创造者也是王明的意见之后，一些发言者干脆断言，王明是身在“毛营心在蒋”。陈伯达说，王明的心始终都是放在国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产党身上的，他实际上可以说与共产党是两条心，对共产党是仇恨的，有许多反

共言论,他的理论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论;康生的发言同样尖锐,他指责王明的投降主义是有系统的,说他的投降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对立的路线，他根本上已经成了买办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断断续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最主要的检讨者是博古、张闻天和从重庆回来不久的周恩来。其中,周恩来的发言最长,11 月 27 日、28 日,12 月 1 日、2 日、3 日,断续讲了五天。

鉴于政治局会议已经基本上就王明错误的性质达成了一致的意见，11 月 29 日中央书记处指示李富春找仍在休养中的王明谈话，要求他主动检讨自己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供会议讨论。王明看出大势已去,只好让孟庆树代笔,明确表示“一切问题都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他声称:“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做出正式决议,中共中央就此下发的有关指示称: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完全符合的。”

在这时中共中央文件当中，对王明问题定性最重的,是下面这段话,即“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1944 年 2 月 26 日，周恩来就会议中讨论的有关问题与王明进行了一次谈话。事后他虽曾写信给周恩来,对根本否定四中全会,以及把他算成是苏维埃后期“左”倾路线的代表问题,表示疑问,但不久王明就已经明确表示，他对中共中央“对这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并且愿意“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用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不管王明这时的态度是否真心,从 1943 年 7 月开始，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都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真诚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敬佩。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以及 194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中共领导人一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一致拥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斯大林在延安受到普遍爱戴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共中央这时一面深刻批判不看中国革命实际,“言必称希腊”,对莫斯科言听计从犯了许多错误的王明,一面小心翼翼地区分真假“国际”,仍旧继续表现出高度尊崇莫斯科的态度。

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它的错误也受到批评,但周恩来在自我检查中仍旧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真假国际”问题,他详细介绍每一位与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关的莫斯科领导人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并把绝大多数错误都归结为个人行为。根据他的说法,共产国际所以在中国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关键在于那些曾经亲自指导过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包括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而斯大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等人则是始终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如肯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革命重要的政治因素，强调国民党的动向以帝国主义的态度为出发点,指出中共的任务在于武装人民、瓦解敌军、组织农民,反对危害边区和削弱八路军,揭露王明与米夫的关系不正常，批评王明有政治野心和不该反对毛主席,等等。

毛泽东所反感的，其实主要是过去共产国际与中共那种父子党的关系。而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位典型的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阶级利益以及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共与苏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师生的关系。以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视为经典，反复讲解,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贯彻。正如张闻天在中共“七大”上公开宣讲的那样,无论中共领导人,还是毛泽东本人,都不否认自己是马、恩、列、斯的学生,他们“不但不以此为耻辱,而且以此为光荣”。

尽管毛泽东相信共产国际的基本理论及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具体问题上绝不盲从。

1943 年 12 月底，在处理一封季米特洛夫的来电中,令我们看到的才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根据从重庆和延安的俄国人那里得来的情报,心情焦虑地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请他

不要减少对日的军事行动；不要放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开展对他们的斗争，主张把他们留在党内并尽量利用他们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对苏联的不信任情绪；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

1944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从苏联红军情报总局驻延安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到了这封来电。他当即挥笔写了一个复电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译好后发回去。复电直言不讳，称：

1. 我们并没有削弱对日斗争。相反，1943 年八路军在 10 处地方实行了积极的对日作战。因此，在 1940 年和 1942 年失去的一些地区又夺回来了。八路军现在的人数达到了 50 万。1943 年的对日斗争是在坚决的指挥之下的。

2. 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没有任何变化，1943 年 7 月出现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对边区发动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冲突的发生。1944 年还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但我们会用我们的政策来努力避免军事冲突。

3. 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4. 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经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一致。

5. 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我们对在这里的所有苏联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玛、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6. 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过。几个人都谈起，他在监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后来才被释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谈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关系。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这封电报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这时的心态和他对季米特洛夫提到的各项问题的真实看法。

不过，就在 1 月 2 日电报发出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又急忙找到伏拉基米洛夫，询问伏拉基米洛夫电报是否发出去了。他告诉伏拉基米洛夫说，他对季老的电报想了很多，前面的复电可能不十分妥当。他最担心会引起不满的显然是上封电报中他在国共关系和对王明态度问题上的说法。因此，他特别解释了他对国民党的策略，强调他不是不要合作，他只是认为对国民党必须保持一只有力的拳头，否则不足以威慑国民党进攻边区的企图。谈到党内王明的问题时，他虽然仍旧强调王明的错误，但没有再提到王明的“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问题。

4 日晚，毛泽东特别宴请了在延安的军事领导人和苏联红军驻延安的联络小组成员，与会者全都十分热情地向苏方人员表示他们对苏联对德战争进展的关切和祝愿。晚宴后，大家都来到苏方联络小组的驻地，关切地问这问那。

5 日，毛泽东再度找到伏拉基米洛夫，再度谈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问题。显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再给季米特洛夫发一封电报以挽回 1 月 2 日电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7 日上午 9 点，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窑洞，告诉伏拉基米洛夫说，他同意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感谢季老在中国问题上所给予的关注。他当着伏拉基米洛夫的面又起草了一封电报，要后者转给季米特洛夫。他在电报中说：

作为对 1 月 2 日电报中我所表明的观点的补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报告如下：我真诚地感谢您给予我的指示。我将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视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正在实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证，对国民党的情况将会在 1944 年得到改善。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 1943 年下半年针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

我请求您冷静下来。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我的想法和感情实际上是一样的。

在这之后，毛泽东确实在上述两方面做了适当的努力。他很快约见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表示愿意重开与国民党的谈判。与此同时，他开始亲自主持对被审查人员的“甄别”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问题在组织上作出明确结论：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篡党”问题也被取消，指出因有国际承认，也“应承认是合法的”。

当然，在季米特洛夫特别强调的康生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丝毫妥协的表示。他始终坚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赖的同志。

（本文原载新近出版的《近代史研究》上，作者采用了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并参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原文有附注。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删掉了附注）

（责任编辑 萧 徐、洛 松）

“三反”“五反”激流中的民主人士

● 庞 松

1952 年元旦过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运动之初党政机关内部揭露出来的贪污、受贿等问题，对于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可谓触目惊心。毛泽东下大气力全面部署，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党政机关到各大军区及志愿军部队，他都亲自布置指导“打虎”斗争。刘青山、张子善这类原为共产党的“有功之臣”，一经揭露为贪污腐化的“大老虎”，党纪国法一律严惩，绝不宽贷，这在全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扫除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拉开战幕。建国之初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廉政风暴及同资产阶级反限制斗争的激烈较量，使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既受到深刻的教育和触动，又在他们思想深处引起诸多波动和疑虑。

陈其瑗存款的困惑

“三反”运动初起，中央曾要求各部门首长认真地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做一检讨，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以推动本系统、本单位运动的深入开展。此事自然牵涉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有关党外人士。为了适应“三反”斗争深入开展的形势，有的民主党派主动采取思想检查的办法，就各该组织成员的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和批判。由此，一些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的思想检查或检讨报告，陆续送到政务院总理办公室。

3 月初，正值乍暖还寒时节。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埋头伏案，将近日所了解的各大区所属大城市的“三反”、“五反”运动、经济活动开展和对工商业户进行初步分类的情况，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完一干公文，周恩来又拆阅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真转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任内务部副部长的陈其瑗，写给彭真并交周总理的检讨信。陈其瑗写道：某日他交待秘书到银行存钱，时值星期天，赶上人民银行办事处不办理储蓄业务，秘书遂将 1000 万元人民币（旧币）存入公私合营的金城银行，当时他对此事并未介意。陈其瑗检讨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表明自己对私营银行的信任，超过对人民银行的信任，间接提高了私营银行的声誉，有利于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的猖狂进攻，增加了私营行庄对国营银行流通资金的比重，无异于削弱国营银行的领导力量。陈其瑗在信中还提出，此事要向毛主席和内务部谢觉哉部长报告，并将在内务部机关公开作自我检讨，自请审查，听候处分，云云。

当初，中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时，确曾规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非近期使用的现金，应一律存入人民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但这仅对国家机关、军队和国营企业而言，没有也不

可能对私人存款作这样的规定。何况，金城银行是私营金融业里最早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银行之一，并在1950年8月就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改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年9月，又并入由人民银行牵头的联合总管理处。这样的公私合营银行，显然不能等同于私人行庄，作为国家干部对该银行的个人存款，也根本谈不上提高私营银行的声誉，削弱国家银行领导力量的问题。

陈其瑗郑重其事，狠挖思想根源及其所带来的危害，自我上纲上线，不可谓不深刻。周恩来浓眉紧锁，将检讨信反复看了两遍，实在感觉这与"三反"的内容搭不上界，也与"五反"斗争的主旨无涉，显然这类平平常常的小事应无庸议。他用红铅笔在信上批了几个字："这不是原则问题"，请陈其瑗先生大可不必为此事过分紧张，自请处分。党领导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作一次必要的清理，也是对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反限制斗争的坚决回击。但这个斗争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中间引起紧张或恐慌情绪，乃至做出类似陈其瑗先生这样无关宏旨的检讨。周恩来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在"三反"、"五反"斗争紧张进行之中，如何正确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以便团结他们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前国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届时，中央正准备结合"三反"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号召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遍交代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活动，借以划清思想界限，提高干部的认识。为此，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指示》（草案），先在党内征求意见。周恩来总的认为，进行这样的交代，对于了解和掌握整个干部队伍的现实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但应有适当的界限，即主要限于交代同资产阶级有关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如果贸然追交思想关系，易使大家如陈其瑗先生那样，耽于搜寻思想联系，追根溯源了无止境，势必妨碍各项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这显然是不适宜的。为此，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又为修改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几点修改意见。

施复亮的检讨风波

差不多与陈其瑗检讨事件同时，劳动部在"三反"运动中，对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的施复亮作了思想批判，令其在劳动部工作范围检讨代表资方利益问题，同时还牵涉到施的个人历史，以及民建会过去走"第三条道路"等问题。施复亮花费很多功夫，写了一份很长的个人历史交代材料交给中央。

同时，在3月5日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议上，施复亮作了《重新检讨民建会的性质、任务和主体》的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一方面讲了自己与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的分歧，即不同意章所提出的"每一个民族资本家在统一

施复亮

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的大立场之内，可以而且应该有一个自己阶级的小立场"的主张；一方面检讨说，他虽然曾写过《章乃器同志思想的矛盾》一文去批评，"但没有根本否定民族资本家的小立场"，只是替知识分子和工商从业人员争取一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小立场"，"承认社会内可以有三种小立场和平共居"，这实际上是让资产阶级立场"占优势"。另外，在民建会代表谁的问题上，他虽然不同意章乃器的提法，他也主张"代表公私兼顾的私人利益，劳资两利的资方利益"，这也是错误的。施复亮总结说，"三反"、"五反"后，我以为民建会会员的立场问题，"应该努力争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彻底放弃任何企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动，……不能有任何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否则必然重犯"三反"、"五反"中暴露的种种错误和罪行。

毛泽东读到施复亮在民建会的发言稿，颇感超乎应有的尺度。他在凡涉及民族资本家、知识分

子、小资产阶级的“小立场”、“私人利益”和“资方利益”的词句下，划了粗粗的红杠，特别着重在“彻底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一语下，划了两道横线，并圈掉了让工商业者“信奉毛泽东思想”的话。对整个发言稿，毛泽东批了八个大字：“完全错误，一塌糊涂”。照毛泽东直观的看法，明明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组成的民建会，却要“彻底放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图”，对“团结、扶助民族工商业者”方针，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认为“要尽可能反映工商业者的各种意见”，也是错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何以会产生如此糊涂的认识？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三反”、“五反”运动中某些过激作法，已在统一战线内部引起思想混乱，而这与我们党内在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上的一些偏差有关。

应该说，“三反”运动揭露和处理了一批共和国的“蛀虫”，取得了共产党执政以来反腐败斗争初战的胜利。但由于运动限期推开，又要求各地方各部门层层作出“打虎”预算，使运动瞬息席卷全国，来势迅猛，不少地方和基层单位曾发生简单粗暴、乱抓资本家审讯的情况，党内也出现某些“左”的偏差。如中央统战部在指导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运动时，曾错误地提出“火烧工商联，打劫民建会”的口号；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学习》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时，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目前阶段仍有积极的一面，甚至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性描写成一种欺骗手段。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批评了这些原则性错误，对一些过火作法做了纠正，但其不良影响已经产生，施复亮等民主人士不适当的检讨，即为例证。为了规范划清思想界限的工作，避免诸如此类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草案时，注意吸取了有关这方面的教训和意见。

就劳动部方面来看，当时任劳动部部长的李立三，刚刚在1951年12月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议上受到党内批判，说他在主持全国总工会领导上犯了工会工作根本方针的重大错误，在国营企业工会工作中不是强调公私利益一致，而是强调公私利益的矛盾；在私营企业的工会工作中，则只看到劳资协商这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劳资斗争这一方面，“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等等。李立三由此被撤销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职务，转为集中精力领导劳动部工作。“三反”、“五反”运动一来，李立三生怕重犯“右的错误”，自然不敢稍有懈怠，在劳动部对代表资方利益的施复亮组织批判，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作为建国大宪章的《共同纲领》在这个问题上却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忽视劳资斗争固然“右”了，但是否认资方利益，不要劳资协商，却又失之过左。大概是为免李立三再度受到批评，当时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劳动系统工作的李富春就此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3月15日，李富春就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指示草案的修改问题，写信给毛泽东，首先对劳动部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李富春在信中写道：劳动部使施复亮被迫检讨一事上的错误，我亦应负责，当时我有“左”的想法，即是准备施复亮不宜再做劳动部工作，认为劳动部应保护劳动者利益而不宜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故同意在劳动部工作范围内，以检讨的形式使劳动部人员了解施，将来施离开时，不致发生问题，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私人企业来说，还需要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我又未掌握此问题，以至出乎范围，超出意外的追溯历史、中间路线，硬要把施变成工人阶级，否定民建会，以至使施在民建会作检讨等。如果我不同意施在劳动部检讨，或可不致发生此种错误……。

李富春对造成民主人士紧张情绪和思想负担问题所作的检查，是诚恳的，毫无遮掩的，并不推脱自己的领导责任，这显示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严格自我批评的精神。同时也表明，“三反”运动中，党内排斥民主党派人士的“左”的思想情绪，的确影响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3月16日，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结合政府工作的特点，对中央指示草案提出意见。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政府机关司局级以下有一批民主党派党员，他们交待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很难不影响和牵动民主党派及其上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觉得不交待不好，请考虑民主党派如交待时，可否让他们如周总理在政务会议上表示过的大家交待一下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自然不要追交，而是主动地交。李维汉还

提出，有关“民建会会员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是由当时报刊批判资产阶级“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提出后所引起的混乱，可否在指示中略加说明几句。

3月17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中央的指示草案提出几点具体修改意见，其中第三点谈到了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规定：对于某些民主人士，应规定由各级党委及其统战部门、政府党组好好掌握，首先由本单位拟定名单，经党组批准，免其交代为好。至于交代与资产阶级的思想联系，“恐要在交代社会关系之后，因这是长期细致的工作，要求急了，会收效不大，且会妨碍工作”。周恩来提出要注意上述两类工作人员之间多少有些程序上的差别。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对该指示做了一些修改。以《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于4月5日正式下发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并各大军区执行。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审阅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该指示稿首先指出，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毛泽东觉得在这里，应针对施复亮检讨等类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混乱，作一些分析和说明，故加写和改写了一大段话。

为什么民主党派不宜采用整风式检讨和批判的作法呢？毛泽东修改后的指示稿分析说：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这里，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强调说：“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在上述检讨事件发生过后，毛泽东对于施复亮等爱国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重视和爱护他们建设中国的积极性。4月间，施复亮先后在北京、天津调查了解工商界的情况，通过劳动部李立三部长向毛泽东送交了五反后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其中反映目前不少资方要求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加以明确规定，哪些权力应归职工，哪些权力应归资方；对于工人监督问题，也希望政府明确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和营业的范围，等等。毛泽东认为施复亮简报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他批示此件由刘少奇、周恩来阅后，交北京市市长彭真处理，并告天津市市长黄敬注意，要求在5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特嘱李立三转告施复亮，此件已阅，已告彭真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

毛泽东的亲自重视，使施复亮深受鼓舞。嗣后，他又应中央统战部的安排，抱病赴上海了解工商业情况，做资本家的工作，并向全市工商业家作如何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的报告，以至高血压病发作住进医院。在病榻上，施仍坚持口授，由秘书代笔写了有关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上报中央。到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施复亮时对他说：“施存统（施的原名）同志，你写的简报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呵！”施复亮回去后，兴奋地告诉秘书：“我们写的简报起作用了，毛主席看了都说好”。

不久，施复亮因病休养，离开

黄炎培

劳动部，中央又特意安排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罗叔章到劳动部任副部长，仍继续保持代表资方利益的格局。

黄炎培的忧虑与“激进”

实事求是地说，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年代，声势浩大的运动浪头一经掀起，沸沸扬扬、林林总总的斗争场景，的确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难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意图。

“三反”运动开始时，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在轻工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头一条讲的是“新民主主义的道德标准”问题，即“有利于广大人民的，便是道德，有害于广大人民的，便是不道德”，把属于人民所有的物资或财产，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取得（即贪污），或者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去消耗（即浪费），当然不符合道德。他号召：“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黄炎培从新社会、新道德着眼来谈三反运动的必要性，倒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视角。

随着运动向五反斗争扩展，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被大量揭露出来，不仅触目惊心，有的诸如用烂棉花充当卫生棉致残志愿军伤员的案例，简直罪不容诛。一时间，“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响彻全国城乡每一个角落，整个社会都愤而批判资产阶级“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铺张浪费、享乐至上等腐化堕落思想”，刚刚踌躇满志迎来私人资本的“黄金时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顿时在社会上声名狼籍。毛泽东认为，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这是一场恶战”！很显然，用黄炎培分析“道德”的说法，已经不能解释当前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主任委员，包括施复亮等民建会领导成员，觉得民建会无论如何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场，实在也是形势逼人，非表明态度不可，以至原来常说的使工商业者“能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同做新中国的主人”的提法，也恐怕被误解为“工商业者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工人、农民是平等的”，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从而不敢把团结争取工商业者、特别是大工商业家，作为自己的工作方针。加上运动中有人重提民建会过去搞“中间路线”，又背上历史包袱，觉得抬不起头，结果使民建会的工作陷于被动。

为了解除民主党派领导人的思想忧虑，毛泽东于3月15日约请黄炎培谈话，向他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毛泽东十分旷达地说：有人不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其实代表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是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对“唯利是图”的新解，以一种非常达观的态度点明了在《共同纲领》总框架下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神髓。

至于民建会从前走“中间路线”，毛泽东很客观地说“倒不必讳言”。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两党对立，很自然地会产生“中间路线”。如果民建、民盟、民革都不走“中间路线”，那另外会有人出来走的。不过时势演变起来，“中间路线”会分化，一部分走向反动那边去，一部分走向革命这边来。

毛泽东这席谈话，站在一个很高的层面，强调要从经济的观点，从大的远的方面看，现在中国的私人资本，在全国工商业经济上，比重还是相当大，向社会主义走，公私双方都需要发展的。私人资本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是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他十分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指出：从全国来看，有一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其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毛泽东说，要教育改造大工商业家，中间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的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另外，毛泽东还强调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不要光谈马列主义，而是应劝一般人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给予民建会领导人极大的鼓舞，他们经认真学习和领会，使民建会的工作又恢复了生气，通过团结、

教育工商界，使大多数工商业者在五反以后较快地恢复了生产，在《共同纲领》规定的范围内，合法地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于黄炎培来说，安定了情绪，继续做团结、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工作，并不隐讳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是一个方面；受到鼓舞，加快了思想前进的步伐，是又一个方面。

"五反"过后，民建北京市分会准备召开会员大会。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他向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并将其讲稿的要点送毛泽东审阅。或许黄先生为"三反"、"五反"以来工人阶级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所折服，或者痛感工商界如不加快思想改造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所抛弃，因而他在自己的讲稿中，要求工商业者"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的话，提出，要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等等。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整个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接受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审阅这个讲稿时，感到上述语句有些言之过激，遂将原讲稿中这些不恰当的语句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要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至于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毛泽东在修改时特别指明要"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9月5日，毛泽东复信黄炎培，指出："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何以"太激进"呢？毛泽东在信中解释说：资产阶级"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毛泽东赞赏黄炎培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也揭示他现在提实行社会主义"却还言之过早"。为了鼓励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毛泽东特在黄炎培的讲话稿中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黄炎培反复读了毛泽东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他深感毛泽东对自己的教诲和帮助是真诚的、同志式的。当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回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9月10日，黄炎培在民建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民建会工作方针的指示，并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作了题为《"三反"、"五反"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广大工商界人士普遍的良好反映。此后，黄炎培更加积极工作，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们作广泛的调查研究，并经常把所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也多次回信，对黄炎培积极向中央反映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和意见予以肯定和重视，并对他努力学习追求进步给予鼓励。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在逐步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建设和发展，林林总总，异彩纷呈。民主党派人士在"三反"、"五反"中的思想表现和变化，及由以引发的小风波、小插曲，大约能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变革年代轰轰烈烈、日新月异、除旧布新、千变万化的社会风貌。同时，也可以看到在建国初期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中共领导人在总体上还是悉心地保持了比较达观的政策和政策实施中的分寸和尺度，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与民主党派真诚团结合作建国的政治格局。而"三反"、"五反"运动中党内出现的"左"的情绪和过激作法，也表明要切切实实不折不扣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责任编辑：余广人）

我所了解的“安展”及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创作

● 张培森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缘起于一个特定的展览

从“文化大革命”经历过来的四五十岁以上的北京人也许还会有印象，1967 年到 1969 年，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一直开放着一个展览，门口广告牌子写着展览的名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以下简称“安展”)。每天成群结队的观众，胸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有的还戴着红袖章，不断地从博物馆的大门涌进涌出，成为“文革”初期天安门前一处引人注目的景观。

那时我是这个展览的负责人。这个展览的筹备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文革”开始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一名青年教员。在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自然都被视为“臭老九”，改造对象。但我因为年轻，又没有担任过领导，什么“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都还不够格，故有幸还被红卫兵列入“革命师生”的行列。1967 年 4 月的一天，红卫兵总部把我叫去，说现在首都“工代会”、“红代会”为了批判刘少奇工运路线，组织了一个“联络站”，你不是教过工运史课么，所以人大派你去参加。我奉命去了之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活动。

就在 1967 年 6 月这个“联络站”快要散伙的时候，我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奇想：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个展览岂不更好么。这个提议当即得到我周围 10 多个红卫兵的一致赞成。那时学校停课，各个学校都很乱，大家也都不愿回去，而且认为这个提议符合当时中央号召的“大方向”。对于面临的困难，我领着大家翻开了《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由此我便当上了这 10 多个红卫兵最早发起这个展览的“草头司令”。时隔 30 多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确实有三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我的这一提议，后来居然辗转得到周总理的批准，最后终于办成了“安展”；第二，没有料到“安展”又居然产生了一幅在“文革”中引起那样轰动效应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第三，自然更没有料到后来油画又被画家个人拿到市场上去拍卖，而且卖到那样高的价钱，以致又引发了一场如此大的权益风波。

必须指出，当初筹备的这个展览并非是一个单纯展示画家个人作品的美术展览，而是在当时有着特定政治内容的、以图片资料和文物为主的专题历史展览。然而展览内容又究竟为何定在“安源工运历史”这个特定的主题上？要说明这个问题就离不开当时整个大的政治历史背景。1966 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主席 8 月 5 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接着不久刘少奇被公开“批判”。也就在此差不多时候，江青、陈伯达在一次学生集会的讲话中就提到安源问题，意思是说安源煤矿首先是毛主席去的。再过一段时间就传出了毛主席本人关于安源工运这段历史的话来。毛主席说：刘少奇是第三代，李立三是第二代，第一代是什么人？跑了？听了

这样的"最高指示",红卫兵们又怎能不为此而"誓死保卫毛主席"呢?回想那个时期多数人的这种思想感情的确是真心的,谁不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话看得比什么都重呢?

因此,在1967年6月展览发起人员最初提出的展览设想中,从突出毛主席去安源活动历史要求出发,就拟定:除了陈列图片资料之外,还要展示一组毛主席去安源活动历史的大画。为此也就在发起的当月找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的教师郝国欣、学生王树琫两人,通过他们又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批学生,其中就有后来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刘春华(他的原名叫刘成华),是工艺美院学装璜的,那时他大约才20多岁。

虽然在展览的资金、场地和人员全都还八字没有一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说干就干",马上采取行动。行动之一是派人去调查和搜集资料;行动之二是我领着几个人一起去革命博物馆联络,争取同他们合作;行动之三就是组织美工人员去安源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刘春华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批下去人员人数较多,路费就是一个颇费周折的大问题,怎么办?经过商议,先从市总工会借了一笔钱,从而解决了去的路费,但回来又怎么办?在无法可想的情况下,发起者一伙全部出动到街上去叫卖小报和油印的材料,记得从王府井的南口到台基厂一带都去叫卖过。钱凑齐后,寄钱的同志提着一大兜子零票赶紧上邮局,去了半天回来告诉我说,办汇款的同志可有意见啦!几分几角,光点钱就点了半个多小时(最近,见到有的报纸说展览筹备,开头我个人拿出积蓄几千元,对此我必须申明没有那回事)!

就在资金、场地这些实际问题困扰着发起者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周总理准备接见江西群众组织代表,同时代表中就正好有一位我们曾经请来做过报告的安源老工人。于是我们便向他提出,希望他能乘此机会向总理反映我们要办展览的"共同要求",老工人欣然同意。但是老工人已经70多岁了,能不能在那种人多口杂的场合同总理说上话,再说即使当面反映了,总理又会不会立即表示支持?这些都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事。可是出乎意外的是,就在7月28日人民大会堂那一夜接见结束后的黎明,有人跑来告诉我说:"老张,周总理批准展览啦!"起初我真不敢相信,一看记录,果真如此。总理回答老工人的要求时说:"这个很好,可以搞,你们找工代会、红代会,给你们支持。"(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次接见谈话的详细记录打印稿)。这对于一心想要办成这个展览的这伙青年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喜讯。事实表明,总理的批准对于展览的成功是个关键。有了总理这几句话,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同意合办,并提供展览的场地。他们还同意在筹备时期让美工人员进到"革博"筹备现场进行创作,记得刘春华画《去》这幅画的场地就在"革博"一层展览室休息厅的东头。"革博"不仅提供了场地,还在创作所需材料上给了美工人员以尽可能的支持。不过那时美工人员不但不计报酬,同时也十分注意节约,一切因陋就简,后来我从"革博"同志那里得知,刘春华画《去》这幅油画用的画布,原是从"革博"仓库里找出来的一张旧画布,可见当时条件之困难。

总理的批准固然是个关键,然而从批准到筹

1967年8月,"安展"筹备组总负责人本文作者张培森给美术组及全体工作人员讲解由郝国欣设计的展览小样和内容,右图中排左二为刘成华

办成功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时主要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一年多的"文革"的冲击，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原有党政系统全都被冲垮了，一切"群众当政"，办事往往找不到负责人；二是群众组织内部到处分裂，北京高校红卫兵就分成了"天派"和"地派"。学生中的两派又影响到机关和工厂中的群众组织。到哪个单位去办事几乎都会碰到派性的问题。

但我们当时自身也有两个有利条件，一个条件就是展览的主题符合当时的"大方向"，再一个条件就是当初发起者来到一起的时候，北京两派还不明显，因此发起者中既有"天派"，又有"地派"，大家一直合作得很好。为了对付外边各种复杂的派性情况，我们还专门让一个"天派"的男同学和一个"地派"的女同学一起负责对外联络，果然有效果。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通过工代会，找北京市革委会批了六千多元，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又通过工代会批了一批展览用的木材，还从几个工厂请来10多个木工师傅以及其他工人。有意思的是，这一"天"一"地"的两位负责外联的同学，后来由"外联"变"内联"，喜结良缘，促成"天地结合"的一对，成为展览创办时期的一段佳话。

我所了解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创作过程

首先就我所知，《去》画确实是刘春华执笔画的，但同时也应该承认，这幅画从选题到创意以至整个创作过程，同样离不开"安展"筹备组织这个集体。

首先《去》画的命题就是展览会的组织者们提出的，我个人至今保留下来的一份最早展览内容设计提纲（草稿）中，在"毛主席亲自到安源播下了革命火种"这一部分里，就列有"毛主席徒步到安源油画"这一项。当初之所以提出这个设计命题在我个人脑子里也不是凭空的，这里除了那时传出来的毛主席关于他是安源工运的"第一代"的讲话外，同时我也有一点手头的资料根据，这就是早在1963年6月我亲自访问李立三时，他回忆说："我是1921年11月被毛主席派到安源工作的，毛主席去安源比我早，大概是1921年八、九月间……"（这次访问记录已经被收入一九九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一书）。再有"文革"前"人大"党史系与"全总"工运史研究室等单位合编的一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讲义，其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21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到安源煤矿开辟工作的时候，他背着一把破雨伞，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深入矿井，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工人群众中出现……"

但是为了彻底弄清毛主席去安源开辟工运的史实，展览会还进一步做了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展览发起者中有一位同学名字叫张栋林，人大党史系的学生，是我派他最早为展览做调查并搜集资料的。他先后到安源去过4次，有一次遇到当地两派武斗，经历了很大风险。除了他以外，还有好几个同志也都在那个动乱年代做过调查。我个人至今还保存着展览会油印的一厚本《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资料汇编》。展览中所陈列的6幅毛主席活动的大画（《去》画是其中之一）的命题，都是以这些调查为基础的。

在这所有毛去安源史实的调查中，可以说关于第一次去安源下的功夫最大。特别是这一次去安源的时间问题，起初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前面提到的讲义中的记载："1921年秋天"；另一种则说1920年11月，其根据是毛泽东该年11月25日写给欧阳泽的信，信中说："近因积倦，游览到萍"（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萍"就是安源煤矿所在的地区萍乡。然而这里记的只是到萍乡，到萍乡是否就一定去了安源煤矿，不能肯定。为了彻底搞清这个问题，展览会曾经通过当时担任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的王耀南同志（安源工人出身），请他托人去问毛主席本人。没有想到，毛主席真的传下话来说："20年我没有到过安源，记不清了。21年秋这一次是对的。"《去》画（当时这幅画叫《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所据的历史年代就是这样确定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下来的。

关于《去》画的创意问题,我想首先要说的,是美工人员创作之前,我们除了派他们去实地体验,并给他们印发过文字资料外,我作为总负责人还根据展览内容资料组商定的展览陈列方案,对照着美工组负责人帮助画的设计草图,专门给他们作过一次展览整体结构以及每个部分的内容介绍,着重地讲了对于每件美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要求。这里我还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不懂美术,但作为这样一个显然贯穿政治内容的历史展览,我必须根据历史资料向美工人员提出,并且他们也要求我必须提出关于每件美术作品的创意要求。而当时又找不到直接负责的领导可以请示,因此我所负的责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至于《去》这幅画的主题思想和创作要求,由于从命题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展览的美术作品中的“重头戏”,因此我不但在讲解的会上,而且在会下,也不只是我个人,而且内容资料组的其他同志,都向分工承担此画的刘春华事先提出过意见,当然那时也都是以商量的方式提出的,这些意见回想起来共同的或者说基本的有这样几点:首先,根据毛主席点明他是“第一代”的含义,要求此画充分展示年轻时期毛主席作为安源工运开拓者意气风发的光辉形象;其次,根据大致确定的历史年代,要求在画面背景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的时代风云;再一点,1966 年 11 月江青有一段关于毛主席去安源的讲话说:“安源煤矿是主席走去的,沿铁路一步步走去的,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据此在主席形象上要求突出“走去的”这一点,显示毛主席去开辟安源工运,深入群众的决心;至于毛当时的穿着打扮,因为讲义上早就有记载,“背着一把破雨伞,穿着一身旧蓝布衣服”,因此也要求在画面上如实地反映。

关于画稿的审定,在没有上级可以直接请示的情况下,我“把关”所依靠的也只有集体,“走群众路线”。记得展览所设计的大画在画家们拿出草图之后是进行过集体讨论的,我至今尚保留的 1967 年 8 月一页日记上就记有一个全面施工前的日程表,其中简要记载着:“30(日)上午画一讨论;下午画一讨论。”关于《去》这幅画,讨论中就我个人印象,不记得有过什么大的分歧和争论。要说有过不同意见,就是在画面上画不画群众的问题,因为江青说了主席在去的路上“遇到一个老乡就聊聊”,因此有人提出主席身旁是否画几个“群众”,这个方案刘春华本人不同意,我个人是始终力主画毛主席一个人的。由于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决了。

刘春华这幅画的动笔过程,我因为当时负责“抓总”,自然了解不详,但是我那里整天办公,以至吃住都在“革博”,美工人员作画的场地和工人施工的现场,我是几乎每天都要去转转的。《去》这幅画一直是刘春华一个人在画,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他给我的印象是画得很认真,画上一段,就仔细地站在一边端详、琢磨;但是他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过其他同志的帮助、指点,恐怕也是不可否认的。这次版权风波起后登在报上的那张提供的模特的照片我有印象。不过这幅画的关键部位是头像,为了帮助他画好头像,熟悉毛主席照片的“革博”姜渭宾找来毛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我记得提供临摹的照片主要是两张,一张是 1919 年毛主席和母亲、弟弟的合影,另一张则是 1925 年的单人头像。

我那时从画家们那里多少懂得这样一点:人物画的创作不等于简单的临摹。《去》画的制作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主席的头像,当画布上开始出现一个坚定略带思索的年轻的主席面庞时,我从心里就很赞赏,差不多一有空就要上楼去瞅它两眼,有时不免说几句肯定和鼓励的话。记得这幅画完成得最晚,直至展览开幕后,刘春华还利用观众接待间歇时拿着画笔到陈列大厅里做“扫尾”的工作,但那时毛主席意气风发的形象和风云突起的背景已经初步展现,所以我作为展览筹备的负责人是很满意的,觉得它把展览会当初对这幅画的设想和要求,比较完满地体现出来了。

展览的开放与《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发表

《去》画是 1968 年 7 月 1 日作为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赠送彩色印画形式正式发表的。然而此画能得到上面如此的推崇,应该说也是与“安展”近 9 个月的开放宣传分不开的。

“安展”从 1967 年 10 月开放到 1968 年 7 月 1 日结束,9 个月中,前 3 个月是预展,后 6 个月是正式展出。鉴于举办展览最初是周总理批准的,因此预展开始后就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周总理打报告,

请求中央派人来审查，而且也不只一次地将展览的小样报送周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但是上面一直没有正式派人来审查。上头尽管没有来人，但中央实际支持的态度，我们还是从一些迹象感觉得出来的。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周总理在 1967 年 12 月 22 日接见江西负责人程世清的谈话中就提到了展览。他说：现在搞了展览，政治上抓了，生产上抓不起来也不行。这个展览就是指的我们同安源联合发起的，后来又复制给安源的这个展览。这又一次表明周总理是肯定这件事的。预展中央没有来人却为什么后来能够正式展出，也是因为后来谢富治有句话：群众自己搞的就自己来管。据此，1968 年 1 月 16 日展览筹备处内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展览的正式名称，由四个单位主办：工代会、红代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市总工会，并推举我继续负责。会后请工代会、红代会几个头头来看了一下，展览就此于 1 月 25 日正式开放了。

“安展”从预展到正式展出，影响迅速扩大，观众日益增多，1968 年上半年人数最多时一天即达一万一千多人。《去》画的受到推崇应当说是与展览的影响扩大相关联的。但也应当承认，差不多从预展开始，《去》画本身就在展厅中引人注目，受到观众的称赞和好评，这也是事实。记得那里的观众留言簿上在赞扬展览的同时，也有不少单独称赞这幅画画得好的。记得大约在 1968 年 5 月的一天，《解放军画报》社派人来联系，要求将这幅画拍张照片，接着一天来了好几个人，为了拍照的光线效果，他们要求将画框卸下抬到大厅外边台阶上拍，这一举动不免引起我们的一些猜测。不久就传来江青在 5 月 19 日同浙江省革委会领导的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句专门说到《去》这幅画：最近有一幅画毛主席到安源去的油画非常好，把主席的神气刻画出来了。最近我调查了一下，才终于弄清，前面画报社来人拍照却是并非有上头什么指示，而是他们的记者事先看了展览，觉得《去》这幅画画得不错，为了想在画报上发表特地前来拍摄的。拍完之后报社先打出了几十张彩色样稿分送给了中央首长。江青当时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彩印的样稿。

出乎意料的却是，这幅画不久即以向党的生日的献礼的如此庄重的名义发表。现在回忆起来，就在“七一”前的晚上，我在“革博”的办公室里接到过一个没有说明单位和身份的人打来的电话，询问了《去》画是谁画的，名字叫什么，以及展览会的情况。从这个可以感觉得出来有来头的电话上，我预感到上面对此画可能要有什么动作，但却没有想到第二天这幅画就彩印出来随两报一刊发送给了每个订户，随之而来，街上就响起了庆祝《去》画诞生的锣鼓声。

当我第一次拿到这幅彩印油画时，心情自然是十分激动，而同时跃进眼帘的是画像下面的一行署名：“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　刘春华等执笔”。这便立刻使我联想到昨晚的那个上头来的电话，那时一般情况从文章到美术作品发表时的确很少署个人的名字，而这幅画署上了个人名字，我马上便意识到可能是上面鼓励年轻小将的做法。这次风波起后，我见有份报纸说这个“上头”就是江青，并且披露了当年小报上传出江青关于此画所作的一个批示，这在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批示是这样写的：“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油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属(署)上作者名字。江青 68 6 30”(见 1998 年 3 月 13 日《中华周末报》)。如果这个批示确实是真的，那末 6 月 30 日晚我接到的那个电话，很可能就是当时上头执行部门或者就是发稿的编辑打来询问并核实情况的。说起署名，其中还有一段小的插曲，这就是我在汇报中所造成的失误。我在电话回答上面询问作者姓名的时候，把名字给报错了，刘春华原来叫刘成华，可从我一开始所记的美工人员的名单中就把刘成华记成了刘春华。对此我曾经向他表示过歉意。他后来告诉我为此事有关负责人还征求过他的意见要不要更正，他当即表示既已如此也就不必改了。我后来听传说，姚文元知道此事后还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诗：“寒凝大地发春华”，说“春华”这名字也不错，于是也就将错就错，刘成华便改成了刘春华，一直沿用至今。

庆画的热潮和展览的高潮

在那个毛泽东被推向神坛颠峰的年代，《去》画以如此隆重的形式发表，自然在群众中成为一件轰动的大事。只要翻开 1968 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那一年京城纪念“七一”的两件引人注目的大

事：一件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和聆听钢琴伴奏《红灯记》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再一件就是庆祝《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发表。各报都纷纷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去》画发表的意义。《人民日报》为此发表在头版上文章的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7月9日)，《文汇报》的文章标题是“我们时代的最新最美的图画”(7月16日)。毛主席虽然没有亲自到展览会来观看此画，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油画发表不久，上面的确派人来取走过此画，说中央首长要观赏，将原画借去了一段时期。

事实上当时轰动的不仅是京城，而且在全国各地都一度掀起了一个“庆画”、“迎画”、“颂画”的热潮。至少与此画有直接关系的如安源，以及一些当时受中央直接“关怀”的地区和单位，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过庆祝油画诞生的活动。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报道中说安徽省合肥市特地用民航飞机将北京油画制作的印刷原版运去，还为此在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迎画仪式。

《去》画那时究竟印发多少，当时我们没有作过统计。1995年报纸上报道拍卖情况时说总共发行了9亿张，这个数目根据何来我不清楚，但是数量相当大则是可以肯定的。据知，当时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赶印此画，修复了停用10年的快速轮转机，需求之多可以想见。还应该看到的是，当时印行此画的不只是北京一地，许多地方只要有条件的都不断地翻印，仅上海一家广告公司将《去》画印成的小画片，即达3500万张。加上画像后来又印制成邮票发行，制成像章配戴，数字就更难统计。总之在一段时期，全国范围内，上至总理办公室（笔者记得周总理逝世后“革博”举办的展览中复制的总理办公室一角，就放有《去》这幅铁皮印制的油画），下至各个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大队、公社的办公室，乃至家家户户几乎都挂有这幅画像，有的家还不只拥有一幅；据一位当时在湖南的“革博”同志告诉我，有一位老大娘，把卖鸡蛋的钱全部都拿出来买了这幅画像，回家后把屋里的墙壁到处都贴满了。画的影响从国内也传到国外，仅我所知，新西兰共产党办的一期刊物的封面上就印过这幅画。

由于原画产生于展览，因此庆画的热潮也带来展览参观的高潮。展览厅内观众天天爆满，几乎每天都在五六千人以上，上自中央机关、中央办的学习班，下至一般群众，学校从中小学到大专院校，部队从战士到各大军区来京的首长几乎都要到“安展”来参观；许多中央委员和省军区负责人如王首道、杨得志、皮定均、巴桑(西藏)；还有一些名人如郭沫若以及那时的劳模、战斗英雄也都来参观过。油画发表后七、八月正是北京天气最热的时候，展览厅内当时又没有空调，面对如此多的观众，讲解员讲解过程中真是挥汗如雨，然而观众的热情不减。

为了改善条件，扩充内容，展览在这一年九、十月间还停馆修改过一次，扩大了一个展厅。这次修改谢富治批了几千元，修改后的展览布局显得舒展多了。修改前《去》画属于陈列第一部分，修改后放到了第二部分的正中位置，画框上披上一条红绸带，显得格外夺目。展览重新展出后又适逢首都工人将毛主席赠送的芒果转送给展览会展出。于是北京人不仅要看油画，还要看看外国人送给毛主席的芒果，参观人数更是激增，可谓盛极一时。

此外，展览的高潮还不仅表现在北京的接待上，而且外地许多省市前来要求复制的单位络绎不绝。由于开放时间要接待观众，复制就只有在晚间进行。因此，一段时期里是白天展览厅内观众人头攒动，晚间厅内则是灯火通明。除了外地复制之外，展览会还办起了流动展览。在1968年11月军宣队进驻之后，我就带领着一部分讲解员把流动展览办到了郊区，像城子煤矿、木城涧煤矿、燕山石化，以及厂矿附近的一些公社、驻军部队我都去过。关于整个“安展”开办的时间、参观的人数和全国复制单位的数目，在1969年展览结束前有个统计，从1967年10月开始到1969年8月近两年内，有250多万人参观了展览，全国来京复制的有27个省、市、自治区267个单位。

记得展览结束之前总理也是说了话的。因为展览影响不小，谁也不敢提出要结束展览。但是毕竟长期办下去也不是办法。于是，在1969年7月一次文教口负责人的会议上，文化部军宣队的领导就向总理当面提出请他去审查“安展”，总理这时讲了两句话，后来我听到的传达大意是：安源这段历史，他只知道一点，整个历史只有两个人最清楚，一个是主席本人，一个就是李维汉。实际就是说他不好来审查，而李维汉当时还没有“解放”。军宣队根据这个情况便商议决定用“暂停开放”的办

法结束了展览。我在“安展”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根据军宣队的决定，并在军宣队的主持下，代表“安展”与“革博”作对口交接，我清楚地记得“安展”的全部展品，包括《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在内通通移交给了“革博”。从此，我便结束了“文革”中长达两年的天安门前办展览的生涯回到了学校，不久就去了江西“五七”干校。

30 年后的感想与思考

筹办“安展”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了。30 多年后的今天，追忆往事，我的心情是既平静又不平静。平静的是我始终没有借此来谋什么个人特殊的好处，同时它也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烦恼。

但是，从跨越了我小半个人生的今天，再来看举办“安展”这件事时，思想中也确有许多感想和反思。首先应当说，《去》这幅画即使从今天来看，也不可否认还是一幅好画，反映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史实也是真实的，不仅如此，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许多我党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工农，开拓中国革命的决心和风采。但是，还应该看到的是，这幅画的另一面，即它的产生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是对刘少奇进行错误的“大批判”。《去》画缘起于“安展”，而“安展”则又缘起于“文革”。尽管它是直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周总理批准，自然后来也没有人为此事而追究过我个人什么责任，但是经过全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这个是非是必须分明的。从内心说，从我参加革命工作时候起，毛主席固然是我崇拜的领袖，而刘少奇也一直是我十分崇敬的领导人。但是，由于自身的幼稚与浅薄，“文革”中盲目地紧跟，结果做了一件当时看来符合“大方向”，而实际方向错误的事情，这使我今日反思起来仍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

然而，作为经历过那段历史，而又目睹了“文革”后 20 多年来巨大变化的一个过来人，我又同时有一种历史的幸运感。这幸运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党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在治国方略上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错误的理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对党史认识上终于摆脱了那套“路线斗争”涵盖一切的错误框架，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今日人们再来看安源早期工运那段历史，客观一点说，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都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去得早，后来又去过多次，这固然是事实，但他早期肩负着领导湖南省委的全面工作，后来又重点转向农运，他与安源工人直接接触的时间毕竟不如李和刘的长；而李立三办工人夜校，尤其是刘少奇领导工人大罢工，这都是在安源工人中早就留下深刻印象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事迹。而宣传这些事迹，应该说与宣传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并不相矛盾。然而“文革”事起却把前面这种宣传视为颠倒历史的蓄谋，又将这种没有根据的推测同阴谋篡夺最高领导的论断联系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起荒唐的历史公案。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应该从中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最后我谈一点对《去》画价值的看法。今年 1 月 25 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鉴定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可定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我作为产生此画的原展览会的负责人完全赞同。因为无论从它产生的背景和它后来的广大的影响，都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的记录。一个 20 来岁的年轻人画的一幅领袖画像，为什么会受到那样超常的赞赏和鼓励，进而受到人们那样如痴如醉的膜拜，离开那个特定的复杂政治因素，离开中国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在群众中的无比威望，离开那个时期人们普遍的对领袖毛泽东的神化心态，是很难理解这一事件的。我想也许这就是《去》画特殊历史价值之所在。10 年“文革”给党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令人痛心的，而且其错误的影响至今也还很难说是完全得到肃清。确定《去》画的历史价值我想决没有任何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含义，而保存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遗迹，可以说正是为了让后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和研究这段特定的历史。

（责任编辑　萧徐）

周恩来赴沪迎接李宗仁

● 高建中

1965年7月18日上午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737客机徐徐降落了，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陈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以及上海市民主党派负责人刘靖基、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等人，以企盼的目光，注视着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机门打开，一位为大家很熟悉而又分别多年的老人，首先出现在门口。别有一番情趣的是，来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敌对政权的首脑人物——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

尘埃落定，换了人间。李宗仁为新中国感召，毅然从定居了16年的美国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走出机舱门的李宗仁，首先看到周总理微笑着站在候机室门前，亲切和蔼地注视着他，便三步并作两步，上前伸出双手抱住了周总理。

周总理笑容可掬地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激动得难以自已，他连声说道："我回来了，回来了！"随后，他深情地问候："总理，你好！总理，你好啊！"

和总理一同前来迎接李宗仁的各位领导人，也都满面笑容地纷纷上来和李宗仁握手。

●毛主席批示："总理：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

争取李宗仁归国，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花费了近十年的心血。这期间，原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先生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五上北京，两赴瑞士的苏黎世，牵线搭桥。另外，李济深、张治中、李克农、刘仲容等原来与李宗仁有过密切交往的重要人士，也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全国解放前夕，以治病的名义到美国定居的李宗仁先生，感于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突飞猛进的成就，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决心回到自己的祖国定居。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度离美赴欧，揭开了他绕道欧洲回国的序幕。

6月28日，程思远再度飞抵苏黎世，迎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回国。

7月13日下午2时，李宗仁一行按照计划由瑞士起飞前往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于14日凌晨4时顺利到达。我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接到了我大使馆住下。

7月15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致电丁国钰："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

发报之前，此电报稿被送呈毛泽东审阅，15日一早，毛泽东看后在电报稿下面批示了两句话：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李宗仁抵达上海之前，周总理提前来到上海迎接李宗仁。

●陈毅说："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

在前往锦江饭店的路上，罗青长对程思远说，"总理一直很关心李德邻先生的安全，昨夜通宵未睡，一直等你们的飞机进入云南省境时，他才上床休息。"

总理昨夜通宵未睡，是有原因的——

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罗青长同志向笔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争取李宗仁回来，我们向蒋介石打了招呼，说不是对着台湾的，也不是对着你蒋介石的。但是，蒋经国指示他的特务机构要用尽一切办法阻挠李宗仁回来。李宗仁的飞机要经过缅甸，而当时在缅甸的北部，有蒋的部队，就是残匪李弥部，他们有高射炮火，是可以打飞机的啊！当时周总理很担心这个事，到时会不会出问题我们不知

道。所以我陪同周总理到了上海以后，住在宾馆里，总理是没有睡好觉啊！以后我向他报告说接到了有关方面的报告，说飞机已经飞到云南上空了，进入国界了，总理才放心睡觉。总理的事情安排得非常周密。"

就在抵达上海的那天中午，李宗仁和郭德洁简短地休息了一下。下午2时许，周恩来便来看望他和夫人及程思远了。

晚上，周总理在上海的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

入席前，李宗仁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握着李宗仁的手，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当时北伐军一共有八个军长。现在李德邻先生回来，我们就有四个军长在祖国大陆了。"

李宗仁心里明白，这四个军长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于是，他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入席后，有几位人民解放军的首长过来向李宗仁敬酒。周总理风趣地说："德邻先生，你们从前是打过仗的啊。现在你回来了，大家欢迎你。"

对此，李宗仁又是无限感慨，他添酒回敬，一饮而尽。

●周恩来说："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是没有前途！"

●李宗仁说："我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

19日上午10时，一辆小车载着李宗仁和程思远来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面见周恩来。这是周总理安排的，主要是对李宗仁在政治上做一些交代。其实，有关精神，周总理已经通过程思远向李宗仁交代过。而且，在7月12日，李宗仁从苏黎世机场启程的那天，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又预先将原国

毛泽东亲切会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

民党参加国共和谈的在京的代表、原国民党桂系在京的主要人物及其他一些在京的国民党部队起义的高级将领召集在一起，向他们通报了李宗仁就要回国的消息，阐明了中央对李宗仁归国的"四不可"、"四可"和"过五关"的政策。现在，他要当面向李宗仁交代清楚。从10时20分至13时许，周恩来和李宗仁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谈话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参加谈话的有国务院罗青长副秘书长、中央统战部刘述周副部长和程思远先生。

谈话开始，周恩来便风趣地说："现在，台湾在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错误的。国民党方面一切都落后，情报也落后了。对李先生的安全，我们最担心的是台湾方向。蒋介石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

"美国对李先生有胡思乱想，不至于整李先生。美国是实用主义。美国千方百计寻通中国的线索，可能把李先生也作为一条线索。尽管李先生的思想转变了，美国还是要胡思乱想的。但李先生不要怕它，美国不仅对在过美国的人抱有幻想，对大陆也有幻想。"

其后，周恩来就中美关系、"第三势力"、台湾问题等问题一一与李宗仁进行了坦率的交谈。

关于第三势力问题，周恩来说："李先生将在声明中对第三势力两条出路的意见是对的，或者投降人民，或者依靠反动派。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蒋介石，也不赞成共产党。"

按照事先的安排，即将飞往北京的李宗仁，要在机场发表一个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周恩来已经看过，并表示了同意。

李宗仁说："我在即将发表的声明中，会讲到，我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是一误再误。"

周恩来以坚定地口气说："第三势力活动肯定是没有前途！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时必然附于一种外力。不论靠美国靠日本，都必然要失败。"

"当然，当然！"李宗仁点头赞许……

最终认定第三势力没有出路，对于李宗仁来说，经历了一个并非短暂的过程……

早在1949年的夏天，在国民党政府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开始注重在政治上寻觅新的出路，就组织"第三势力"了，并着实热闹了一阵。但"第三势力"要成气候，必须有美国人的切实支持，李宗仁把争

取美国政府对“第三势力”的支持放在第一位。就在李宗仁到美国就医的时候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最终，他对美国援助的期望破灭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台关系得到了调整，美当局转而采取“扶台政策”。这一变化显然不利于香港“第三势力”的生存。

李宗仁很快发现“在海外搞什么政治运动，既无活动基地，也没有群众基础，不能期其有成”，最后的尝试失败后，李宗仁对“第三势力”所抱的幻想终于破灭了。

●周恩来说：搞“‘台湾独立’、‘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

●李宗仁说：“我是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

“四不可”中，另有一“不”，就是“不干预台湾问题”。于是周恩来谈到蒋介石。他说：

“对蒋介石，我没有李先生清楚，但我和蒋介石在过去的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一起，所以我对蒋介石了解比较深，此人没有一句真话，不以信待人，不可信。在东征的时候，关于孙中山去世的那封信，在东征胜利以后拿给蒋看，蒋当时痛哭流涕，一副极为伤心的样子。什么事也不干，关在房子里写祭文，这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其实，他的祭文写得最糟糕，只讲友谊感情，不讲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

然而，周恩来又讲到：“蒋不可信，但台湾保存在蒋手里还是比让美国霸占去好。”

对周恩来的这样一个重要见解，李宗仁又马上点头表示同意。

周恩来接着说：“蒋介石的看家本领就是军队，吴庭艳和蒋介石来往很亲密，蒋曾告吴，美国不可靠，军队千万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蒋在世以前，军队是要保持的。‘台湾独立’、‘两个中国’，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陈辞修一死，没有人能和蒋说上话。蒋也79岁了，余年不多，但是即使蒋死了，美国进来，台湾不乏有民族意识的人起来，重整局面。总还有爱国人士起来，英雄是时势造成的。”

李宗仁说：“实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美国把台湾看成不沉的航空母舰。但台湾和真的航空母舰不一样。”周恩来说。

说到这里，周恩来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又强调说：“李先生对台湾问题可以不干预。”

李宗仁理解总理的用意，如果自己在回到祖国以后，出面来干预台湾问题，是会使台湾问题复杂化的。既然蒋介石不许搞‘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说明蒋尚有爱国之心，自己也可藉以自慰了。于是，李宗仁说：“我是衷心地祈祷蒋介石活到百年。”

周总理说．“你希望蒋活到百年，是出于爱国之心。但蒋是不会相信的。他以为你讲的这些话，是为了取得他的部下……

周恩来的这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李宗仁。李宗仁在美国的这些年，对蒋介石是越发的头痛了！

最初，落身于大西洋彼岸的李宗仁并不是没有去台湾的考虑。用他在口述的回忆录中的话来说：

“吾人醉心于民主改革，非之绝无可为，不愿意看到国脉民命如斯而放弃奋斗。所以我在1952年2月病愈之后，即拟应杜鲁门总统之约，赴华府听听美国人对我们的意见。然后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台湾去，领导同胞，将台湾建设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使其不至变成如今日的贪官污吏、反动政客的逋逃薮。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心是中国的友人，关心民主政治在中国今后的推行，他一定会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我，让我团结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回台湾去着手民主改革，使蒋氏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

但是，李宗仁没有得到杜鲁门的支持，并且他很快便清楚地看到：

台湾，已经是蒋家的清一色的天下。在那里，蒋介石掌握着生杀大权。蒋已经造成了美国不援华则已，援华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下，自己若是贸然回台，以自己和蒋之间已经结下的怨恨之深，则是无异于自投罗网，将任蒋介石来摆布，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说不定自己将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呢！

想至此，李宗仁断然决定，暂时就在美国留下来。

李宗仁对于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的独裁统治是很不满意的。因而时时诱发着他回到台湾整饬振兴的念头，但不过是想想而已。

可贵的是，对于外界，李宗仁又从不讲蒋的坏话。他的这种心态，也正是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体现。不仅如此，他对于外界丑化和攻击新中国的言论，又能够自觉站在爱国的立场上，予以驳斥，维护着祖国的尊严。

1963年夏天，李宗仁曾经接受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的采访。从这此采访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这样一种心态。

那篇发表在7月14日《欧洲周报》上的《李宗仁先生访问记》中写到李将军这样一段话：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唯一的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我不把我的错误归咎于任何人。这些错误是我的。我不说我受骗了，他们抛弃了我。谁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这些理由的人。什么时候我

们曾经有过像我们今天有的这样一个中国呢?”

在这里,李宗仁坦率地倾诉着自己的爱国之心!那是一份难能可贵的赤诚!

●周恩来说:“美国是想压蒋退出金、马,把台湾据为己有。”

●李宗仁说:“台湾这个地方美国是拿不走的。”

周恩来与李宗仁的谈话,更多的是讲美国问题。“四不可”中,有两条要求李宗仁: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不做中美间桥梁。

周恩来说:“经过抗美援朝,美国已经知道中国的力量,朝鲜战争开始时,国外侨胞很担心。后来,中、朝人民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就不担心了。一年一年打下去,就更不担心了。在印度支那,美国要扩大战争,英国没同意,法国想拖下去,所以1954年日内瓦会议,在初期达不成协议,奠边府一仗,加速了协议的签订,法国拖不下去了。孟戴斯·弗朗斯一上台,就签了字。但美国不签字,事后却发表声明说,不破坏这个协议,真是奇怪的外交,美国在日内瓦协议上压了一下法国,就不能不在东南亚条约上为法国捧场。这个条约按马来亚、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老挝几国划分为保护线,但不把香港划到里边。这说明美国还不敢和中国碰。

“在1955年东南亚条约外长会议期间,艾登来了一个电报,希望在深圳和我见面,艾登想斡旋台湾问题,他的具体意见是,把金门、马祖以及沿海岛屿归还我们,我们可以提出台湾的主权要求,但台湾维持现状,维持到10年以后的若干年再说。这显然是为美国服务的,要我们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现状是合法的。美国是想压蒋退出金、马,把台湾据为己有,我们答复艾登说,欢迎你来看看,但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插手。

“1955年1月哈马舍尔德来时,还是谈这个内容。1955年4月,我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

周恩来谈到了亚非会议上的声明,李宗仁立即表现出非常振奋的神态,他说:“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声明,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响,对我的震动也是很大啊!”

事实上,李宗仁回归祖国的念头,也正是在听到了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声明后产生的——

就在那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在会议上提出了台湾的问题。周恩来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政问题,美国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关于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周恩来在声明中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的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和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严正立场,立即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一直在关注时局的李宗仁,听到了这一消息,高兴异常。几年来,他经常对比着祖国发生的变化,思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思考着台湾问题。

他分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是实力影响中国最大的一个国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却一直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李宗仁认为,他应采取适当方式,表示其立场,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同时,李宗仁也感到,台湾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不仅影响着中美关系,而且阻碍着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但怎样解决呢?这正是李宗仁多年思考的问题,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那些日子,李宗仁反复地研究着周恩来的声明,他前思后想,断然得出了结论: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此一声明,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于是,他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先生,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1955年8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形势,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他在建议中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在中国人之间,如假以时日,没有不能解决的事。经过一段和平共处的时间,就可以召开一个全国会议,由自由中国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试行解决他们之间的一切问题。

他在建议中说:“蒋先生比我年长4岁,今年77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一下近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的建议发表以后,海外反共人士舆论大哗,在他们的眼中,李宗仁的建议极为荒谬绝伦,狂妄已极。而在一些爱国人士的眼中,李宗仁的声明,则被看作他认清形势,走上热爱新中国道路的起点。

对李宗仁的态度、立场上的变化,周恩来引起了注意。于是,在国内,酝酿并开始了争取李宗仁归国的工作……

话说回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的声明发表以后,又产生了哪些国际上的影响呢?在与李宗仁的谈话中,周恩来讲到:

“美国看到有机可乘,就通过

英国和我们达成了大使级谈判协议。日内瓦会议，我们把美国估计高了，在中美大使会谈前，就主动放了一些美国战俘，这是个缺点。但也证明中国并不是没有善意的。

“在日内瓦谈判中，达成了一个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我们把美国在中国全部侨民名单给了它，但它至今也没有给我们，美国在国际谈判中是失透了信用。我们从此得到了教训，以后和他谈原则问题，不谈具体问题。原则是，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美国和平共处。和美国和平共处本来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借此揭露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本质。结果，美国政府不敢承认但也不敢公开反对，这一着它输了。另一个原则是，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地区和台湾海峡，这一条美国也不敢签字。达不成协议。原则问题达不成协议，具体问题就没法说了。

“蒋介石如果从金、马撤兵，就要不到美援，就不能再叫‘反攻’。如果中国拿原则做交易，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金、马及沿海岛屿归还中国，中国保持对台湾的主权要求，维持台湾现状若干年。但我们不拿原则做交易，不能这么做。如果是蒋介石处于我们的地位，他们就会这么做。台湾也担心这个问题，1958年我们金门打炮，发表声明，台湾放心了，并且增兵金、马，做工事。台湾对美国说，中共在打炮，不增兵，不做工事不行。1961年7月，陈诚访美，美国让陈诚看了中美会谈记录，陈反而很受感动，知道我们不拿原则作交易。我们的金门打炮苏联害怕，怕惹起中美战争牵累他们。我们把意图告诉苏联后，苏联才硬起来。发表声明，给美国照会，说要用导弹对付美国。美国把照会退了回去，苏联又软了，不吭气了。

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金门打炮，讲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那是1958年，美国政府为了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竭力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企图制造“划峡而治”的事实。蒋介石坚持要反攻大陆，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出动军队，不断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8月23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周恩来亲自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这次行动的目的是，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状态，并利用美蒋矛盾，打击美蒋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企图霸占台湾，让台湾蒋介石集团把台湾同大陆分开，划峡而治。实际上这是一场政治仗。

在美蒋矛盾面前，中共中央实行了“联蒋抗美”政策，与其台湾被美侵占，不如给蒋看管。炮击金门时，毛泽东曾经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并把“联蒋抗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台湾当局也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对此，海外说法不一，李宗仁向周恩来介绍了海外一些人的看法。随后，他断言说：“依我的观察，台湾这个地方美国是拿不走的。”

周恩来点点头，对李宗仁的话表示了赞成。随后，他说道：“国内也有一些人对美国认识不够，李先生从美国回来，可以和他们谈谈。

“对美国的幻想不会一次打破，要多做工作。至于美国对我们的幻想，对李先生的幻想，不必打破它。让他们胡思乱想去吧。李先生到北京发表声明，要把美帝国主义讲清楚，对美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这对国内一部分人，对海外侨胞都有需要。”

●周恩来说：“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

●李宗仁说：“郭德洁要找个女同志把她好好训练一下。”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钟头了，周恩来依然孜孜不倦，李宗仁依然兴致勃勃。

他饶有兴致地倾听着，很少插话。他希望总理能够尽可能多地向他谈一些。毕竟，他离开祖国已经十几年了，对祖国不了解，对时事和政治也远离了许多。现在回来定居，有许多的事情要从头学起，有许多的事情要注意到政策和分寸。

这时，周恩来又说：“刚才是讲的‘四不可’，现在再谈谈‘四可’。

“李先生说，回来不再出去了。但是来去自由还是要说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你的问题，还有你太太的问题，你太太可以去香港。”

李宗仁听总理讲到了郭德洁，马上反应说：“郭德洁要找个女同志把她好好训练训练。她出言无状，不知高低。对我多少年来，总是闹别扭。我说东，她说西；我说对，她偏说错。我干了大半辈子军队，总还算打过几个胜仗，她说，如果她指挥军队，仗比我打得漂亮。……”

周恩来立即哈哈大笑起来。其他几个在场的人，也禁不住笑着。周恩来边笑边说：“照你这样说，李夫人是个好内助嘛！”

其实，周恩来明白李宗仁为什么要这样说说郭德洁。

那是在6月27日，李宗仁在瑞士时，有一次，我驻瑞士参赞徐淡庐会晤李宗仁，谈话期间，郭德洁的态度显得傲慢，说了对宋庆龄不礼貌的话。李宗仁要借此机会说说郭德洁，是要圆这个场的。

周恩来想到了这一层，接过话头说：

“孙夫人真了不起，和中山先生生活过10年，中山先生死后，单独生活了40年，并且发展了中山

先生的革命主张。孙夫人的文章从来都是自己写的。用英文写那么好的文章，国内还找不到第二个，孙夫人的精神很好，政治上有见解，有骨气，有能力，真是国之瑰宝。"

李宗仁听总理这样一说，知道误会已经消除了。没有再说什么。周恩来接着说："郭德洁如去香港，过一些时候为好，安全比较有保障。"

李宗仁坦诚地说："暂时，她还没有这种打算。"

周恩来又说："关于'过五关'，程思远先生也给你传达过去了，今天时间不早了，我还有其它的事情，不能多讲。

"这'五关'，主要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家族关、生活关。是立场问题。社会关，人是有几个社会关系，你完全不管，他就乱说。你要管就要做思想工作。当然主要是由社会去管，个人管不如社会管好。家族关，人总有一群亲属，我原籍浙江绍兴，乔居江苏淮安，解放后一块故地、一幢房子就处理了15年。生活关，解放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高级民主人士生活有所下降，地富分子要参加劳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资金有22亿元人民币，公私合营后给他们5%的定息，10年了，他们拿去的定息已经占22亿的50%。他们的生活很安定。但国内没有夜总会，没有跑马场，总有些人不那么满足。

"这'五关'，政治关是开头，政治上总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思想关是根子，只有社会关、家族关、生活关过了，根子才会巩固。社会是进步的，要求大家跟上去，跟不上就会有错误言论和错误行动，错误是不能原谅的。有些朋友过去划为右派，他们的环境不那么好处，心情不那么舒畅。李先生回来可以和他们谈谈。

"陈辞修曾说，对中共问题，不要违背时代潮流。这不仅是台湾问题，大陆的朋友也要跟上时代潮流。邵力老看问题偏于保守，所以我们总有点争论。但此人有个优点，不搞阴谋，有话当面说。"

……

谈话进行到这里，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道歉似地讲："就到这里吧！我们该开饭了，服务人员已经等我们很长时间了。"

……

7月20日上午，李宗仁和周总理等人一同来到了机场，周恩来说："我先飞20分钟，我在北京欢迎你们！"

11时，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飞抵北京。此时，周恩来已经在机场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总理、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等各方代表112人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

栖迟海外十六载的李宗仁走出机舱，看到机场上彩旗猎猎，人群攒动的热烈欢迎的场面，一时竟无语凝咽，热泪盈眶。他激动地高举着手中的礼帽，不停地向欢迎他的人群致敬。

机场大厅里，悬挂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和毛泽东主席半身雕像。在这里，李宗仁先生庄严地宣读了他的声明。

他说："16年来，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责任编辑：木　易）

周总理从上海提前回京，在首都机场迎接李宗仁夫妇

陈毅陪同李宗仁观看演出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

●穆　欣

70 年代初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在北京前海西街 18 号寓中

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在这场浩劫中，知识界首当其冲。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开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诬害，陷人入罪的恶劣先例。这种刀笔吏式的棒杀，迅速波及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江青一伙张开的垂天大网，正将无数中国杰出的文化精英驱进文字狱的陷阱。以往，毛泽东每当谈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把郭沫若当作一个应予保护的标兵，提出“不能批判郭老”。毛泽东曾经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准批。1966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又说：“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在毛泽东的眼里，郭沫若不仅不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而且还因其特殊影响而应继续给予切实的保护。可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郭沫若身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眼看一群凶狠的虎狼陷害忠良，使科学界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祸从天降，无端遭到残暴的凌辱迫害，自己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免痛楚彻骨，寝食难安。特别是对田汉、翦伯赞的严酷批判（两人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使他震惊，也感到愤懑。这两个人，一个是戏剧界的泰斗，一个是史学界的权威，又都是他非常了解，长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老朋友。有一天，他在报上看到批判田汉《谢瑶环》的长篇文章，无限上纲，大张挞伐，曾经激动地说过，像田汉那样“为民请命”是要倒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现在不少人在造我的谣，我也会像田汉那样受到批判的。当他听说已故画家傅抱石家被抄，画被洗劫一空时，悲愤不已，悄悄对秘书说：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解决抱石家的困难，拿不出钱，就把我的书籍字画卖掉。他的处境十分严峻：江青一伙从不把郭沫若放在眼里，只是碍于毛泽东多次发话“保护郭老”，对他暂还“留有余地”。虽然这时还不曾有任何批判文章点他的名，但他已经受到江青一伙的诋毁诬陷，已经使他预感到“在劫难逃”，灾祸随时可能降临。

1966 年 1 月 27 日，正当这场斗争从意识形势领域转入政治性挞伐，错误的批判汹涌展开的时候，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信，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的要求。他说：“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

这年 4 月 14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即席发言否定自己的全部著作，提出要把自己所有著作烧掉。他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

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接着，他进行了检讨。他说：“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切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

他在发言结尾，心情沉重地说：“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又说：“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地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郭沫若发表这篇演说这天，我正好离开北京前去上海。我是在上海一个会上，听到康生谈起郭老这篇发言的。康生和郭沫若同是第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在上海谈到这篇发言的时候，就说先由《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其时康生和陈伯达刚在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回到上海。估计毛泽东先已看过这篇发言，决定发表此文未必全是康生的主意。4 月 28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发言。5 月 5 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这篇发言，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事后得知：这篇发言正是由康生送经毛泽东批示发表的。)

郭沫若这篇发言宛若爆裂一颗巨型的炸弹，特别在文化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震撼。它不但在国内引起震荡，国际上也反应强烈。苏联、东欧许多报刊就此说东道西，西方国家舆论更曾借此掀起一阵强烈的反华反共鼓噪。这年 6 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 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7 月 4 日，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的第四部分介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一部分谈到自己 4 月 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郭沫若说，石西民的报告“使我深受感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表达我衷心的感受”。他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作为对西方国家反应的回答：

两个半月以前的 4 月 14 日，我们听取了文化部负责同志关于文化工作的报告，讲到我国文化革命的成绩，讲到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在文化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使我深受振奋，我便即席发言，坦率地作了一次自我检讨，表示我衷心的感受。这种深切的感受，一方面使我为文化革命的胜利庆幸，另一方面也使我不能不引起作为知识分子的应有的责任感。我检讨了自己，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郭沫若在这里说，“烧书”是他“出自内心深处的声音”。他的解释出于他当时的认识。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深受当时正在全国泛滥的个人崇拜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只有努力“紧跟”。而且由于处境异常险恶，有时他也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策略，难免要说一些违心的话。

关于“烧书”，一年以后郭沫若还曾把它解释为“凤凰涅槃”。当时有位青年文学工作者徐正之，对郭沫若“烧书”的讲话“颇有看法”，在他正在撰写的有关郭沫若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中写道：“简单地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

1972 年 9 月 28 日，郭沫若陪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参观故宫

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1967年8月24日，徐正之经过《人民日报》编辑部，把他这篇文稿附信寄给郭沫若。第二天，郭沫若看过他的信、稿，及时亲笔作覆说：

>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
>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见1997年9月15日《文汇报》)

这样解释，仍有否定过去的意思，同时也可看出他把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作一次"自焚"，以求得到"再生"。

虽然郭沫若的"辞呈"谁也不会"照准"，他的著作人们也都不肯烧掉，但是郭沫若的担心并非"杞忧"。冲击、打倒郭沫若原是江青和康生、陈伯达蓄意已久的阴谋。他们并不只是要打倒一个郭沫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正如他们先从吴晗打开缺口，进而打倒彭真一样，他们是将郭沫若和周恩来绑在一起鞭笞的。所以，尽管毛泽东多次指示"郭老不能批判"；"文革"伊始，周恩来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宋庆龄之后第二名就是郭沫若。由于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形形色色的造反派还是采取造谣诬蔑手段，给他捏造种种莫须有罪名，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广播不久，有的高等学校就贴出"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有一所专门开辟出来的房间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其后各种骚扰诬陷和暗中传播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使他难得片刻安宁。

当时那些造反派虽还不能破门而入抄家、揪斗，随着运动不断加温，很快突破了"内外有别"界限，大字报早已贴到郭沫若前海西街18号寓所门前街头。他们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社会横飞乱喷。许多骇人听闻的"罪名"，种种下流的污言秽语，全都朝他喷射过来。其中编造得最为离奇而恶毒的，竟然诬陷他在不久前为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字样。如此指鹿为马的诬陷，岂不是欲置郭沫若于死地吗？一些深受蒙骗，不明真象的红卫兵，曾经为此聚集到郭沫若寓所门前，"勒令"他限期交待"反毛泽东"的罪行。周恩来为避免发生意外，提前安排郭沫若转移住地。郭沫若为此写了一首《水调歌头》，揭露江青一伙的横蛮诬陷和他当时激愤的心情。这首词前有小序记写了事端缘起·"《欧阳海之歌》书名为余所书，海字结构本一笔写就。有人穿凿分析，以为寓有'反毛泽东'四字，真是异想天开。"词中写道：

> 海字生纠葛，穿凿费深心。
>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为佥壬。
> 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
> 罪恶十分深。
> 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
>
> 初五日，零时顷，饬令严。
> 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
> 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
> 朱色看成蓝。
> 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
> (词中"佥壬"，是古语卑鄙小人的意思。)

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经常为这家报纸撰写文章。他的许多重要学术论文，都是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常有向他请教的机会。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除在大会场合以外，就难见到他。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讨论会闭幕式上。大约由于经常感到精神压力，饱受惊恐折磨，这时他特显苍老疲惫。

在这次会议之前，5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文艺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郭沫若虽然出席了大会，却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他原是中国文艺界的领袖，竟无在大会上发言的资格。这次大会全由中央文革小组一手包办：江青主持，陈伯达致开幕词，戚本禹作了冗长的主题报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军的建军纲领》。陈伯达和戚本禹的发言，不但继续"造神"运动，把《讲话》吹得不着边际；还都声嘶力竭地吹捧江青，把她抬上"文艺旗手"的宝座。陈伯达"特别提到""江青同志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戚本禹则把江青吹成"文化战线上的战士"，说她"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向剥削阶级的老爷们盘踞的艺术舞台发起了进攻"。

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大会过后两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

《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江青一伙竟然故意删去了其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这句极其重要的话。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期曾经公开发表，广为流传。此刻删去这句众所周知的文句，意在告诉公众：郭沫若不配享有这个历史评价。他们这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法，自然是要暗示郭沫若"有问题"，煽动造反派向郭沫若冲击。这事显示郭沫若的处境不妙，对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仅使他深感难堪，更增长了恐惧和不安。

在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文艺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仍然受冷落。在这天的会场上，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以及凯尔、西园寺公一等均安排在主席台第一排，而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并代表讨论会在会上致闭幕词的郭沫若，却被安排在主席台后排就座。由他代表参加讨论会的"同学"致闭幕词，次序排列在最后。这天会议又是由捣鬼有术、正飞黄腾达的"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组长"戚本禹来作"长篇讲话"，而寰宇驰名、举世尊敬的文学泰斗郭沫若在致闭幕词时，还得说一声"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真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人无名。"屈原赋《卜居》的精辟概括，何等切合此时此刻的情景！

闭幕词的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年逾古稀的郭沫若说："我自己是一位毛主席的老学生，但是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得很差，用得也很差；学得不活，用得更不活。我希望同学们对于我要不断地加以鞭策，使我能够跟得上同学们的步伐不断前进。"这时江青正在爬向权力的顶峰，飞扬拔扈，气焰薰天。郭沫若对于这个自封的"文艺旗手"本来异常憎恨，但在这种场合，还是强自压抑着内心的怒火，在讲话时朗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违心地表示愿把这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郭沫若一贯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坚持真理，经常同恶劣环境和习惯势力作斗争，是最厌恶虚伪造作的，而今却不得不对自己最蔑视的这个"旗手"虚与委蛇。不难想象，此时此刻他的心里该会多么痛苦！

纵然这样，心毒手狠的江青，对郭沫若依旧穷追不舍，毫不留情，其后江青不顾毛泽东的指令和周恩来的劝阻，曾和张春桥连续闯进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的家里，逼他写"检讨"、写"批宰相"的文章，都被他坚决顶回去；1974年1月25日，在首都体育馆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江青悍然点了郭沫若的名；江青还曾多次到北大组织大批判组搜集、摘录郭沫若著作并大量印发，企图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后因毛泽东发觉才被制止。

郭沫若在十年动乱中饱受惊恐煎熬和忧愤折磨，还接连失去两个儿子：当兵的儿子郭民英死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被一伙将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极"左"分子非法关押、酷刑残害而含冤离开人世。这对他们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

江青一伙残酷迫害郭沫若的罪行，在他病逝以后，夫人于立群所写悼念他的文章中曾经加以揭露。

还在1973年，江青就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妄图公开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老，胡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来，当面逼迫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江青一伙的狂妄无知、居心叵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了极点。他当即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无耻之徒，他冷静地对我讲："历史自有公论……"

在十年浩劫中，江青一伙打倒郭沫若的阴谋所以未能得逞，固然首先是因毛泽东发了话，但主要依靠周恩来竭力保护，郭沫若才得以在没完没了的诽谤、凌辱、惊恐、悲怆和病痛折磨中，闯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1968年4月9日，江青一伙唆使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将在那里读书的郭世英绑架、关押，并残酷拷打致死。周恩来得知郭世英含冤死去的不幸消息，亲到前海西街寓所向郭沫若全家吊慰。以后他还两次派联络员去调查此案。因为当时江青一伙横行，造反派嚣张，两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到了后期，江青、张春桥不顾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劝阻，赤膊上阵，亲自对郭沫若刁难迫害。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一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点郭沫若的名，说他是尊孔的。会后不久，张春桥又窜到郭沫若家中，逼他写"检讨"、"批宰相"、被他严词拒绝。2月10日下午，江青又找上门来，纠缠折磨郭沫若3小时，当晚他就发高烧达39℃，住进医院。"批林批孔"大会前后，周恩来两次亲临寓所看望郭沫若，给予安慰。当江青在"批林批孔"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的晚上，周恩来得知郭沫若病倒了，特意派人到他家中，就郭沫若的健康与安全下达了四点指示：(一)郭老已是80岁高龄了，要保护

好郭老，保证他的安全；(二)为保证郭老安全，24 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三)郭老家的房间和走廊内要铺上地毯，以防滑倒；(四)请郭老从小间卧室搬到大办公室住，以保证充足的氧气。并指定郭老的秘书王廷芳负责。郭沫若患的是肺炎，此后反复发作，出现多次险情，都被抢救过来了。周恩来经常关注他的病情和医疗，还派自己的保健医生到医院探望。

郭沫若心里非常清楚，他是依靠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保护，才得闯过这场劫难；当时总理不顾自己处境的极端险恶，对他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尤其使他铭心刻骨，没齿难忘。1976 年 1 月 8 日，当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时，郭沫若悲痛欲绝，病情骤然加重，以致双腿站不起来，在病床上写下饱含深情的悼诗：“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还用颤抖的手在日记中写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寄托他的不尽哀思。1 月15 日他抱病参加了总理的追悼大会。他是坐着轮椅去的。该站起来致哀时，两人左右扶持都站不起来，他用尽力气，才挣扎着站起来，向最敬爱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见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

令人庆幸的是，郭沫若终于亲眼看到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灭亡。得知彻底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郭沫若怀着无比欣喜的激情，写出国人争相传诵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欢呼党和人民的胜利。

十年浩劫，郭沫若历经磨难，身心交瘁。他的病反复多次，一直未愈。1978 年 6 月 12 日 16 时 50 分溘然长逝。6 月 18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表达了党和人民的深切悼念，对郭沫若光辉的一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悼词》推倒了“四人帮”强加给郭沫若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涤荡了泼洒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表彰“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这是对在那场空前浩劫中备受磨难的郭沫若的最客观、最公正的评价。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发行

《炎黄春秋》创刊七年来在国内读者中享有较高声誉，在海外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很多新订户要求购买前几年的刊物，但 1995 年以前的存刊除少数几期外，已全部售完。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编辑部组织力量，从 1995 年以前 45 期的 650 万字中精心筛选出 150 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这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欲购此书的读者，可直接向我社发行部汇款邮购。各卷定价分别为：

《历史迷案揭秘》定价 22.00 元

《政坛高层动态》定价 23.00 元

《名流写真》定价 23.50 元

《血荐轩辕》定价 23.80 元

《重大决策幕后》定价 23.80 元

全套 116.10 元。另加书价的 10% 的挂号邮费。

本社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邮政编辑：100007

电话：(010)64072452

联系人：谷世章

彭雪枫与《拂晓报》拂晓剧团

● 王申红

彭雪枫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他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新四军第四师的发展和壮大，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曾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好榜样”。彭雪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位模范的政治工作者，在治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彭雪枫的政治工作经验，对丰富和发展我军政治工作有重大的建树。本文拟就彭雪枫政治工作中的一个方面——他与《拂晓报》和拂晓剧团的关系——来展示其卓越的治军才能。

彭雪枫说：要打倒敌人，取得胜利，不但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如此。毛泽东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人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新四军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也曾经说过：“在目前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我们要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这就需要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一致奋斗的人的条件。同时要能促成敌人的兵心动摇，厌战，反战以至于自行瓦解。这就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就是要用宣传鼓动、教育、说服、推动的办法，来动员一切人力，有决心、有信心的去进行战争，克服一切困难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彭雪枫在转战豫皖苏边、创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他说：“要打倒敌人，取得胜利，不但要打军事仗，还要打政治仗、宣传仗、经济仗。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和嘴巴，在战斗连队真刀真枪的干固然重要，在剧团演戏，作宣传工作同样重要。蹦蹦跳跳，演演唱唱，写写画画，在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唤起民众，团结友人，瓦解敌军等方面，一样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豫皖苏边区，彭雪枫一面领导敌后抗战，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一面创办、关心《拂晓报》和拂晓剧团，武战文战，双管齐下。在当时，文化娱乐工作已成为“支队最大的特色，成为部队……推动一切工作与保障胜利的有力助手。”

彭雪枫说：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

1938年9月29日，《拂晓报》在河南竹沟创刊，并随军东征。彭雪枫为该报命名，并题写了报名——《拂晓报》。在发刊词中，他对“拂晓”二字的含义作了激情洋溢的抒发：“‘拂晓’代表着朝气、希望、革命，勇敢、进取，迈进，有为，胜利就要到来的意思。军人们在拂晓出发，要进攻敌人了。志士们在拂晓奋起，要闻鸡起

1938年，彭雪枫（左六）与叶剑英等在八路驻陕办事处

舞了。拂晓催我们斗争,拂晓迎来了光明。"彭雪枫曾经说:"一支笔胜过两千支毛瑟枪","一份报纸就是一个好指导员，一篇好文章就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报纸蕴藏着无穷的战斗力。把报纸办好了，比一个团一个旅的作用大多了。"因为彭雪枫深知报刊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 他对创办《拂晓报》真是呕心沥血,战胜了各种困难,付出了巨大精力。

《拂晓报》初创之时，印刷条件相当艰苦，当时只有一架不能正常使用的油印机，两支秃铁笔，两块锈钢板,两盒劣质油墨,一把凹凸不平的胶油印滚,半筒蜡纸。以如此简陋的设备印刷出的《拂晓报》模糊、斑点多,且一次最多只能印30张。要改善印刷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取好的印刷设备，因此，彭雪枫和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等经常交代战斗部队的一条"政治任务"就是:凡发现缴获物资中有油印机、钢板、铁笔、油墨、纸张等,一定要派专人送到拂晓报社来。彭雪枫还自己出资17元银洋为报社买回一架油印机。为提高印刷质量,1940年春,彭雪枫带领报社人员开展了一场《拂晓报》的"技术革命"。彭雪枫告诉大家,要把技术上每个困难细节都列为"革"的对象。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和协作下,报社调动一切积极性,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使印出的《拂晓报》版面清楚、美观,而且数量多,每期蜡纸版的印刷发行量上升到3200份甚至达到4000份。

为使《拂晓报》准确、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地发挥其党的喉舌的作用,彭雪枫对《拂晓报》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自《拂晓报》创刊那一天起，彭雪枫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期报纸印出后，第一张首先送给他，他照例用红蓝铅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打记号,做眉批,记下优缺点。从安排版面,选用字体到印发、校对、发行,甚至使用标点符号，或纠正文章中的错别字，他都经常地给予指导。如发现标题、文章的提法有原则错误,便马上派人把批过的报纸送给报社，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改正和重印。

在彭雪枫的领导和关怀下,《拂晓报》历经艰难险阻，成了活跃在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有影响、有战斗威力的党报。完成了"支队全体指战员们的政治上的指南针，···通过它而大大的展开了部队的政治教育、党的领导和文化娱乐工作·· ···提高了指战员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水平。"同时,也"大大加强了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战斗勇气。"1941年冬天,彭雪枫带着他的起到"报道组"作用的工作组来到骑兵团驻地坐镇整顿纪律。彭雪枫在全团大会上严肃批评了这个团的"功臣自居思想"、"骑兵特殊论"，进行了"为谁当兵"和共产党与国民党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观念,立下了"在敌人面前要象猛虎,在老百姓面前要象绵羊"的誓言，定下了遵纪爱民公约。这支英勇善战部队的遵纪爱民传统又恢复起来了。对此事件，彭雪枫为首的工作组和骑兵团报道组写了一组组整纪稿件,在《拂晓报》上连续作了5次生动的报道,在部队和地方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拂晓报》在"提高沦陷区域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唤醒民众们的民族意识方面,它也尽了它所能够尽的力量,而且又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同时,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方面,"它以最尖锐的词句,理直气壮的声调,有凭有据、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事实",击破了敌人的"倒蒋反共"的阴谋毒计。民主人士田丰先生,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感到失望,在彷徨中阅读了《拂晓报》,深为共产党的爱国救国之志所感动,毅然投奔革命。他在欢迎大会上说:"我是《拂晓报》的忠实读者,她指引我向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愿普天下的星星,都跟着太阳、月亮走!"《拂晓报》使人民感到鼓舞和振奋，却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害怕和痛恨。1939年冬，安徽省国民党当局下令停刊《拂晓报》;涡阳县国民党当局将邮局的《拂晓报》全部扣压焚烧;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驻大别山的李仙洲部下令严禁阅读《拂晓报》,狂叫"谁看《拂晓报》谁就是危险分子",抓住"要杀头,要坐牢"。反动派的狂啸,恰恰证明了《拂晓报》在当时淮北地区的影响和威望。

毛泽东在1939年秋给彭雪枫的信中,肯定了《拂晓报》的成绩,说"《拂晓报》看了几期,报纸办的好,祝同志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好的成绩。"并亲笔为《拂晓报》书写"坚持游击战争"。彭雪枫在纪念《拂晓报》创办500号的文章中说:"五年来的拂晓,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创造了一连串辉煌的功绩,·····它已经像一颗明星，高高地挂在天空，做了千百万群众的指路灯。"

办"部队之花"——拂晓剧团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艺工作在革命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组建了许多剧团,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加以抗日的宣传内容，进行了强有力的抗日宣传活动。彭雪枫领导下的豫皖苏边区的拂晓剧团就是其中出色的一支。

彭雪枫"深知文艺工作对建设部队的作用,因此,他对创建文艺宣传队是热情积极的。拂晓剧团就是在他操办下创建的。对拂晓剧团和对《拂晓报》一样,倾注了他的心血"。拂晓剧团组建于1939年11月。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斗志,活跃

部队的文化生活，彭雪枫指示剧团同志配合当时抗日斗争的需要，编写排练一些小话剧和活报剧。在彭雪枫的授意下，剧团不断自编自导自演一些新剧目，如描写抗日游击队打鬼子、除暴安民的京剧《傻小子打游击》，歌颂东北义勇军抗日英雄神出鬼没打日寇的话剧《三江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罪行的话剧《风雨之夜》，歌颂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鱼水深情的话剧《鸿福临门》、《云二姐》，秧歌快板剧《军民一家》等。1941 年 9 月，剧团自编自演了以反对流寇思想为主题的多幕话剧《流寇队长》，这是应彭雪枫的要求，为“配合部队正在进行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整顿”而编排演出的。首演之后，彭雪枫让各级军政干部谈观后感，启发大家结合本部队的实际情况，对比进行检查，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危害性加深认识。之后，演员们又到各旅团巡回演出，使干部战士们在娱乐之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形象生动的直观化教育。

为了使拂晓剧团更好地发挥它的宣传鼓动作用，鼓雪枫对拂晓剧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从演员的生活、思想和学习情况，到剧团道具的配置，彭雪枫样样都记挂在心上，对剧团新剧目的每次首演，他更是当作一项工作任务亲自到场观看，演出结束后，又和剧团的领导和编导一起，从剧本的创作到演员的表演，一一提出修改意见。

1941 年 1 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汤恩伯奉蒋介石密令，以 9 个师的兵力，向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围攻。面对 7 倍于我的敌军，四师展开了 3 个月的反顽自卫斗争。拂晓剧团除下到战斗部队作火线文艺宣传、激励战士斗志外，还跟随作战部队，到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军民联欢晚会，演出抗日话剧和歌舞节目，向当地人民宣传新四军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内战分裂的严正立场，揭露汤恩伯部勾结日伪围攻新四军的罪行。一次，为了团结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共同抗日，剧团奉彭雪枫之命，到该部某师驻地作慰问演出。演员们演出了《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抗日节目。演员的动情表演激起了东北官兵的思乡之情，演出结束后，有人愤怒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拂晓剧团的鼓动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战决心，瓦解了国民党顽军下层官兵的反共意识。

为了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逢年过节，拂晓剧团的演员们就采用一些带有淮北民间特色的艺术形式，如跑旱船、花挑子、踩高跷、打花棍等，在四师驻地村镇走街串巷去献艺。通过这些活动，军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部队战士也更加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

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在向新四军部队、群众、友军作教育宣传工作的同时，拂晓剧团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活跃在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一支年轻的文艺骨干队伍，被当地军民亲切地称为“部队之花”。

《拂晓报》和拂晓剧团是彭雪枫四师部队的“三宝”中的二宝，它们在鼓舞士气、唤起民众，团结友军、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影响不可低估。在敌后艰苦的环境中，彭雪枫苦心经营着四师的《拂晓报》和拂晓剧团，即使在 1941 年 3 个月反顽斗争的最严酷的日子里，报社、剧团组织都很健全，由此足可见其治军之用心良苦。正是由于彭雪枫对部队开展了强有力的创造性的政治宣传工作，才使部队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顽强的战斗意志和高昂的杀敌士气，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越打越勇，越战越强，成为新四军主力师之一，成为一支忠诚于党、英勇顽强、生动活泼的劲旅，屡次挫败敌人，成为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强保卫者。

(责任编辑:木易)

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医院治疗肿瘤效果好

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医院肿瘤专科在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传统中医学理论，成功的研制出以口中含化中药丸、膏药外贴穴位，内外相结合的独特疗法，主治食道癌、贲门癌、胃癌、喉癌、肺癌、肠癌等，该疗法尤其适用于不宜手术、化疗、放疗或愈后又复发的患者，对改善疼、咳、肿、呕吐一至三天可见明显效果。一般用药一至三个疗程，饮食可逐渐恢复正常，经数千例患者临床验证，该疗法有效率高、见效快，经多方治疗无效和对此失去信心的患者，请与本院联系，有专家负责咨询，可汇款购药。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建设东路 24 号

邮编:450002

来院路线：从郑州火车站乘 101、103 路电车或 9 路汽车到高炮学院站下车东行 50 米路南即到。(门诊楼三楼)

联系人:宋国厂

电话:(0371)

说“我前世一定是中国人”的泰戈尔

● 刘作忠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作品，最早是在本世纪初由日文译成中文传入我国的，到了20年代，则被大量地直接翻译介绍，他的作品曾影响了我国几代读者。

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人民始终怀着友好感情。一百多年前，年仅20岁的泰戈尔面对英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鸦片，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的罪行而怒发冲冠，他在《婆罗蒂》杂志发表著名论文《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一译《在中国的死亡贸易》)，文中说：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他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他走向死亡。出售毁灭一方获取暴利，另一方损失惨重……英国人根本不讲什么道义，什么责任，什么良知，只有敛财的强烈欲望，这就是十九世纪他们的基督教文明。”

1916年，泰戈尔在日本发表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多次发表公开信、谈话、诗篇，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且带头慷慨解囊，发动募捐，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泰戈尔一生两度赴中国，留下了许多佳话。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这位享誉全球的诗哲情不自禁地说：“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1924年4月，应中国大学者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率领由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沈漠汉等6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讲学。

12日一大早，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等人就汇聚上海汇山码头，恭候泰戈尔一行。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时事新报馆的代表，还有日本驻华的新闻记者、旅沪印度人也在码头等候。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这位享誉全球的诗哲热血沸腾，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为了让泰戈尔访问方便，东道主专门指派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谙英语的徐志摩担任其随行翻译。泰戈尔一眼就爱上这位年近30、才华横溢的中国诗人，徐志摩也为能担任诗坛泰斗的助手而自豪不已。徐用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徐为浙江硖石人)官话翻译，犹如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泰戈尔下榻沧州饭店不久，青年画家刘海粟慕名拜访后，专门为老人画了两张速写，一张刊在《申报》，一张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

12日下午，泰戈尔一行在徐志摩、胡适等人陪同下，拜访了中国兵学大师蒋百里，并与其家人合影。

4月13日下午，中国朋友百余人，汇聚于上海张君劢宅，欢迎泰戈尔一行。与会者或坐在花园的草地上，或坐在椅子上，环绕着须发斑白、身著印度袍服的诗哲，身后陈列着一盆盆、一层层姹紫嫣红的鲜花以为屏障。张君劢致欢迎辞，泰戈尔致答辞，语声沉着而有诗意，充满了恳切的、热烈的激情，在场的人无不感到一种极深的感动。

杭州西湖秀丽的湖光水色，使诗哲留连忘返，他像孩子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

4月14日，泰戈尔一行在徐志摩、瞿菊农、王统

照、林徽音等人陪同下，由沪乘车至杭州，下榻于湖滨清泰宾馆。在杭州，泰戈尔一行先后游览了灵隐寺、孤山、西泠印社、六和塔、虎跑泉、三潭印月等名胜古迹，并两次泛舟西湖。

西子湖秀丽的湖光水色，使诗哲留连忘返，他像孩子般地欢呼："美丽的西湖！美丽的杭州！要不是时间关系，我真想在湖边买间小屋住上几天……"有人要他坐轿子上山看风景，他婉谢说："如果坐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肩膀上看山看美景，我宁可舍弃眼福。"

15日，在灵隐寺召开的欢迎会上，泰戈尔即席演讲，他说："上海很多人忙于追求优厚的物质生活，在十里洋场上勾心斗角，以学得欧美人的生活习惯为能事；而杭州人民态度诚挚自然，衣着简单朴素，住处清爽洁净，显然还保持着中华文化精神。"

西泠印社的艺术家们专门向泰戈尔赠送一枚刻有"泰戈尔"三个中国字的印章，泰戈尔感动不已。他对随行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说："在印度，小孩降临后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要给他起个名字，第二要给他少许饭吃。这样这个小孩就会和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关系。我的名字译成中文，头一个字是'泰'字，我觉得此后仿佛就有权利可以到中国人民的心里去了解他们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是非与中国人的生命拼在一起不可了。"

泰戈尔由此又想到请中国朋友为他起个中国名字，他向中国国学大师梁启超提出了这个愿望。泰戈尔获悉徐志摩是浙江硖石人，在4月16日由杭州返途中要求于硖石站短暂停留。徐的父母及小镇父老闻讯，倾镇前往车站迎候。徐父申如以家乡茶壶、家乡香茗相待，泰戈尔品尝后赞口不绝。火车开动了，他依然把头伸出窗外，向徐志摩的父母及乡亲们频频挥手告别。

4月18日下午，上海文学研究会等团体的一千多名成员假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正式欢迎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泰戈尔即席发表讲演，徐志摩当场翻译，当晚，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一行乘火车沿津浦线北上。

泰戈尔在南京说："我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

在南京，泰戈尔游览清凉山、莫愁湖等名胜古迹后，向南京文化界人士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由徐志摩翻译：

"我此番来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些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个敬香人，来对中国文化界敬礼的。我这次来华，就是为了一点看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我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近一些，我是想得到你们中国青年真挚的同情。让我们大家都来努力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我们要不怕阻难，不要馁怯，肩上扛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地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

演讲完毕，泰戈尔与青年学生一起散步聊天。当时的《晨报副刊》是这样报道的：泰戈尔说："我最喜欢同你们这般可爱的青年在一起，随便提出什么问题，随便答，这样更有趣味。"于是青年学生便与他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当时一位学生问他有多大年纪时，他风趣地回答说："我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年纪，因为一个人的老少，不能拿年纪来做标准的。我的心时刻同你们青年人一样，所以我长久是一个青年人。"他还笑着说："我的年纪已64岁了，但是你们不要猜想我是一个老年人呀！"

南京访问结束，泰戈尔一行继续北上，在济南暂停留间，曾有讲演，由王统照翻译。

梁启超说："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64岁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4月23日，泰戈尔一行在中国特有的爆仗欢迎声中

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前左)在庄士敦家门与徐志摩等合影

抵达北京火车站。梁启超、熊希龄、胡适、辜鸿铭、蒋梦麟、梁漱溟、范源濂等名流到车站迎接。

泰戈尔先后在北京作了6次公开演讲，所有演讲均由徐志摩翻译。

4月2日，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蒋梦麟、胡适、徐志摩等40余位名流汇聚北海公园静心斋欢迎泰戈尔一行。由梁启超致欢迎词。梁每说一段，徐志摩就用英语翻译。泰戈尔一边听着，一边向大家微笑点头示意。当泰戈尔答谢时，徐志摩就用中文翻译。泰戈尔对徐志摩敏捷的才思非常满意，问徐能否以英文写诗，徐当即写了一首并朗诵给他听，泰戈尔赞扬不绝。以后，一有间隙两人就谈诗。

为了调剂泰戈尔的精神，徐志摩带泰戈尔游览了地处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并介绍说："这里是北京名刹之一，丁香极负盛名。清代许多著名诗人、学者都喜欢住在这里。"泰戈尔说："那我今晚就睡在这儿。"果然泰戈尔当晚在丁香树下躺了一宿，而徐志摩却醉卧于花丛吟诗达旦。

泰戈尔在京停留的日子里，曾在北师大等处发表了数篇演说，如《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真理》等，轰动一时，后由梁启超将其结集出版，卷首有梁以《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为题的《序言》。

5月8日，中国艺术界朋友聚集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庆祝泰戈尔64岁寿辰，由胡适主持。胡赠给泰戈尔十几张中国名画和一个名贵瓷器。接着用英语说："泰氏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今天能够在这里欢迎代表印度的伟大人物，并且刚逢着他的生日，替他做寿实在是凑巧极了。"胡适还将自己前年所作的《回向》诗写成横幅面赠泰戈尔。

接着梁启超致贺词，他在祝福泰戈尔生日愉快后说："今天我们所敬爱的天竺诗人在他所爱的震旦地方过他64岁生日，我用极诚恳、极喜悦的心情，将两个国名联起来，赠给他一个新名叫'竺震旦'！"

竺震旦——多么寓意深长的名字，象征着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传统友谊，象征着中印文化的源远流长。胡适用英语幽默地说："今天一方面是祝贺老诗哲64岁生日，一方面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的生日。"大家哄堂大笑。"谢谢！"泰戈尔紧握梁启超的手，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名字。后来，西泠印社的金石艺术家，又以不同的字体精心刻制了两方"竺震旦"的印章，赠给泰戈尔。

祝词后是文艺演出。骤然间，舞台帷幕前大放光明，聚光灯的光圈里矗立着一座灿烂的"浮雕"：一位玲珑娇媚的古装少女和一位稚气天真的幼童，正仰望着一弯冉冉升起的新月。这是徐志摩以泰戈尔的名诗《新月集》创意，那位少女就是中国才女林徽音。优美典雅、如诗如画，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演出还有：印度客人朗诵梵文诗和泰戈尔的《新年》诗；林徽音、张韵海、徐志摩联袂以英语主演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泰戈尔一边观看演出，一边以中国团形纨扇徐徐扇风。他微笑着对身边的梅兰芳说："我希望在离开北京之前看到你的戏。"梅兰芳答道："我定于5月19日请您看我新排的神话剧《洛神》，希望得到您的指教。"

泰戈尔紧紧握着梅兰芳的手说："希望你和你的剧团到印度，让印度观众能够欣赏你的优美艺术。"

5月19日，泰戈尔一行在开明戏院（今珠市口民主剧场）高兴地观看了梅兰芳的精彩表演。演出结束，泰戈尔专门到后台向梅兰芳道谢："我看了这个戏很愉快，有些感想，明日面谈。"

20日中午，梅兰芳、梁启超等设宴为泰戈尔一行饯别。席间，泰戈尔谈了对《洛神》的看法："这个美丽的神话诗剧，应该从各方面来体现大诗人的想象力……布景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经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琼花，并勾勒金银线来烘托神话气氛。"泰戈尔还高兴地对梁启超说："我看了《洛神》酝酿了一首小诗送给梅先生。"他凝思一会，以中国的笔墨在昨日扇风的那柄团扇上，用孟加拉文英文书写一遍，然后签名、落款，郑重送给梅兰芳。这首诗译成汉语是：

"亲爱的/ 你用我不懂得的语言的面纱 遮盖着你的容颜/ 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 被水雾笼罩着峰峦。"

当晚，梅兰芳等为泰戈尔送别，泰戈尔紧紧握着梅的手说："我希望你和你的剧团到印度，让印度观众能够欣赏你的优美艺术。"

泰戈尔在京停留之际，曾由徐志摩、林徽音陪同专程进故宫访问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并合影留念。后联系孙中山与泰戈尔见面，因孙患病未成。

辜鸿铭——泰戈尔——两位为亚洲呼喊的哲人终于坐到一起。泰戈尔说："通过我们优秀的东西，战胜西方人的心灵……"辜鸿铭说："西方人的机关枪制服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泰戈尔在北京椿树胡同18号辜鸿铭宅，与这位"怪杰"会晤了一番。

泰戈尔满头银发，浓密的须髯覆盖了面孔的下半部，一袭长袍；辜鸿铭头戴一顶祖母绿缀着红结的黑缎平顶小帽，灰白头发被红丝线辫起来，唇上颏下几绺长须，一件枣红宁绸长袍套天青大袖方马褂、脚穿双梁平底布鞋、一根拐杖。两位各自一身传统服饰，为亚洲呼喊的哲人终于坐到一起，滔滔不绝，各抒己见。

泰戈尔谈到：“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身思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当怀着友好的心情了解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起反对它的仇恨倾向。此外，西方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彼此的命运应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该努力，不通过我们低劣的东西，而通过我们优秀的东西，战胜西方的心灵；不用仇恨的复仇态度对待他们，而用友善相互尊敬的感情去对待他们。”

辜鸿铭赞同泰戈尔对西方人的态度，但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西方人的机关枪制服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最终西方人必会被机关枪所制服。但西方科学给我们的理智力量不会有那么高，中国孔子的教义也许是拯救西方机械的唯一道路。”

泰戈尔强调说：“不仅是孔子的教义，最终是道德的价值充实着每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这点，那么这种文化将无以自主。”

此时，辜鸿铭狂气又发，他对泰戈尔直率地说：你是诗人，不适合讲东方文化，更不懂得《易经》高深的哲理，你还是去写诗吧！宣扬东方文化的精义还是让我来做吧！”泰戈尔对“怪杰”的傲慢一笑置之。

会谈后，两人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合影留念：一张照片是两位哲人；另一张照片除两位哲人，还站着徐志摩等 5 个西装革履的中国青年。

太原欢迎会上，泰戈尔说：“中国和印度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5 月 21 日下午 4 时，泰戈尔一行在徐志摩和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卫西琴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太原。

22 日下午，泰戈尔一行在督军公署北厅访晤督军阎锡山，就在山西推行乡村建设计划，双方进行了广泛商讨。最后达成协议：印度乡村建设工作者 1925 年春赴晋，配合徐志摩、瞿菊农等中国热心分子，先进行一些农村经济和社会调查，然后拟定方案，付诸实施；阎锡山许诺将晋词一带划给泰戈尔等作为试验基地。可惜这一切后来均未能付诸实施。

23 日下午，山西省教育会等 30 多个教育、文化团体在太原文瀛湖大自省堂举行欢迎大会，欢迎泰戈尔一行。数千名各界人士将自省堂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玻璃也被挤破了。泰戈尔感动不已，他在讲话中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和印度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

泰戈尔在讲话中，把帝国主义比作“蝗虫”，抨击其以“物质文明”压迫中、印等弱小国家，“把极美丽的世界弄得紧张极了”。他呼吁：“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他的讲话，不时被听众欢呼声所打断。

24 日，泰戈尔一行游览了晋祠等名胜古迹。

泰戈尔赠给徐志摩一套印度袍服和帽子，还给徐取了个印度名字：素思玛

泰戈尔此番中国行，与风度翩翩、幽默和富于想像力的青年诗人徐志摩朝夕相伴，情谊日笃。为了表达对徐志摩 的感激之情，泰戈尔赠给徐一套印度袍服和帽子，还给徐取了个印度的名字：素思玛。两人依依惜别，徐志摩希望泰戈尔再来中国，泰戈尔也邀请徐访问印度。

后来，泰戈尔把他在华的英文讲演编辑成《在华谈话录》一书，其卷首是梁启超的《序言》。这个集子于 1925 年 2 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扉页写道：“感谢我友徐志摩的介绍，得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相见，谨以此书为献。”

1928 年 10 月，徐志摩偕王文伯游览欧洲返国途中专门停留印度。泰戈尔对徐志摩第一次访印十分高兴，尽量使徐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专门召集印度朋友为徐志摩举行茶话会，并和徐志摩天天见面、谈天、说幽默话、讲故事。两位忘年交时而畅怀大笑，时而沉默静思，时而悄悄密语，俨如父子之情。

徐志摩在印度停留的 3 周里，曾在国际大学作关于孔子的讲演；参观泰戈尔创办的苏鲁山迪尼基顿农村建设实验地、“泰戈尔钢笔画展览”，以及印度的一些名胜古迹。临别之际，徐志摩邀请泰戈尔再度访华，泰戈尔紧紧握住徐的手说：“一定！”

泰戈尔声音颤抖地对徐志摩、陆小曼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见不到你们了……”

1929 年 3 月下旬，泰戈尔赴美国、日本等地讲

泰戈尔在北京和梁思成、林长民、林徽音及徐志摩等合影

学途中，信守去年在印度与徐志摩分别之诺，于沪小憩。

徐志摩和陆小曼夫妻俩专门邀请泰戈尔到上海福煦路613号本寓作客。为迎接贵客，夫妻俩将三楼模仿印度风俗布置好，又亲自到码头恭候。

徐、陆迎贵宾上了三楼，徐志摩说：

"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卧室，不知满意否?"泰戈尔朝里一看，楼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仅放有几只软背枕，进屋可在地上打滚，全按印度风俗布置。他满意地笑了笑问："你们的卧室呢?"夫妻俩带泰戈尔走进另一间房，特大写字台上堆满了书籍和杂物，还有一双小曼爱穿的绣花鞋。泰戈尔频频点头说："好，素思玛，这间卧室古色古香，饶有东方风味，就让我睡这里吧!"小曼抿嘴一笑，用英语风趣地说："那我们今晚要到印度住宿了!"三人哈哈大笑。

泰戈尔此次短短三天的私人访问，竟在徐宅与志摩谈了三天诗。他还专门为小曼朗诵了几首新作，那抑扬顿挫的韵味，使文化涵养极深的小曼听得如痴如醉。小曼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特别有好感，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一对大眼晶光闪闪的含着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他的声音又是那样好听，英语讲得婉转流利，我们三人常常谈到深夜不忍离开……虽然我们相聚只有短短两三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我听到了许多不易听到的东西，尤其是对英语的进步是不可计算了。他的生活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愿出去玩，爱坐下清谈，有时同志摩谈起来，可以谈几个钟头。"

这一次泰戈尔送给徐氏夫妇两件墨宝：一件是在志摩一本精致的纪念册上，用中国毛笔画了一幅笔调粗犷、水墨画的大半身自画坐像。画的左上角以英语写了两句富有哲理的小诗："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他那沉默的重担。"另一件墨宝是以孟加拉语在纪念册上题写的小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这本纪念册徐志摩名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上面有闻一多、杨杏佛、胡适、林风眠等20多位知名人士的墨迹。泰戈尔写完，又用孟加拉语朗诵起来，夫妻俩发现老人是流着眼泪读完的。

6月11日，泰戈尔从美国、日本讲学回印度途经上海。徐志摩接到电报，即邀约郁达夫一道前往轮船码头迎候。这次，泰戈尔仅在徐宅逗留了两天。临别之际，老人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件用金丝精绣有印度民族风情图案的紫红色的丝织长袍，他声音颤抖地对徐、陆夫妇说："我老了，恐怕不会再来中国了，也许再见不到你们了，这点小礼物，作个纪念吧!"

周恩来总理饱含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

泰戈尔此后再未来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人民的

情丝绵绵不断。他的书室专门挂有两幅画有松荫亭榭、小桥流水、老翁执卷坐读的中国山水画。他曾深情地回忆："中国人爱好艺术，普通人家的碗盘杯碟上都有美丽的图案，他们的日用品同艺术品一般做工精美。中国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邦！"

1933 年，22 岁的浙江学生魏风江经乃师谭云山和蔡元培的推荐，前往印度加尔各答附近 90 英里的生汀尼克坦，就读由泰戈尔创办并主持的国际大学。泰戈尔对这位中国留学生情有独钟地说："非常欢迎你来国际大学学习。中印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已有数百年历史，这个关系的继续发展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你是第一只从你祖国飞来的幼燕，欢迎你在生汀尼克坦筑巢，同我们一起生活和学习吧！"

泰翁津津乐道忆及当年游览西湖时的情景："轻舟荡漾在西湖中，凭着船沿，悠然望见山顶的尖塔(保椒塔)，我乐如中国画中的古贤……西湖湖水秀丽，可惜不能在山麓觅一小室居住，欣赏朝夕不同的湖光和山色……与湖山相称的文静优雅的人民……"

他还专门谈及西泠印社，他说那些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艺术家。那布局宏伟、笔力雄健的山水画和缜密富丽、栩栩如生的花鸟画，都是佳作。他又说把字作为艺术品是中国特有的，即使不识中国字的外国人，也能领会到一直一横的挺秀和矫健。老人强调精美的金石刻印，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品。老人念念不忘龙井茶，他说那种清香、鲜美的绿色茶叶，离开中国就喝不到了。

作为长辈对晚辈的见面礼，泰戈尔亲笔用英文给魏风江题写了一段赠词，其中说："这是一个古今文化混合的时代——一个过渡的时代，一切尚未令人满意地固定下来。你不能期望在这个时代，会产生任何伟大的人物和福音。我只愿你认我为一个与你同样的人，不可视我为你的导师和先驱。"

泰戈尔在魏风江处看到中国艺术家丰子恺的古诗新画，十分赞赏，他对魏说："这是诗与画的具体结合，也是一种创造……艺术的描写不必详细，只要得到事物的精神即可……你老师这几幅画，用寥寥的几笔写出人物的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知道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后来泰戈尔还选派得意门生洛克什·钱德拉到中国师事丰子恺，而且还翻译了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成为中印艺坛的佳话。

1939 年冬，徐悲鸿应泰戈尔和中印学会及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教授之邀，赴印度讲学和游览，经泰戈尔向甘地引荐，徐悲鸿个人画展于 12 月 20 日在国际大学艺术学院举行。泰戈尔主持开幕典礼，并致欢迎词。

画展正式开幕，泰戈尔坐在装有双轮的椅子上，由徐悲鸿亲自讲解展品，引导参观。

1940 年 2 月下旬，徐悲鸿在加尔各答的印度东方美术学社举行第二次个人画展，泰戈尔亲自为画展撰写《序言》：

"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我欢迎这次徐悲鸿绘画展览，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既然旨趣高奥的形象应由其本身来印证，多言是饶舌的，这样，我就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盛宴。"

同年 11 月下旬，徐悲鸿欲结束印度之行回国，正值病体稍愈的泰戈尔请求悲鸿在行前为其选画。泰戈尔 60 余岁学画，所用工具有中国、日本的墨，西洋画的水彩、水粉、铅笔、粉笔、油色，题材也多种多样。其作品曾在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地展览，大受赞赏。徐悲鸿和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南达拉波斯一起以整整两天时间，从泰戈尔的 2000 余幅作品中挑选出 300 余幅精品，交国际大学出版。

在徐悲鸿访印的日子，泰戈尔经常邀请徐悲鸿到家中作客。徐曾为泰戈尔画了 10 幅素描、速写、油画及中国画的肖像。两人一起欣赏当年由梁启超题名、西泠印社艺术家刻治的"竺震旦"石印，又一起切磋、交流绘画、诗歌等艺术，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

泰戈尔在访问中国时曾经高瞻远瞩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我相信，当你们国家站起来，把自己精神表达出来的时候，亚洲也将有一个伟大的将来！"

诗翁的预言已成为现实，中国人民一直铭记着这位休戚与共、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国际友人。1957 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饱含深情地说："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责任编辑：舒元璋)

听吴作人先生谈艺

● 刘大为

（一）

1980年盛夏，在北戴河避暑，有幸同吴作人先生为邻。因而，我们常常一同"下海"。吴老不善戏水，自称"旱鸭子"，不是"白天鹅"。于是我陪他在海边沙滩徜徉，穿着泳装仰卧在海边，枕着波涛，看白云蓝天，渔帆点点，赛艇逐浪，孩子们在浪花中嘻笑击水……这么美好的大自然的景色，忽然引发我想起吴先生关于大自然的两句名言。

我问道："您是说过，一个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儿子吗？"

吴先生接过话茬笑了："这是我说的，也是许多人都说过的。不过，我还着重补充了一句，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儿子；但，画家千万不要做大自然的孙子！"

尽管我已经听过这句精彩而又幽默的语言，此刻听到这话的创造者，故做严肃的亲口道出，还是引得我笑起来，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作人说："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要师造化，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古人说，搜遍奇峰才画山，画家要到大自然中去体验观察，要第一手材料这就是要做大自然儿子的真正含意。可是，有的人，不深入生活，不亲自到大自然中去观察体验，而是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进行创作，例如靠照片画油画；看了几本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就画起中国画来。这么做，就成了大自然的孙子了。"

接着，吴先生又望着浩瀚无垠的大海，和在大海中追涛逐浪的游泳健儿说下去："一个画家要像游泳那样对待艺术，要能钻进去，还能冒出来，也就是钻进去学习传统，冒出来进行创新。这样，才不会被传统淹没，只是僵化地接收传统，不能创新反映现实生活的好作品。齐白石说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话，也是这个意思。"

他又说："只有深入生活，作品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才能由浅入深，也能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地描写物象。除了师造化，深入生活，当然还要有造型能力，基本功，素描要扎实，就像游泳要有基本功一样。否则，你就不能跃入生活的海洋，像鲁迅说的那样，连到水边站一下都不敢，怕弄湿了鞋，只好像我俩这样，虽然穿着泳装，但，却只能在大海边清谈……"

我说："您不是清谈，您刚才这一席话，加上一个标题，可以称之为吴作人院长的'海边谈艺术'了。"

（二）

同吴作人相处，听他谈话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他的大智，有时若愚，他的追求，执着若痴；他语言生动幽默，还带有童稚情趣，有时甚至有些狡黠，有时又艺言惊人，再加上他丰富的创作经验，深沉的思想修养，雄才大志，坚实多采的绘画技艺，使他的谈吐犹如高山流水，一泻千里；他之为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情趣、幽默、典雅平和，朴实无华，气象万千。

"四人帮"被粉碎之时，文艺界的同仁，刚刚从文化禁锢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大家纷纷去拜望吴作人先生，并求其墨宝。

他本来早已允诺为我作画，由于客人不断，无法实现。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星期天，一大早到我的画室来，这时候，大家还没吃早饭，我这儿上座率也低，我清晨为你一挥，等吃过早饭，上座率逐渐进入高峰之时，我已经给你画完了。那时，咱们就像北京说的谚语那样，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了。"

吴作人先生从不当客挥毫，他反对绘画当众表演，像杂技艺人那样。因此，很难看到他挥毫泼墨丹青。这次，我应邀一大早到了他的画室，马上就要亲眼看到这位大师进行创作的风采，我心潮激动兴奋而又充满了幸福之感。

他的创作环境氛围，和他的作品一样，雅洁、安详、庄重。

很早以前，曾有一种无知的传言，说学习油画的画家，画中国画使用不好毛笔，皴擦不出墨分五色的韵味，用毛笔像画油画那样慢慢地往宣

纸上堆墨制造……可，我现在面前这位油画巨匠，用毛笔在宣纸上做画，简直就像书写一样流畅潇洒，一笔下去，竟然可以墨分五色，一条摆尾力争上游的金鱼，只需五、六笔就已描绘出来，与其说是描绘，不如说是书写更为准确，他运用毛笔宣纸的熟练生动，表现出的物体有立体感，在传统的笔墨中体现着创新的技法，绝对是国画大师的手笔……。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吴作人先生为我画好了一幅鱼趣盎然的金鱼图，又乘兴写了一小帧憨态可爱的熊猫，然后用印。他说盖章是力气活，于是他又讲起了轻松话题。他说："我本是安徽径县茂林人，就是当年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崇敬叶挺将军和新四军，本来想刻一方"茂林子弟"的押脚章，又怕别人误会我冒充新四军，于是，刻了一方"前贤未见"的小印。盖在熊猫图上，绝对不会引起争议，因为古代画家确实大都没有画过熊猫，这我算不上创新，仅仅是写生所得。"

(三)

这时，我忽然向他提了个虽然幼稚但却为许多人都想了解的问题。我问道："你这位油画大师为什么又画起中国画来呢?"

吴作人先生稍为思考了一会，说道："首先，我是中国人! 虽然我早年曾在法国、意大利学习了很长时间西洋画法，那是为了掌握绘画技巧。中外绘画看的多了，我发现，西洋画法科学表现的对象有厚度感，立体感强等等，西画的优点，当然不止这些。可是，西洋画的表现的内容往往全展示在画框之内。而中国画意境深远，却能突破画面，还能让你看到联想到画面之外的东西。这不单单是因为西洋画是通过焦点透视来反映物体和生活内容，中国画是用散点透视来展示所要表现的场景，更主要的是中国画讲究意境，大写意这个词和实践是丰富多采而又变化无穷的，譬如今天画的这幅鱼趣图，没有画一笔水，一条纹，可是，也能让观众感到鱼在水中力争上游，这也算是中国画魅力之所在了。……"

他兴犹未尽地说："齐白石画过蛙声十里出山泉，画面上根本没有青蛙，只有几只蝌蚪，可见他创作的意境，不仅令你看到了青蛙，也似乎听到了蛙声，还有十里长河。中国画中的诗、书、画、印四绝的集中展现相互配合，也是了不起的。"

像这样的听吴作人先生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习课，还曾经有过一次，同样令人难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和赵丹同志一起去看吴作人先生，阿丹向作人先生索求墨宝，还说，他是画界学徒。吴作人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我和赵丹同志是殊途同归不同种，他开始学图画，后来演戏，成了表演艺术大师；我呢，开始在南国社和田汉、郑君里等同志一起学演戏，不成，才学画画的。承蒙'四人帮''高抬'，也让我当了一阵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云开雾散，值得庆祝。我从不当众挥毫，今天我在大家面前，为阿丹画一幅奋进的牦牛，表示庆祝。"

我有一本册页，已经请李可染、李苦禅、王雪涛、蒋兆和、黄胄等画家做了画，留下最后一页，请吴作人先生挥毫压阵之作。他仔细地翻阅之后，说："这么多位画家，画了这么多好画，我来给你当编辑，为你把这本册页整理一下吧。"于是，他在最后一页上挥毫，写上了"观止"两个矫健的大字，旁边还题了一行小字写道："集斯精萃，叹观止矣——作人。"这真是书胜于画的画龙点睛之笔。

还是在北戴河疗养之时，一天下午，我去登莲花山，吴作人先生一家来看我，未遇。他留下一个便条写道："走访不晤为怅! 明午 11 : 30 请您来 118，我们同进午餐，盼勿却! 作人等三人及小兵二人……"

第二天，我应约而至，正心中纳闷，为什么请我吃饭，吴作人先生说，昨天看了你的住处，知你处无食堂，用餐不便，才请你过来吃饭。

吴作人先生赠我的墨宝，我珍藏；这便条，我亦视为艺术品保存。作人的画，提高了我的艺术文化修养；这短笺，教给我如何关心他人，爱护朋友。……

现在，作人先生乘鹤而去，而他留给我们的艺术珍宝，会使人永远看到他那气象万千的精神风采和博大胸怀，激励我要像他一样的生活(做)人。

(责任编辑　王　恂)

将军吟

——拜读《萧克回忆录》，成散曲一组，申敬仰之意

● 李沥青

[正宫·叨叨令] 投笔从军

兄农民，平白的人头落地。父秀士，滚滚的文章无济。制豪绅派不上之乎者矣，五步内须索是钢刀血洗。仇要报也么哥，仇要报也么哥，小萧克从戎投笔。

[双调·折桂令] 在"铁军"入党

况家恨又添国仇。群枭混战，大难临头，长缨在手。饮马长江，煞是风流。冒弹雨身先士卒走，去"铁军"眼空吴楚楼。马列理真，斧镰旗正，入党宣誓：为工农解放战不休！

[中吕·满庭芳] 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朝反动派，放第一枪。擒俘训俘松柏巷、匡庐学堂。流沙一役飞鸟散，潮汕几回伤心望：党何方？跃上轮船，商略大海南。

[越调·塞儿令] 参加湘南起义

仗朱陈，领风云，湘南一隅走雷霆。碕石兴兵，水楼解困，梭镖任纵横。骑田岭上动歌吟，龙溪洞中聚精英。会师者谁称？见毛者谁名？听！萧克独立营。[①]

[正宫·塞鸿秋] 井冈山斗争

黄坳初战露锋芒，七溪岭胜江西"羊"[②]。"八月失败"建制全[③]。两次冲锋负重伤。井冈全盛时，红旗如画展，有星星点点将军当年的鲜血染。

[正宫·鹦鹉曲] 战斗在中央苏区

新建农军众三千，治"谣风"见影立竿。"土共"变成"大红军"，战长沙经历锻炼。威武雄壮占吉安，缴获来真无算。得胜鼓擂的山响，快活煞"梭镖连长"。

[正宫·大德歌] 反第一次大"围剿"

风惨惨，云暗暗，那答儿捉了张辉瓒，这答儿击溃谭道源。哗啦啦红旗遍龙冈。反大"围剿"只七天，十二师真好样。

[双调·沉醉东风] 在湘赣苏区反第四次大"围剿"

忧则忧离了中央，愁则愁入了湘赣，为则为做军长，难则难当方面。用心思在战略上。九渡冲大胜获奖。四"围剿"风吹云散。

---

① 在资兴龙溪洞，萧克独立营与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② 羊，指江西敌人杨池生。

③ 《萧克回忆录》："这时，二十九团基本散了，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

[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　长　征

撤离湘鄂黔，横渡金沙江。过眼前茫茫草地，踩脚下皑皑雪山。一方面与二方面，将台会师喜若狂，地球的红飘带，百千万旋画了个圆。后看，长征路长长，前瞻，东北举狼烟。

[仙吕·醉中天]　率一二〇师在抗日前线

道几声不回头的八路军，赞一番是成城的好典型。"一二〇"三占雁门，指挥复七城，向冀察挺进。萧萧马鸣，与子同袍，无限别离深情。①

[仙吕·谒金门]　率挺进军包围北平

挺进，飞奔，喜百花山近。"无人区"是鬼子圈定，"三光"灭人性，一声号令，内外长城，青纱帐出奇兵。包围了北平，大快了人心，吓慌了那冈村②。

[双调·秋风第一枝]　承德保卫战

"八·一五"天下传捷，老蒋下山，摘桃来也。重庆签约，司马之心，昭然若揭。张家口翻了新页③。棒槌山④谁敢削截？历时八月，弹雨穿云，承德如铁！

[双调·驻马听]　石家庄唱《空城计》

十万火急，传飞檄召回主力。命令民兵，羁敌绊敌，机动出击。孔明只退司马懿，萧克偏打傅作义。唱《空城计》，捉了个师长张翼。

[正宫·黑漆弩]　进军中南时

参谋长运筹帷幄，谈笑处楚天寥廓。千帆追敌海之南，大败那"小诸葛"。

一场争论不寻常，与他意见相左⑤。白云黄鹤自悠悠，那厮折戟沉沙漠。

[中吕·山坡羊]　在"文化大革命"中

才涌洞庭涛，又掀钱江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小将小，老将老。小挥皮带老戴黑高帽。连天风雨豺狼笑。人，斗垮了。志，永不倒！

[中吕·谒金门]　下放江西(二首)

摘冠，罢官，下放云居山。"五七道路"哪是边？检讨千百遍。南征北战，赫赫名将，却吃了三字冤。例无前，人共怨，怒目向苍天！

改装，下乡，当年萧师长。浴血罗霄旧战场，红米南瓜汤。老表难忘，一心向党，知我者云山。水易淌，花易荡，不落的是太阳！

---

①萧老由一二〇师副师长调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他与贺总分手时，"颇有些依依惜别之情。"

②冈村，即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

③张家口是抗日战争将结束时，我军从日寇所控制的地区夺回的第一座大城市。

④棒槌山在承德，山形如棒槌。

⑤ 1949 年 6 月，林彪在武汉，为讨论解放后中南地区工作重心问题，与萧老发生争论。中央不同意林彪的观点，林因此对萧老怀恨在心。

更 正 说 明

本刊今年第 5 期《"老百姓苦成这个样子，顾不得那么多了！"》一文，由于我们编辑工作不严谨，出现几处差错：第 34 页左栏第 19 行："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张何明同志"，应为"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处书记张何明同志"；第 29 行"原河北省省长解峰同志"，应为"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处书记、行署专员解峰同志"；左栏第 7 行"河北省的其它几个领导同志"，应为"地委的其它几个领导同志"；右栏第 15 行"省委多数常委的赞同"，应为"地委多数常委的赞同"。特此说明，谨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孔宋违法结购外汇案五十年后曝光

● 郑会欣

1947年7月29日，南京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突然在第4版刊登了一则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家族属下的孚中、扬子建业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依仗特权、结购外汇、违法进口管制物品的消息，一时间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有人猜测这是国民党严惩贪污、整肃腐败的标志，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CC与孔宋豪门之间的一场争斗，但不管怎么说，明眼人都预感到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也还是这家报纸、也还是这张版面又刊载了类似更正的启事，声称前日报导有数处遗漏了小数点，结果一下子就将上述三个公司结购外汇的数目缩小了一百倍，从而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

危机虽然暂时消除，但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号。

笔者去年年底到台北收集资料期间，巧遇当年《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先生，他正是披露这一内幕的当事人，经过多次向他访问，并参考有关档案及报刊资料，事隔半个世纪，终于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

巧取豪夺，孔宋成众矢之的

抗战期间，全国军民都在浴血抗敌，而孔祥熙等豪门却在大后方依仗特权，囤积居奇，结购外汇，大发国难财，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在"国民参政会"和报刊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孔祥熙被迫下台，相继辞去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然而继任者宋子文比起孔祥熙也好不到哪里，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宋子文所推行的开放外汇市场和出售黄金政策使得国库储存的黄金、外汇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外汇却急剧上升。人们不禁怀疑，这么多的外汇和黄金是通过什么方法从国库

非法结购外汇案的主角之一宋子文

转移到私人腰包的？国内舆论立即将矛头对准了宋子文，其中尤以"国民参政员"傅斯年的抨击最为严厉，他不但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指名道姓地攻击宋子文公私不分、变国营为"宋营"，还提议由"立法院"、"国民参政会"等部门彻查孔、宋等"豪门"在国内外企业经营的内幕，包括营业范围和外汇来源，并征用孔、宋家族的资产。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院长"的职务，黯然离开政治舞台。

孔、宋虽然在政治上失势，但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如政学系、CC系和革新派并没有放松对孔、宋豪门的攻击；与此同时，国内外舆论也将抨击的矛头对准孔、宋等等豪门势力创办或经营的公司，如宋子良任总经理的孚中公司、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扬子建业公司和宋子文亲手创办、宋子安任总经理的中国建设银公司。

1947年3月13日，上海的美资报纸《大美晚报》披露合众社的一则记者消息称：目前中国的国营商行购有价值数十万万元的进口货物，绝不受结汇限额及进口条例等限制，如环球贸易公司、中央信托局及中国供应局现大量进口奢侈品，如汽车、无线电机、冰箱及其

他政府严禁进口之货物，“此项奢侈品大部分为政府有关之商行所定购，供应私人买户，且传获利以饱私囊”；而“中美商人对于宋子良主持之孚中公司、宋子安之中国建设银公司、孔令侃之扬子建业公司，利用特权，经营商业，尤多指摘”；另外，上述公司的一些头面人物还利用中国外交官的护照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同日的《大美晚报》社评还称：“从其他方面所得之报道与合众社所称者完全相符，望官方能对此事予以说明。”

4月2日，黄宇人等103人在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第63次会议中提出“拟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的临时动议，要求追究宋子文、贝祖诒等负责大员的责任，不能以辞职、免职即为了事，因为这些大员“不但运用失宜，且抑有勾串商人、操纵图利之嫌”。所以应“依法提付惩戒”，“从速查明议处，以肃党纪，而彰国法”。临时动议还称，一统公司、孚中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扬子建业公司等“官办商行”“皆有利用‘特权’、结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致普通商人难以争衡，外商并因此屡提抗议”；而且“此类‘官办商行’又大抵为官僚资本之企业机构；其间不乏贪官污吏之财产，尽为搜括民脂民膏之所得”，因此要求当局“彻查此类‘官办商行’之帐目”，若发现其有“勾结贪官污吏之确凿事实者，应即封闭其公司、没收其财产，以肃官方，而平民愤”。在党内及社会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蒋介石亦不得不亲自致电财政部部长俞鸿钧，令财政、经济二部“遴派要员彻查具报”。但事隔多日，调查报告却迟迟不见踪影。

拟揭内幕，记者暗中调查

陆铿当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年轻气盛，认为客观报道事实是新闻记者的天职，甚至还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口号，这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先中央、后日报”的思想截然相反，彼此之间亦存有芥蒂。

中央彻查孔宋案之事进行了数月，并作出了调查报告，但始终没有对外公布。陆铿在报社主要负责新闻采访，又身为国民党党报的要员，多方询问，也不得要领。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及其属下以“事关党国机密，须由上峰批准”为由，拒绝透露调查报告的内容。此路不通，只好另寻他路。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装点门面，争取美援，特别邀请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的几位党魁入阁，青年党的陈启天便当上了经济部的部长。陈启天与陆铿的私交一向不错，因此当陈上任后不久，陆铿就登门拜访，要求了解有关调查孔宋案的情况。开始陈启天有些犹豫，陆铿就向他游说：“我是国民党，你是青年党，我们两党应共同揭露政府内的腐败现象。”陈启天最后终于同意，应允待时机成熟时，便会将消息首先透露给执政党的党报。

大约是7月28日那天，陆铿收到消息，便立即带着报社记者漆敬尧来到经济部，在陈启天部长的默许之下，商业司司长邓翰良从保险箱中取出一包文件，陆、漆二人一看，正是关于孔宋豪门的调查报告，大喜过望，立刻埋下身抄将起来。邓翰良再三嘱咐，仅供参考，不得泄漏来源，陆铿自然满口应承。

抄完调查报告，陆铿二人即回到报社，然而却为了发不发表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中央日报》的总编辑是李荆荪，与陆铿是旧日中央政治学校的同学，副总编辑除了陆铿之外，还有一位叫朱沛仁，年龄稍大些。陆铿拿到调查报告就要求在第二天的要闻版上刊出，李荆荪则竭力反对，认为此事关系“党报”声誉，必须小心慎重，应得到上峰同意之后方可发稿。陆铿深知此事一经请示定无下文，绝无可能刊出，大动肝火，先是争吵，甚至差一点大打出手。最后还是朱沛仁从中劝阻，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双方各让一步，刊第4版，不作醒目的标题。

石破天惊，一则消息发表

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的第4版居中位置刊出了一则三栏题新闻：“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内称“孚中、扬子等公司，年来有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之情事发生，最高当局特令财政部、经济部会同严查，顷已将全部经过调查竣事，并由财、经二部会稿呈报”，云云。报导还说从财政部方面获知调查报告内容，其中涉及到几家“官办商行”，结汇及违法进口管制品之内幕：

售与孚中、扬子等公司之外汇数额：

（甲）孚中公司共结外汇一五三七七一二三美元，除该公司自有及售出者外，净购一一一三三〇七三一美元，所购货物以吉普车及旅行车两者为多，共占百分之五十，无线电及附件，共占百分之二十，余均为准许进出口物品。

（乙）扬子公司共结汇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除售出者外，净购一〇七四二〇〇美元，所购货物以棉花、药品为最多。

（丙）中国建设银公司，共结汇八七七六二美元。

孚中等公司实际运货进口情形：

（一）孚中公司：共购“卡特拉克”牌汽车二辆，厂价超出规定，外购旅行车一〇一辆，但均得有许可证，

准许进口。至吉普七八〇辆，已进口七三八辆，如依照规则，列为轻便卡车类，应暂停输入。据海关报告，谓内有吉普一八九辆系于禁令前起运，五四九辆系于禁令前付结购价，按政府所颁命令，得准许进口；惟查该公司结汇帐册，除禁令前订购二百辆外，其余均在禁令后结付购价，与海关所报告不相符合。又该公司购进无线电设备一〇八箱，内收音机四十件，在限制令颁布后，凭许可证进口。

（二）扬子公司：共购“奥斯丁”牌车五十辆，广价未超过规定，惟所购无线电三只，系在限制令颁布后凭许可证进口，（此）外共购化妆品一二八箱，经海关检验后退回。

（三）中国建设（银）公司：共购汽车五十六辆，但均不超过规定。

《中央日报》发布的这一独家新闻虽然字数不多，标题也不显眼，却有如石破天惊，在国内外舆论中立即引起激烈震荡，不仅刚出的报纸一售而空，各大报纸也纷纷转载。第二天，《中央日报》又在第4版刊登了监察院监察委员王冠吾的谈话，他说奉于右任院长之命赴上海调查孚中等公司的帐目已逾三周，“已发现孚中等公司有利用人事关系，获取特殊权利之重大嫌疑，且有以取巧手段、图谋重利之情形，如将容七人以下之汽车，改装成容七人以上之汽车而输入。此种不择手段、花样百出，确有碍政府之法令，吾人决不能否认孚中等公司为官僚资本之表现。”他还进一步要求政府迅速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予以彻查，“如确有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而营私舞弊者，自可依据所获得之事实，遵循法律途径，以求合理解决。”

消息传到海外，也立即引起海外侨胞的愤慨。7月31日，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呈请中央彻查孔、宋财产，并征用其国外存款。呈文中称：

查前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二氏利用其政治上之特殊势力，垄断我国出入口贸易，由美输华商品，不论大小，囊括无遗，国内外正当商人备受压制，难与竞争，疾首蹙额，忍痛难言。最近中外报纸舆论揭载孔、宋二氏所经营控制公司、商号数十家，此等公司向政府所购取之官价外汇是否合于法定？其所购进之入口货有无违反入口货管理规程？其所获得巨资有无缴纳赋税？实有彻底查究之必要。……呈请政府派员调查孔、宋二氏所组织之公司财产账目，并依政府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征用孔、宋二氏存于外国银行之款项，以充国库。

瞒天过海，留下历史谜案

正当国内外舆论报导此事沸沸扬扬之际，情况突然发生了逆转。7月31日，也就是这则消息披露的第三天，同样还是这家《中央日报》、也同样还是在第4版上又登出了一则类似更正的启事：

非法结购外汇案中的另一主角孔祥熙

前日本报记载孚中、扬子及中国建设银公司之新闻一则，各报颇有转载，本报对于此项记载，特声明如下之两点：

（一）本报记者未见财政、经济两部调查报告之原件，故所记各节与原件当有出入之处。

（二）本报所记载各该公司结购外汇之数目，有数处漏列小数点，以致各报转载时，亦将小数点漏列。查

孚中公司结购外汇为一五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

扬子公司结购外汇为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

中国建设银公司结购外汇为八七七·六二美元。

为了扑灭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有关部门煞费苦心，最后还是由陶希圣出了个主意，即以漏列小数点为名，将上述三公司的结购外汇数目缩小了一百倍。7月30日，行政院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三中全会临时动议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帐目一案，查关于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一节，业经上海地方法院分别依法判处，至关于彻查‘官办商行’帐目一节，已由财政、经济二部派员严密调查”云云，并随函附呈“调查报告”，其要害部分即是将三公司结购外汇的数额缩小了一百倍。8月2日，《中央日报》在第2版上刊登了所谓财政部的调查报告，内容主要是说明孚中等公司进口及结汇均属合法，且数量有限，如中国建设银公司“于上述期间内，共购得美汇八七七·六二元，系为购打字机、订书机之用，约占中央行所售外汇总额五十万分之一”。紧接着自8月3日起，扬子建业公司又连续几天在《中央日报》的第1版用大字标题刊登启事，声称“合众社廿九日电讯关于财、经两部公布调查孚中及本公司新闻

一则报导与事实不符"，"报导错误，歪曲事实，深恐以误传误，特此声明"云云。

一则漏列小数点的启事，即将孚中等三家公司结购外汇的数额缩小了一百倍，也暂时化解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危机。然而真相如何?是否真的漏列了小数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未解之谜。事隔多年，经过当事人的回忆，这件疑案才逐渐揭开了谜底。

蒋氏追查，记者侥幸脱险

据陆铿先生的回忆说，7 月 29 日的消息刊登之后，宋美龄在上海看到英文报纸的转载，大发雷霆，并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这还得了，自己办的报纸居然骂起自己人来了！"，要蒋介石加以严办。蒋一方面命令立即消除影响（最后采纳了陶希圣提出"漏列小数点"的建议），同时委派陈布雷和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二人负责调查此事。

调查结果很快就查到了：这篇报导出自于陆铿、漆敬尧之手。此时陆铿也知道闯下了大祸，但他还坚持维护记者的良心和道德，拒不说出是什么人透露的这个消息。

当初为了障眼，同时也是对财政部拒不合作的态度表示不满，陆铿在报导中故意说"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因此首先从财政部内部调查泄密的来源。但是调查了财政部所有涉及此案的高级官员，并无任何结果。

调查没有结果，陆铿又拒不交待，陶希圣只好向陆铿传达蒋介石的口喻："我是国民党的总裁，你是国民党的党员，你必须对我讲出是谁给你看这份报告的。"

陆铿说："那我退党可不可以?"

陶勃然大怒道："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脑袋掉了是不会再长上去的！"

陆铿本来就对陶希圣不敬（陶曾降日），在办报宗旨上彼此又心存芥蒂，因此便反唇相讥："脑袋掉了是不会再长上去的，可是一个人要是不怕掉脑袋那又怎么样呢?"

李惟果等人在一旁听了大为吃惊，连忙斥责道："大声（陆铿的号），你怎么能这样同陶公说话呢?还不快向陶公道歉!?

事情弄僵了，上峰决定将陆问罪，但究竟是由军统还是宪兵处理却发生争论。经疏通，最后决定由宪兵队出面逮捕，为此与陆铿是忘年交的于右任还亲自打电话给宪兵司令张镇，反复交待"不准用刑"。

8 月 4 日上午，陆铿在报社楼上听到有人叫他，下楼一看，原来李惟果正在外边一辆轿车旁等他。陆铿忙说："请你等一下，我上楼拿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你要拿什么东西?"

"坐牢也总得带几件换洗衣服嘛。"

"谁说抓你坐牢了?快跟我去见总裁！"

于是，陆铿便随同李惟果乘车到了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

李、陆二人进入官邸后不一会，蒋介石走了进来，脸色十分阴沉。陆铿告诉我，他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当时瘪着嘴，没有带假牙。

蒋介石见了他们一句话没说，只是用手摆了摆，示意他们坐下。陆铿随即坐了下来，李惟果不敢坐，直到蒋再次示意，才小心翼翼地坐下。

蒋介石盯着陆铿看了几眼，这才恼怒地说："你就是陆铿。你为什么要反对中央?"

陆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校长（陆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我没有反对中央，请您听我解释。"

"我不要听你解释，我只要你告诉我，是谁透露这个消息的?"

此刻陆铿顾不了许多，也不管蒋介石爱听不爱听，笔直地站在他面前，一气讲了四十多分钟。

陆铿首先叙述了抗战期间他在河南前线看到士兵饥困的生活惨状，再谈到后方官僚豪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情形，接着又抨击 CC 系心胸狭隘、制造内讧的丑行。陆铿发现起初蒋介石的眉头紧皱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听着听着眉头开始有点松动，当听到陆铿攻击 CC 时，蒋介石甚至流露出一种惊讶的表情。于是陆铿猜测，看来连蒋介石都相信 CC 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央日报》一直是 CC 控制的阵地。

陆铿见蒋介石的态度有所转变，也立即改换话题说："我是校长的学生，受到校长多年栽培，在此党国生死存亡之关键时刻，学生以为若能由《中央日报》揭露此事，正表明吾党之伟大及肃贪之决心。"

蒋介石听到此话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李惟果见机会难得，赶快站起来说："总裁，陆铿年少无知，一切都是惟果管教不力，请总裁严加处罚!"

蒋介石将手一挥，"我一个人都不处罚!"

陆铿听到此话立即大声说："谢谢校长!"说完就拉着李惟果头也不回地退出了黄埔路官邸。

一场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但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团。

（责任编辑：萧徐）

矢志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

● 刘正夫

"我的天职，是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让聋儿开口说话;我的目标,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为中国的聋人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我愿把学到的知识技术,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残疾人康复事业,为使我国的听力学早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终生奋斗!"

1994 年，当国际听力学会郑重吸收张华为它的成员时，中国聋人康复事业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中国有了唯一的国际级高级听力专家兼耳鼻喉科专家。

张华在协和

张华,出生于泰山脚下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是流行病学专家,母亲是耳鼻喉科医生。由于家学渊薮的影响，从小喜爱文学和音乐的他，更对医学情有独钟。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张华以无可争议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南京铁道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被留在南铁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南铁医院，有两件事，对张华未来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是在选择学科专业时,他果断地把自己的主攻方向定位在"耳鼻喉科",对此,他风趣地解释为"子承母业";

另一件是，一次偶然的北京之行，把张华领到了聋人康复事业的起跑线。

1983 年 3 月，一列风驰电掣的火车载着年仅 25 岁的张华奔向首都北京,他应邀去参加中国医学科学院为欢迎美国听力学家代表团而举办的国际听力学交流大会。他在会议上作了《噪声中言语辨别测试在助听器选配中的应用》的发言。这一发言,不仅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还特别引起了中国耳鼻喉科学会主席王直中教授的注意。

在教授与张华的一次次长谈中,两人找到了相同的感觉，达成了共同的意向·张华在考试合格后做王直中教授的研究生。

1985 年秋季,张华终于圆了"协和梦",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协和医大研究生。

在王直中教授的指导下,张华把聋人诊断、治疗、康复和评价的高科技难关作为主攻方向。

在研究中张华发现,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几乎都是英文、德文、日文,中文资料极少。而包括聋人在内的中国人是讲汉语的。

聋人渴望听到的,不仅是声音,更要听到语言。语言,是人和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显著标志。

王教授对张华说："你要研究和攻克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中国聋人的诊治康复目前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中国的听力学现状患的是一种"综合症",既有科技、人才因素,也有经济、历史原因,还有社会观念、世俗偏见的痼疾。

张华要攻克的听力学本身又是一门综合学科,它包括物理声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当然还有医学。为了学会这"十八般武艺",张华跑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

此前,我国的老一辈专家曾对聋人汉语评价做出过有益的开拓性的研究，但只是局限在词表、辅音等单一方面。

那时,世界上只有一套 MAC 系统,也就是英语最低听觉功能测试,张华决心在 MAC 的后面,再加一个代表中国汉语的"C"，形成世界上第一套汉语最低听觉功能测试系统——MACC 系统。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张华专门参加了南开大学的现代语音学培训班,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研究所、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耳鼻喉科研究所、中国聋儿康复中心等专门机构进修，在诸多专家教授的指导帮助下，历经三年的潜心研究，张华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个、世界唯一的汉语全套测听系统——MACC。

MACC,由 17 个部分组成,在元音、辅音、单词、短句、环境声、双音节词等方面,全方位、系统科学地实现了中国聋人的汉语最低听觉功能测试。更难能可贵

的是，这套系统甚至具备了辨别各地方言的能力。

1988年6月，一个为MACC鉴定的专家会议，也是张华完成研究生学业的毕业论文答辩会在北京举行。姜泗长、王直中、郑中立、刘延、汪磊、鲍怀翘等各界专家学者对MACC作出了鼓舞人心的评价：

——MACC，填补了国内外汉语电子耳蜗术前术后评价和聋人语言评价标准的空白。

——MACC，是我国制定聋儿康复标准和聋人康复研究者从事科研的依据。

——MACC，是汉语测听术的新的里程碑。

由张华作为第一撰稿人的《汉语最低听觉功能测试(MACC)的设计及初步应用》一书出版。中国医学界作出了最快的反应：中国医科院将其列为馆藏，MACC载入了《中国耳鼻喉科医学史》。

1988年7月，张华以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得以留校，旋即担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

协和得天独厚的临床机遇，使张华的实践水平很快提高。他参加了具有国际水平的电子耳蜗手术、喉癌手术后的发音重建手术、内窥镜鼻腔手术等疑难手术。

1990年秋，协和医院开设了一个特别的门诊，这就是张华医生和他的助听器专科门诊。

众所周知，人的耳朵里有一个象蜗牛似的“小零件”，学名“耳蜗”。它把外界的声音转换成“神经电”传送到大脑，由大脑感知分析后，人才能产生语言感。耳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毛细胞”，它一旦死亡就不会再生，于是就产生“耳聋”。临床实践证明，绝大多数神经性耳聋是很难用手术、药物、针灸、气功治愈的。中国有句俗话：“十聋九哑”，道出了“聋”、“哑”之间的因果关系。“哑”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发声器官出了毛病，而是由于听不到声音不会“讲话”。聋哑人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他们用手语交流，听不见自然声响，参加不了正常的社交活动，享受不到正常人的欢乐，封闭在自己的小社会里。但是，这并不意味聋人将永远处于“无声世界”。助听器可以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回到正常人生活的主流社会。

协和的助听器门诊，使各地聋人纷至沓来，也让张华感受了一次次心灵上的震颤。

测听室五、六平米的空间，用厚厚的隔声材料封闭成一个声场，当时受条件所限，没有空调通风设备。病人坐一个小时就热得受不了，而张华却往往要在这里“蒸”上八小时。

和聋哑人说话，声音要很大。一句十分简单的话，“你多大年纪——”、“能听到我说嘛——”，要重复地“喊”上半天。张华坦言：“说话嗓门大，是我的职业病。”

遇上严重失聪听不到声音或讲方言的患者，张华还要用手比划，写字，或者通过家属“翻译”。

许多患者由于长期失聪，形成了心理障碍或心理闭锁，对“外人”抱有不信任感，甚至是抵触情绪，对治疗采取“不合作”态度，张华就首先要当他们的朋友，消除屏障，化解“敌意”。

张华成功了。一位位聋人带着“声音”，也带着感激，告别了无声世界。在一封封浸着泪水的感谢信里，他们这样评价张华：“您的医术高超，但您的爱心高于医术！”张华这样评论自己：“没有爱心，干不好这一行！”

然而，在张华的门诊部，“喜悦”和“苦恼”往往结伴同行。

一位担任编辑工作的女患者来到门诊部，向张华

为病人选配助听器

在徐州接受新闻界采访

倾诉：由于工作需要，她时常要出入社交场合，不愿意戴笨拙外露的耳背式助听器，让别人发现自己的缺陷。虽然，国外已经有了十分先进的不暴露的完全耳道式助听器，而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技术和产品。张华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在一次耳鼻喉科的学术会议上，张华用投影仪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助听器研制企业美国斯达克公司推出的最先进的耳道式助听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会后，许多人追着问张华有没有“现货”？他无奈地摇摇头，他有的只是手中的那张图片。

国外的先进技术让张华打开了眼界，同时也深深刺痛了这位中国医生的民族感和自尊心：在聋人康复领域，我们确实技不如人，但不应该也不会永远技不如人。我要去“西天取经”，用取回的真经为中国聋人服务。

张华在美国

1993 年 3 月。

张华应美国斯达克公司总裁奥斯汀的邀请，前往学习现代助听器技术。

斯达克公司创立于 1967 年，主要从事助听器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和维修。凭着高科技领先和雄厚资金的支持，斯达克在进入 70 年代后，在定制助听器的制造方面一路领先，执世界同行业之牛耳。

斯达克公司的超微型完全耳道式助听器的销售量占美国市场的 70%，占全球市场的 56%。

到斯达克总部的第一周，张华参观了这一“助听器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他喟叹、他震惊：“我从没有想到，小小的助听器会有如此庞大的机构、完整的体系以及那么多的人在研究开发！”

张华在这里参观了生产流水线（他认为作为助听器的选配专家，应该了解助听器的制造全过程），看到了世界最先进助听器的“实物”。

张华在该公司的客户服务部门感触颇深。他发现这一部门的工作就是通过打电话听客户的抱怨。美国人是十分挑剔的，但不管怎样挑剔，不管是否属于公司的责任，服务人员总能让客户在电话那端满意地笑起来。张华从这里窥探出了斯达克兴盛的“秘笈”。

奥斯汀总裁在和张华的一次交谈中，把这一“秘笈”和盘托出：“斯达克要给客户提供任何人都无法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连客户自己都想不到的服务！”

在工作笔记中，张华写道：“斯达克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服务，这包括它的服务理念、服务手段和服务机制，我要把这种服务的精神带回去，使中国聋人受益。”

不久，张华到明尼苏达州听力专家门诊部进行短期工作，一面向美国专家学习助听器选配技术，一面直接参与选配实践，为病人服务。此间，张华以他那无可非议的医术和技术，征服了明尼苏达州。

美国《听力学新闻》对这位“双料专家”作了详实的报道，并第一次给予了一位东方人让西方人眼热的评价：“张华医生是把中国医学和美国听力学结合起来为病人服务的先驱者。”

5 月。应俄勒冈州州议员威路比先生的邀请，张华前往该州波特兰市的助听器选配中心学习工作。

在波特兰市，张华参加了三期听力学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上，张华又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一天傍晚，张华刚下飞机，就匆匆赶往培训班听课。一进门就看见黑板上写着“重振”。

“重振”是耳鼻喉科的一个术语，理论上讲，它是指病人的舒适域和不舒适域之间的差值，也叫“动态范围”，动态范围非常窄，就叫“重振”。

但在课堂上，不管美国教师如何讲，许多学员还是搞不懂什么是“重振”。

张华站了起来：“重振，简单地说，就是小声听不见，大声受不了。”

学员们的目光从黑板移向张华。

张华接着解释：重振的病人，就好象一个巨人站在一间地板很高、天花板很低的小房子里，一不小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舒适域”象地板，“不舒适域”象天花板，它们之间的距离越窄，耳朵就会震得受不了。

学员们热烈鼓掌。

在掌声中，那位美国教师把张华请上了讲台。

第一期培训班，张华是学员，第二期是助教，第三期他走上讲台，从学员变为教师，给包括美国学员在内的各国学员讲授听力学。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表为发达国家的学员讲课，张华刷新了一个记录。

三期培训班，象三级台阶，把张华送上了 BC—HIS 这一新的高峰。

BC—HIS，是国际听力学会高级听力学家暨资深会员的考试，也是国际听力学专业最高级别资格的考试。

张华靠在祖国学到的知识，靠平时的积累和临床实践，靠赴美后杰出的表现，一次性通过了考试。

从此，张华成为国际听力学会高级听力学家（注册号 3593），同时也取得了国际听力学会资深会员的资格（注册号 8468）。

三个月后，张华又参加了另一次重要的拼搏——俄勒冈州助听器专业选配师的考试。他获得了俄州助听器专业选配师的执照（注册号 1020）。

不久，国际听力学会又给予张华另一项殊荣——授权他担任只有资深权威人士才能得到的“资格考试监考人”职务。这是该学会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中国国籍的监考人，而整个明尼苏达州也只有两人，除张华外的另一个是《国际听力学会资格验证教材》一书的主编。

在国际听力学领域，中国，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此时，正如大多数读者所能猜测到的那样，美国向张华发出了明白无误的信号：张华医生，美国欢迎你留在这里工作。应该承认，这一“信号”是真挚友好的。

张华无可讳言地认为，在那块土地上，有着优越得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着优厚得多的薪金待遇。他甚至对许多为此而千方百计“奔”绿卡的同胞，表示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解。

但是，张华不留在美国！

他清醒地意识到，祖国的听力学整体水平还处在落后状态。祖国需要他，中国的聋人需要他。对张华来讲，不论是民族的“根”，还是事业的“根”都在中国。“我爱我的事业，我更爱祖国的聋人同胞。学成回国，解开他们紧缩的眉头，让以前的遗憾不再遗憾，是我的夙愿。”

在明州斯达克总部、国际贸易中心、西北银行总部、加州中国市场研讨会，张华作了一次又一次报告，发表了一次又一次演讲，但内容不再是听力学学术问题，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篇大文章。

——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

——中国的1770万聋人急需得到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帮助；

——最关键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外国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为各位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张华的中国市场分析报告，坚定了斯达克的投资决心。这家在欧美有着广泛影响和巨大利益的世界一流企业，最终做出了向中国市场投资的果断决策，与此同时，也做出了另一项明智的决定：由张华领导斯达克中国公司。

1995年12月，在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刻，一驾银鹰从美利坚大陆呼啸而起，飞向东方。

张华在苏州

中国。苏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苏州新区)。

依傍着清灵秀丽的狮子山，一家要为聋人找回“清灵秀丽”感觉的外企——斯达克助听器（苏州）有限公司，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挂牌开业。

张华，这位听力学和耳鼻喉科“双料专家”，又多了一份“第三职业”：斯达克苏州公司法人代表、董事兼总经理。

一天，苏州公司来了一批由国内专家、聋人亲属、媒体记者组成的“参观团”，在“张总”的全程陪同下，“解剖”了整个公司。

他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堪称“世界最新助听设备与技术的博览会”：

这里有国内医院很难见到的具有录象和彩照功能的“动态电耳镜”，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能非常直观地看到耳内“世界”，使诊断更加精确；那套真空吸引装置，能清除由北方沙土或南方汗渍造成的助听器污垢，有效延长助听器的寿命；在听力研究实验室、助听器改良实验室，一些美国、加拿大的技术人员操作着先进的听力计、助听器测试设备和具有助听器选配资料处理软件的电脑。

几位聋人亲属拿着从未见过的象工艺品似的各种耳内式、耳道式助听器，左瞧右看，争相询问，啧啧赞叹，爱不释手……

一位“蓝领”指着一条簇新的生产线介绍说：苏州公司和斯达克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分公司一样，每三个月更换一次线路，每年更新一代产品，中国聋人在这里选配的助听器，保证是斯达克当年的最新产品！

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而张华的一条“新闻发布”，更是语惊四座：

“诸位刚刚看到了各种新产品，实际上是看到了一种‘新概念’，这就是我国聋人将第一次接触到的‘定制式’概念。大家知道，以前包括现在大多数聋人使用的是‘标准式’助听器，这种助听器是任何患者都能用的。而‘定制式’是一对一的，因为每个人的外耳道是不同的，粗细、长短、曲度都是不一样的，听力损失的原因和程度也都不一样。‘定制式’助听器将让中国聋人带上适合自己‘不同特色’的，也是反映了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助听器！”

张华曾用一个字，解释自己所遵循的职业道德和服务精神，这就是：“爱”！

张华的“爱”是严格的。他给公司的员工定了一条起初叫人很不理解的“规则”：在你们帮助的100名患者中，至少要有1位是流下眼泪的，否则，就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在无数个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的工作日，员工们看到了一幕幕永生难忘的场景：儿子在20岁时第一次听到慈母的声音，母子相拥而哭；妻子千方百计动员已失去信心和耐心的丈夫来到这里，奇迹发生了，夫妻喜极而泣……患者流下了眼泪，员工们也流下了眼泪。他们真正理解了张总那条规则的内涵：聋

人康复事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崇高神圣的事业。

张华的"爱"又是残酷的。为了医治南方各省普发的中耳炎病，张华走进苏、皖、浙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为乡亲们义诊，从清晨五、六点，一直看到夜晚，不收一份谢礼；在陕西铜川贫困山区，张华向当地医院无偿捐赠了数台美国原装的助听器；为了传播先进的听力技术，他不知疲倦地开办各类讲座、培训班，为顶住一天的"嗓音消耗"，自己掏腰包买喉症片吃。

张华的"爱"更是超常的。"爱屋及乌"，凡是与聋人康复事业相关的，均在张华所"爱"之列。在他心里，绝没有"同行是冤家"的陈腐观念。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的雇员慕名而来想旁听张华的讲座，又怕被张华拒之门外，进退两难间，张华闻讯赶来，热情地邀请他们入席，在讲课时还特别加上了竞争对手关心的相关问题。张华认为，医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同是国人，更应该做到"资源共享"。

周婷婷的故事

周婷婷，是中国聋儿中的"知名人士"，这位严重失聪后自强不息，与命运顽强抗争的 17 岁残疾女孩被舆论界誉为"当代中国的海伦·凯勒"。

她的听力损失达 105 分贝。站在汽车旁听喇叭响，就象听蚊子叫。婷婷长期戴着笨拙落后的耳背式助听器，学习、生活很难自理。在了解到斯达克苏州公司的情况后，她抱着一线希望，由父亲周弘——一位既为女儿难过过，更为女儿骄傲过，立志转向聋人康复事业的聋校副校长的陪伴下，找到了张华。

一位杰出的专家为一位杰出的病人选配助听器，使许多听力界同行闻风而来。人们太想亲眼看到奇迹的发生。他们静静地企盼着，默默地祝福着，也暗暗地为张华捏了一把汗·婷婷的耳朵毕竟是被许多大医院判了"死刑"的啊!

张华和他的助手们，为婷婷作了全面而精细的检查。在采取了耳样后，张华决定为婷婷选配一对最先进的完全耳道式的"隐形"助听器。

张华用手心轻轻地托起这对助听器。他觉出了一种沉甸甸的分量，他感到托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渴望，是一个时代的嘱托。

在定制的三个多小时里，人们坚持等候在外面，谁也没有离去。

人们终于等到了:张华走出了工作室。

张华把助听器放进婷婷的耳道。人们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谁也不想，确切地说是不敢发第一声问。

也许是花季少女有着爱美的天性吧，婷婷戴上助听器后，首先走到一面大镜子前，她拂起秀发，当证实再也看不见那个耳朵外的多余"饰物"后，她笑了，她甜甜美美地笑了。

周弘忐忑不安地走到女儿身边，小心翼翼地问：

"听到……声音了吗?"

"听见了。爸爸，我——听——见——了!"

周弘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把女儿抱在怀里。

就在这一天，周婷婷与远在南京的奶奶通了长途电话。

1997 年 5 月 13 日，江泽民总书记亲切会见了全国自强模范的代表，并亲自听取了周婷婷的汇报。在接见后的座谈会上，周婷婷也清晰地聆听到了总书记亲切而有力的声音："今年是杰出的音乐家贝多芬逝世 170 周年。他的著名交响曲《英雄》、《命运》、《田园》等，都是在失聪之后创作的。每当我们听到《命运》交响曲那激昂高亢的旋律时，就会想起他的一句名言：'我是无畏的英雄，我要与命运抗争，扼住它的咽喉，决不向它屈服。'"

在成绩和赞扬面前，张华是冷静的。他想起了奥斯汀老人的一句名言："今天好于昨天，明天胜于今天!"他须臾不敢忘这句名言，他要为明天而奋斗。

(责任编辑　洛松)

本刊启事

时至年中，下半年刊延误订阅的读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 4.80 元。补购或预订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现仅有 1997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4 元，简装每套 49 元）及少量 1996 年合订本（精装每套 52 元，简装每套 49 元）。创刊至 1995 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磬，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本刊自 1994 年——1997 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 至 4 期均有存书，每册包括邮费 9 元，欲购请直接汇款。

本刊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25 或 64031144 转 2004

联系人:谷世章

郭琇：成也“三疏”败也“三疏”

● 肖　冰

郭琇 (1638—1715)，字瑞甫，号华野，山东即墨人，康熙朝先后为官十四年，以“三疏”威震朝野，在封建王朝中算得上一位正直敢言的好官。由于官场险恶，导致他仕途坎坷，历经大起大落，横遭诬陷，甚至差点搭上身家性命，直至垂暮之年才得以伸雪。

一、“三疏”震朝野，连升四级

第一疏：《参河臣疏》，投康熙所好，乃郭琇一生中之憾事。

康熙二十七年 (1688) 正月二十二日，郭琇第一次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朝廷上了《参河臣疏》，致使河道总督靳辅被罢官，佛伦被降职。此疏尽管当时曾轰动朝野，但事实上郭琇的这一本确实参得靳辅有些冤枉。就历史上看，当年靳辅治河是很卖力气的。他重用布衣治黄专家陈潢，在长达十几年的治河实践中，有一系列独到的建树。就此而言，当时靳辅不但无罪，而且当为治河之功臣，后来康熙再次启用靳辅，并褒扬说：“靳辅任总河，数年未曾冲决，漕运亦不误。今不出四载，黄水又重新猖獗泛滥，朕实不惬！河务不得其人，必误漕运。及辅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纾年之虑”。靳辅当年之功过是非便一目了然。那末，为什么郭琇要参奏功臣，而康熙又准了郭琇的奏疏呢？原因有二　一是郭并无意陷害靳辅，而是他缺乏调查偏听偏信之所为。当时靳辅为解决治河经费之不足，采纳幕客陈潢意见，在下河实行“屯田”。即把下河经过治理，洪水退后闪出的大批土地分给山东、河南等地无家可归的灾民，并贷给他们种子、牲畜、农具，等收获后交纳一定数量米粮，充做治理黄河之费用。此举无论对朝廷、对灾民应当说都是好事，可就在此时，地方上的土豪劣绅见有机可乘，便勾结官府纷纷从屯民手中抢占屯田据为已有，造成一片混乱。为此，靳辅曾派员严格清查，制止其胡作非为。于是豪强们便无中生有，大肆诬陷中伤靳辅“阻挠开浚下河”，以及“屯田扰民”。当时，作为监察御史的郭琇，接案后有责任向朝廷反映情况，问题是他没有作深人调查，只看现象，便偏听偏信，一疏奏上。二是康熙皇帝本来就对大学士明珠等人擅权专横不满，而河道总督靳辅平时又恰恰紧紧以明珠等人为政治靠山。处理靳辅，实为“杀鸡警猴”，对明珠、佛伦、余国柱等人敲敲警钟而已。也许郭琇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同康熙“心有灵犀一点通”，抓住治河一案，向明珠开刀。然而，一场上层的政治争斗，一道不太负责任的奏疏，却把靳辅当成了替罪羊，甚至连陈潢这位被后世所公认的清代著名水利专家也因此案而含冤九泉。这不能不说此举是郭琇一生中的可憾之处。清同治版《即墨县志》将郭琇三大疏稿只选载了两疏，唯《参河臣疏》没有选载，看来并非编者之疏漏，而是很有见地之举。

第二疏：《纠大臣疏》，参倒了一批擅权佞臣，声名大震。

继《参河臣疏》不久，郭琇紧接着上了第二道疏本《纠大臣疏》，从靳辅身上把笔锋一转，单刀直入地指向了大学士明珠及余国柱等一帮佞臣，揭发他们结党营私，排隔异己，贪赃枉法等罪行。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云．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云：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于每日启奏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待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其措词之严厉，事实之详尽，将明珠、余国柱等揭露得淋漓尽致。

当时明珠、余国柱等人的擅权、贪婪朝人皆知，康熙皇帝一不聋、二不瞎，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总得有朝廷大臣参他，皇帝才好借故治其罪。可是，明珠、余国

柱那等权势谁人敢参！有几个言官也曾“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再有哪个敢以卵击石呢！所以，郭琇这一本是冒着极大风险上奏的。康熙曾问侍臣：“明珠如此，何无劾奏？”侍臣答曰：“人孰不畏死？”郭琇在疏中也曾明确指出：“臣固知其党羽实繁，睚眦必报”，“伏见皇上求治，辨别奸贤，正朝野肃清之会。窃思报效，不顾身家。”当时也有另一种议论，说郭琇精明异常，早已洞察到康熙励精图治，久欲拿权臣开刀，苦于无人上疏，才敢投皇帝下怀毅然上疏。然而，康熙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象郭琇这样敢于上《纠大臣疏》的直臣实在太少，也实在可嘉。所以，他不但没有对郭琇加责，而且立即准了其本奏，并在上谕中作了处分：“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清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明珠毕竟是满族官员，且有功于康熙王朝，所以康熙还是为他开脱罪责，从轻发落了。余国柱等遂被逐回籍。明珠之流被参倒，郭琇由此声名大震，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器重，被破格擢升为左都御史，从从五品一跃升至为从一品，连升四级。

第三疏：《参近臣疏》，红极一时的权臣被罢官丢禄。

郭琇有了康熙皇帝做后台，胆量更大了。次年，便又上《参近臣疏》，弹劾皇帝近臣少詹事高士奇、原任右都御史王鸿绪和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等植党营私、徇情枉法、贪污自肥等罪行。疏中列举了高士奇等人四条可诛之罪：“……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摇，以图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夫办事南书房者，先后岂止一人，而他人之声名总未著闻，何士奇一人办事，而声名赫奕乃至于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科臣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员，皆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然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人皆为之曰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撞岁，亦居之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高士奇是担当皇帝侍读、侍讲、起居注之职，甚得康熙赏识，常“以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讲章诗文”。他结交了一伙朝廷权臣，植党营私，招摇撞骗，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其贪婪之心不亚鲸吞，故郭琇在疏中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又“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修整花园。杭州西溪，广置园宅，苏松淮杨，王鸿绪等与之合伙生理，又不下百余万。窃思以觅馆糊口之穷儒，而今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足给于各官。然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洋洋一道疏本，罪状列数有序，事实有证有据，如板上钉钉，那容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结果，红极一时的高士奇等权臣亦被罢官丢禄。

二、“三疏”对“康乾盛世”功不可没，康熙赞郭琇“持正清廉”

郭琇这紧锣密鼓的三大疏，顿时引起“群党侧目，百端交构”，“天子为之改容，举朝为之失色”，“直臣之风，震霆一鸣，金壬解体”，因此时人赠其雅号为郭三本。从政权建设上看，郭琇这三大疏，特别是后二疏，有力地抨击了贪官污吏的腐败以及结党营私的不正之风，这对清王朝朝纲的整肃和朝政的巩固，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来人们所乐道的“康乾盛世”功不可没。因而康熙曾在上谕中赞扬巡抚李光地、彭鹏及总督张鹏、郭琇“四臣皆持正清廉”。当时“上所倚毗，尤重者湖广总督郭公，北直巡抚李公，江南总河张公，广东巡抚彭公，朝政大者，往往驰驿而咨焉，唯其言是采择，天下号‘四君子’”。著名学者赵侗学曾立言说：“余时虽不能识华野先生之为人，然已耳熟其名矣。迨稍壮，乃知先生正色立朝，弹击不避皂囊，所进前后三大疏，是以扶乾坤之正气，树朝廷之直声。”卢雅雨亦在《山左诗抄》中赞道：“公直声动天下，新城之文章，武定之事业，当代并峙为三。”顿时，天南海北“谁人不识君”，都知道郭琇其人。“自戊辰、己巳，海内推直臣，耕夫、红女、皂隶、庸丐、跛蹇、瞽蒙，未有不津津道郭公者。”当时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甚至引用郭琇为老乡。即使在后来郭琇被罢官十载，一朝迎驾德州时，郭琇的同年、知府卢道悦目睹其情景后写道：“同年郭华野先生来德州接驾，父老想望风采，遍道聚观，车不能前。昔温公赴阙，卫士加额，前后若合符节。予得之目睹，形诸诗歌，非私阿所好也。”上至皇上推崇，下至百姓附心，可见郭琇在当时朝野中的声名之高，影响之大。

三、郭琇因“三疏”遭诬陷被罢官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在举国上下沸沸扬扬大言郭琇功德之时，郭琇的政敌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罢手，

尤其是那些被郭琇参倒的权贵们更是剑拔弩张伺机反扑。不久,郭琇便遭到明珠余党的诬陷,被罢官回乡了。可以说,郭琇因三大疏而起家,又因三大疏而招祸,终生不得安宁。这三大疏在郭琇一生的官场生涯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得也有失,可谓三疏定平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山东道御史张显法弹劾山东巡抚钱珏贪黩罪,钱珏因开脱罪责而反咬一口。说因郭琇曾致书举荐即墨知县高上达,遭钱珏拒绝,所以郭琇因泄私愤才驱使张显法弹劾他。郭琇即抗辩说:“某为总宪,岂不敢参一巡抚,而假手御史耶!”部议定郭琇私书罪拟杖刑,康熙皇帝以郭琇平日鲠直敢言,乃改降五品调用,这也算是皇恩有加了。时佛伦为山东巡抚,见有机可乘,便趁火浇油上疏诬告:“郭琇嗣父郭尔印乃明季御史黄宗昌家奴,郭琇之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入贼党伏法。郭琇私改父名请诰封,应追夺。”部议同意此请,将郭琇逮江宁勘治。康熙皇帝有意为郭琇开脱,便特谕大学士伊桑阿着无人处问郭琇是否真系郭尔标之子,郭琇即以诬陷作答,且流涕道:“言臣祖父文耀横被尔标之乱挟仇谋害,指仇为亲,实属罗织!”康熙知之,特令郭琇休致还乡。至此,从三大疏到还乡,仅短短三年之内,一个正直敢言、忠于朝廷的有为大臣被彻底清除出了清廷,除去了明珠余党的肉中刺、眼中钉。然而,这些人仍不舍弃,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郭琇的明查暗访,鸡蛋里挑骨头,非要找出点事来,将郭琇置于死地而后快。由此可见,清廷官吏之间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是何等厉害,何等不可调和。不几日,佛伦又上疏:“郭琇系休致之员,乃悖旨不速回原籍,潜藏京师,串通明党,夤缘生事。”接着,又有人参奏:郭琇任吴江县令时,坐侵米粮二千三百余石,勒郭琇携家人周德明等急赴江南对质。一时间,狂飚四起,乌云压顶,百官为之咋舌。眼见得此时的郭琇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了。官场险恶,到此显而易见。

其实,米粮之事是这样的:郭琇任吴江县令时,县丞赵炯经收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的漕米二千三百石,具有贮仓印结存案。赵炯暗中制造亏空,郭琇不知。后来,仓贮署印移交给张绮梅接管,赵炯之行败露而畏罪逃匿。郭琇闻知后,即差家人董起风等于康熙二十七年代买足数还仓,并即刻通令严捕赵炯。而江臬高承爵系明珠之侄女婿、高士奇之宗亲,素日恨郭琇之极,便故意放纵赵炯而不缉。本来是早已了结的一桩陈案,而明珠的余党们为了彻底整垮郭,又将其重新翻动出来颠倒黑白强加于郭琇身上。

为对质此案,年已五十三岁的郭琇,冒酷暑于七月初六日自京起行,二十九日回到山东。巡抚佛伦即差人押送,于九月初七日抵达江宁,发上元县关押,等候月余不得审。十月初十日,开始夹讯经承、周德明等,均供赵炯侵粮,郭琇为之代赔,张绮梅亦在堂上出示赵炯印结,然而主审官高承爵醉翁之意不在酒,根本不看不问。十二至二十日复审,再次用酷刑夹讯经承等,逼其供认郭琇亏空米粮案。张绮梅被连夹十一夹仍不开口,并屡夹原差刘英,逼其说出赵炯逃逸系郭琇藏匿。郭琇忍无可忍,厉声对张绮梅说:“若辈不过欲死我耳,何不诬承而自苦若是!”高承爵拍案大吼:“郭尔不畏死耶?”郭琇笑答:“我畏死不至此。畏死者方坐堂上!”此时,明珠、高士奇皆伏于屏风后窃听。审讯者倚仗酷刑反复逼供,受刑者主持正义至死不招,审讯很不顺利。

来年春正月,康熙皇帝特恩准放免郭琇回籍,然而高承爵等仍不使归。郑中丞劝说:“今奉旨宽免矣,君恩已赦,而我等犹不赦乎?”高承爵狡辩说:“倘在道上生事奈何?”郑中丞说:“他境生事,何关我虑!”高承爵这才语塞放归。此案幸亏康熙皇帝还算英明,知道郭琇正直敢言,树敌太多,别人有意加害,故出面调停。否则,几个郭琇也要魂断江南了。

四、郭琇虽得到康熙赏识,但再度被排斥罢官,原因是:“直道难行”

康熙三十八年(1699)五月,康熙皇帝南巡回驾,六十二岁的郭琇奉命迎驾于德州。二十三日,康熙皇帝上谕九卿曰:“朕幸江南,吴江百姓至今感载郭琇,可见是个好官。”六月初一日,九卿奉上谕: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郭琇奉旨后,即于七月十五日走马抵任。

在湖广任职期间,郭琇广播仁惠,励精图治,除革楚地陋俗,过问田赋钱粮,关心黎民疾苦等职权之事外,仍不改初衷,连连上疏,弹劾贪官污吏。刚刚上任,便于八月十一日上疏,“参襄阳知府黄章贪酷及荆南道蒋兴芑互讦状,各拿问”;九月二十一日,又上疏“参兴国州知州张辉祖、嘉禾县知县陈开泰贪劣状。”一时间,郭琇所管辖之处“墨吏望风解绶”,贪风顿缩。在处理湖南苗人骚乱一事中,郭琇亦有其独到见解,他在给康熙皇帝的疏稿中说:“逆苗种类繁多,心性狡黠,弱则稽首请命,强则率众跳梁,我若兴师问罪,彼则窜匿深菁;我若奏凯而归,彼则仍思跛扈,所以,自古不能断其根……”他不主张兴师围剿穷追不舍,而主张能招抚则招抚,不能招抚则移兵防堵,军威壮,声势广,使其不敢肆行。清廷采纳了郭琇之主张,终使湖广无大乱。

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召

见郭琇，然后屏退左右问："东抚王做官何如?"郭琇回奏："做得好极!"静了一会儿，康熙再问："前任伊桑阿何如?"郭琇回奏："极好。"皇帝又问："佛伦何如?"郭琇即跪奏："臣不敢言。臣还有本奏……"康熙皇帝一听嗤然作笑，郭琇遂脱帽叩头大哭，历诉其祖父之冤，并奏请"臣年老，素有痰疾，辨明此冤，求恩罢斥，另简贤能。"皇上回曰："今日复试举子，你且退，明日将本带来。"第二天，郭琇携为其祖父翻案伸冤的疏本入朝，启奏曰："今日之辨白，非敢为挟私报复之计，但此乃臣生平大节，所系国家体统，所至抱冤十载，死不甘心!"此时佛伦已擢升为大学士，列于朝班之首。康熙皇帝即诘问佛伦：当年所奏郭琇改父名讨诰封之事从何而来?佛伦无以所对，只以"风闻"引罪了事。于是，康熙遂降旨还郭琇原封之诰命。郭琇明知康熙皇帝偏袒佛伦：诬陷了人家十年，什么罪责也不担，只用"风闻"二字了事，也实在太欠公道。但皇上为了调和矛盾，敕令封还了郭家诰命，也总算为其平了反、正了名，金殿之上，也就不敢再有什么非议了。

康熙朝政既需要郭琇这样的官，也需要佛伦这样的官。从正直无私而论，康熙皇帝还是相当赏识郭琇的，是年十一月十一日，河南巡抚徐潮陛辞时，上谕告诫曰："尔去但如郭琇为官，不但今日之名臣，即后世亦皆敬仰矣!"第二年正月十七日，郭琇上疏乞休，康熙皇帝降旨曰："卿才品优长，简任总督，正资料理，着照旧供职，不必以衰病求罢。"郭琇再三以病为由乞休，康熙皇帝却一再挽留不准其本，并感叹道："琇病甚，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几人耶!"

然而，就在此时，排陷异己的死波微澜再次泛起。御史左必蕃、给事中宋骏业等谗臣接连上疏弹劾郭琇。于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届六十五岁的郭琇再次被排斥罢官，回到即墨故里。

郭琇二次罢官后，在即墨故里又度过了十三年，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病逝，享年七十八岁。他四十二岁为官，先后任吴江知县七年半，任御史三年，任湖广总督三年半，总算起来在官场的时间不过十四年，而大多数时间乡居在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按说，郭琇为官不为不清，官职不为不显赫，皇帝也不为不器重，但为什么他的官场生涯总是不顺畅，时时有人盯脚后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然《清史稿·郭琇》一文之最后两句算道出了官场之真谛："直道难行，不其然哉!"

(责任编辑：赵友慈)

治疗血液病的新进展

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非常难以根治的内科疑难病，据统计，全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患者死于此病：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环境污染(物理，化学)等诸多因素，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且多发于青壮年，危害性很大，一旦患病便一筹莫展，骨髓移殖效果虽好，限于医疗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能接受这一高难技术治疗的患者十分有限，患者大多采用长期服药和激素治疗，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痛苦。

河南康复中心医院血液专科张问津主任，三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再障病的治疗和研究。他将祖国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吸取众家之精华，经过长期不懈的研究和临床实践，研究总结出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再障病新疗法。张主任认为：再障病属于中医虚劳、亡血范畴。其出血，感染多由于阴虚生内熟，血熟妄行等引起。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等控制症状;其全血细胞减少则是由于造血骨髓脂肪化和水谷气血生化之不足所致，治疗以补肾健脾，化瘀生血，行血理气等为基本疗法；达到增强骨髓外脏器造血，改善脂肪化骨髓，重建骨髓造血微环境、增强多功能干细胞活性、恢复自身造血功能，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由于再障病疗程长，一般需要6~10月治疗才能恢复，患者往往因感染，出血使病情加重，有时危及生命，在治疗期间，患者及家属应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感染出血是提高疗效的关键所在。同时张主任还对缺铁性贫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慢粒、漫淋等病有深入的研究。几十年来，张主任成功地为全国各地患者解除了痛苦，使他们甩下了长期压在心头的包袱，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张主任携科室全体人员愿所有血液病患者早日康复：

来诊、来函邮购药物需具备以下资料：近期同髓象报告单，血常规单及病人目前自觉症状等。

路线．火车站乘6路汽车到东风路口下车，向西100米路南即到

电话：0371—3940704　　邮编：450002

放眼世界、革故鼎新的洪仁玕

● 邱远猷

历经艰苦，一心追奔太平天国

1822年2月20日，洪仁玕出生在官禄㘵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九年前即1814年1月1日出生在花县福源水村农民家庭的洪秀全（族名仁珅），是洪仁玕同高祖族兄，不久也迁到官禄㘵村来。两家血缘相亲，守望相助。

洪仁玕自幼读书。1836年初试不第；接着1839、1842年又两次科考都名落孙山。没奈何，1843年在家乡权充塾师。洪仁玕困于场屋，怀才不遇的不幸遭遇，与洪秀全基本相同。再加上，他们"巷里相接，长年交游起居"，情谊深厚。这年，洪秀全读《劝世良言》，倡拜上帝，他和冯云山是最早的信徒。洪仁玕跟着洪秀全，将塾中和家中的偶象和孔子牌位除去，以示与凡间妖魔彻底决裂。两人砸了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砸了自己的教席饭碗。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经过长时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成功地发动了武装反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仁玕闻讯，异常振奋，决定前往参加，当他赶到广西浔州时，太平军已转移他去。由于清军封锁甚严，他只得折回花县。1852年，天王洪秀全派江隆昌回粤。江隆昌在谷岭与当地贫苦农民策划反清起义，洪仁玕积极参与。后起义失败，逃奔途中，幸得一位长者接纳庇护，并引导他于1852年4月转逃到香港，介绍给瑞典人巴色会教士韩山文。

洪仁玕在香港，举目无亲，难以谋生，不久乔装潜回广东东莞县牛眠铺好友张彩家，改名易姓，担任塾师一年多。

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去香港，在西洋牧师处一面任教，一面自学，并接受韩山文洗礼。但他身系香港，心向太平天国。当他知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后，1854年春，由韩山文资助路费，从香港乘船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去南京。可是，当时上海县城为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城外被清军围困，难以前往天京。起义军首领刘丽川又不敢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于是，滞留上海"夷馆"的洪仁玕只好重返香港。

在香港，他留心阅读西方书刊，并通过与之"相善"的20名欧美人士的交往，悉心研究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制等资本主义国家若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探索西方大国富强之故。四年来遂使他成为当时最熟悉西方、了解世界形势的中国人之一。

1858年6月，洪仁玕得到西人资助银币百元，再次离港，备历艰辛，终于1859年4月22日经陆路到达天京。

封王受印，总理朝政

洪仁玕到天京，已是"天京事变"后的第三年。东王杨秀清被杀，北王韦昌辉被处死，冀王石达开负气出走，远征西南。天王又猜忌异姓，重用两个胞兄仁发、仁达。"朝中无将，国内无人"。战场形势转入防御被动，正值艰难之际。天王洪秀全见到阔别多年的族弟，"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格外欢喜"。回顾自己身边，正缺少一位有能力的心腹重臣作为辅佐，决计"不避朝贵"，委以重任，希望洪仁玕能象当年冯云山那样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股肱天朝"，使太平天国有"中叶之兴"。不久，封洪仁玕"天义爵"兼"九门主将衔"。5月11日改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节制。

洪秀全对洪仁玕连加封典，使那些出生人死，战功卓著的将领。不免有"不服之色"，尤其是自恃劳苦功高的李秀成，曾情绪激动地批评天王"专信同姓之重"。一时在天京城内兴起轩然大波。

洪仁玕面对天王的这一殊封，虽铭感五中，但又恐"将心不服"，不禁发出"葛尊而关（羽）、张（飞）不悦，韩信拜将一军皆惊"的慨叹。为避免因个人进退荣辱而影响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洪仁屡次上表辞让，

袒露自己澹泊名利和光明磊落的心迹。但是，天王不许，竭力支持，他向洪仁玕说："风浪暂腾久自息"。

天王洪秀全为树立洪仁玕的威望，排除百官疑难，特决定为洪仁玕举行"登台委印"仪式。

仪式在天王宫外的"天台"(天王生日、令节、敬天礼拜之所)举行。这天，天王率领洪仁玕等人从王宫出来缓缓走上"天台"。天王令洪仁玕"登台委印"。天王对在场的文武百官发布诏旨，正式宣本封洪仁玕为"开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下令今后天朝凡"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陈玉成)"。接着郑重地将干王大印授予洪仁玕。洪仁玕心潮彭湃，当场发表政见，即席回答官员们的提问，还榜示其一月来所审批的太平天国前期文件。讲者，侃侃而谈，说理透辟；听者，频频点头，钦佩不已。后有人写诗记述当时干王议论风发，万人折服的景情说：

"何物狂且负盛名，登台通使一军惊"。

同时，天王为了进一步安定功臣宿将的情绪和振奋其进取精神，除晋封陈玉成为英王外，又晋封李秀成为忠王。从而形成和加强了新的领导核心。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被誉之为太平天国后期"三杰"。

"革故鼎新"学习西方先进国家

洪仁玕当时担任军师，总理朝纲，可谓"奉命于危难之间，委任于败军之际"，但他抱定"宁捐躯以报国，不隐忍以偷生"的决心和态度，决计引进他在香港期间了解到和学习到的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效法西方，全面改革天国的军政、经济、法制、文教等制度，从而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理想国家。经过深思熟虑，洪仁玕于1859年写就《资政新篇》，上奏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多数表示赞同，"旨准"刊刻颁行。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施政大纲。同年，洪仁玕还以军师、干王名义为重建太平天国体制而向全国颁发《立法制谊谕》文告；为教育太平天国军民以"谊谕"形式颁行《克敌诱惑论》。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立法制谊谕》等文件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效法西方、改造天国的主张。

在军政方面，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严禁"朋党之弊"和"秘门请谒"，加强团结。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后，天国政局动乱，"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为洪秀全、洪仁发、洪仁达三兄弟集团把持；朝外统兵将领拥兵自重，各有体系，"弱本强末"、内轻外重之势形成。

针对这种情况，洪仁玕主张加强太平天国的统一领导，"自大至小，自上而下，权归于一"。严禁"逆命"、"弄兵"，自树"党羽"，"僭越"违制，卖官鬻爵。克服"朋党之弊"的权宜之计是"潜消其党"，即暗中瓦解党羽；长远之策却在"富国强兵"，如果"又有朝发夕至之大轮火车，又有新闻篇(报纸)以泄奸谋，纵有一切诡弊，难逃太阳之照矣"。反对"私门请谒"，要求子臣弟友，应当奋力上进，切不可利用父兄朋友的权势，采取不正当手段钻营仕途，贪赃枉法，倘有违反以上规定，立即"明正典刑，传示各处"。

他又遵从"将相和则国安"的古训和原则，提出"师克在和"、加强团结的主张。他证引"廉蔺相合而秦有十五年不能出函谷关"的典型历史事例，来说明"将相和"对战争胜负，国势安危的重要性。他从顾全天国大局出发，主动去搞好同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人之间的关系，并发挥"调和鼎鼐"的宰辅职能，调停忠王与英王之间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上述主张的提出与实施，使1856年天京事变后的政局有很大改观，领导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大大缓解，李秀成在公开场合说·干王是我天国"朝纲之领袖"；洪仁玕则常夸："我军在疆场上有两个好首领，即英、忠二王是也。"加强中央集权和团结，使得天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转机形势，取得了1860年"防御中的攻势"的军事胜利。

在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促进和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使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他主张发展近代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提出要兴建联络全国各省的21条铁路，"以为全国之脉络"。又辅之以郡、县、乡公路，"通车马之利"。又"兴舟楫之利"，疏通黄河、江淮水道，既以防凶旱水溢，又便利水陆交通。国家要设立邮亭，"以通朝廷文书"，允准"富民"于每隔20里设立一个书信馆，"以通各地家书"。

他奖励开采金、银、铜、铁、煤、琥珀、玻璃、美石等矿，和制盐、采蠔壳等事业。准允私人投资开办，允许采取雇佣劳动制度。"总领""招民采取"，所获利润，按下列比例分配：总领获20%，国库获20%，采者获60%。

他主张奖励科技发明创造，实行专利保护。他认为火车、轮船、电火表、千里镜以及其他种仪表的功能，乃是"正正堂堂之技"，绝非什么"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是"永古可行者也"。要人们把科技当"中宝"一样珍贵。有能造"精奇利便"的"器皿技艺"者，准予专利，"器小者赏五年，大者赏十年"，"限满准他人仿做"。

他鼓励兴办银行和保险事业。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兴办银行，发行"银币"即纸币。也准许"三四富民共请立"。他介绍保险事业的好处说："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己不致尽亏。"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张"度势行法"，采行西法，使中国法律走上近代化道路。他对天京事变后法制松驰，国势日衰，深为忧虑。他深感没有法制或法制废驰，太平天国是难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他"痛绝言之"："国家以法制为先，……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他认为这不仅是一条历史规律，而尤其是当时"万不容已之急务"。

他说："治国必先立国"，而立政的关键，在于"设

法、用人”是否得当:“用人不当,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

他极力推崇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邦法”,指出其富强的原因是由于他们的“纲常大典、教养大法”优越,“国法宏深”。

为了做到“立法妥当”以及保证“立法”的“遵行”,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国家官员必须严肃“认真”,奉公守法,以身作则。只有“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奉行天法”要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对破坏法制的人,“无论其高官王位”,一定要“明正典刑”,直至“律以大辟”(即死刑)。建立类似近代监察、检查机构的“新闻官”制度,新闻官“不受众官节制”,其任务是专门收集各种报纸呈缴中央,了解各项兴革大法的实施情况,检查各级政府官员的忠奸善恶。

在文卫习俗方面:主张改革文化教育制度,兴办卫生事业,慈善事业,革除陈规陋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兵强国富,德厚风淳”的美好社会。

他主张中国应开办“学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新闻事业,但规定新闻必须真实,“勿着一字浮文”。对待文化遗产,他认为“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但反对骄奢之习。他主张禁止溺婴,买卖人口和使用奴婢。他主张严禁鸦片,禁革传统迷信。革除男子留长指甲、女子缠足,养鸟斗蟀,打鹌赛胜,浮华装饰等奢靡习俗。他主张兴办医院、盲人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设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

在对外关系方面:针对天国前期昧于世界形势,以“天朝上国”自居、“拘拘不与人交接”的闭关态度,主张实行独立、平等、互相贸易的外交政策。

他认为中外国交往势所必然,同外国交往应该和好、亲善,在平等的原则之下进行。“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谈也。”他认为这些“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

洪仁玕满怀激情和信心十足地希望通过上述“革故鼎新”与学习西方,第一步使天国赢得“驱逐胡虏,宰治中原”的胜利;第二步进而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能够成为“东洋之冠冕”,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

洪仁玕革故鼎新的种种倡议,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之中提出的,其具体实施受到敌我形势的严重制约。1859年冬到1860年春,天国都城天京遭到清军围困,形势相当危急。太平军除李秀成部驻防浦口,距天京较近外,其余各部主力都在远地与清军作战。洪仁玕提出效法战国时代“围魏救赵”之策,攻敌必救之苏杭,把久困天京的清军主力吸引东下,然后出其不意,迅速回师,集中太平军各路主力,乘虚击破包围天京清军的江南大营。这一妙计使对其常有微词的忠王李秀成也大为折服,俩人接连三次详细商讨作战方案,并于1860年1月28日得到天王洪秀全的批准。由于计策万全,各路大军协同作战,自1853年起钉在天京城外的清军江南大营终被拔掉。太平军经此一战,军威大震。

1860年5月11日,在一片欢庆声中,太平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天京会议,讨论下一步进取良策。在李秀成的支持下,洪仁玕又确定了经营江浙,西取武昌的战略:先夺取苏杭、上海一带富饶之区,然后兵分三路,水陆并进,西取武昌。攻取苏杭的目标,由于李秀成、陈玉成协力配合,很快占领了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但在进攻上海时,竟遭到外国侵略者的干涉而受阻。洪仁玕曾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但均告失败,东取上海的目标未能实现。

洪仁玕西取武昌的计划,虽从1860年9月就开始了,由于李秀成没有很好配合等原因,结果半途而废。安庆于是告急。当时,天京无兵可派,其他将领在皖南、浙江一带与清军作战。1861年2月,洪秀全命洪仁玕赴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催调各路太平军驰援安徽。

洪仁玕自长江水道上溯,经安徽太平、芜湖,后陆路南下,军次宁国;4月上旬抵浙江遂安、淳安,经皖南折回天京。他风尘仆仆回到天京,板凳还未坐热,又受命援师解救安庆之围。但毕竟他是个“生长儒门,原非素习征战”的军师,结果都为敌人所阻而失败。9月,安庆终于失守。天王震怒,借口将洪仁玕革职除爵,只让他管理外交事务。1862年上半年,他又因处理一件外交事务,“令天王不悦”,外交兼职也被革去。洪仁玕失宠了,不久,天国政局很快发生严重变化。改革措施也因触犯权贵宠臣利益,横遭责难,而天王又“不听人言”,结果一切改革之尝试都随之烟消云散。

1863年11月底,清军将天京三面合围,太平天国覆灭的命运即在眼前。这时,洪仁玕突然接到天王洪秀全预留的托孤遗诏。他毅然担任起扶佑幼天王洪天贵福的顾命重任。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幼天王在忠王李秀成保护下突围出去。7月22日,李秀成被俘。幼天王等一行至江苏高淳东坝,洪仁玕遂迎幼天王到广德会合。他们一起转战皖、浙边界,后人江西,最后兵败。幼天王遇害。10月9日,洪仁玕在江西石城被清军俘获,旋即解往南昌。在敌人的牢笼里,洪仁玕表现了一个革命的崇高气节。他通过亲笔“供词”和回答敌人的讯问,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得失。他表示自己钦敬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说:“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而)已。”他还英勇不屈地说:“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1864年11月23日,清军将他凌迟处死。英勇就义前,他还吟绝命诗一首,其最后4句是:

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
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

(责任编辑:木易)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

审议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议工作报告；

推选第二届理事会领导人，萧克任第一会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于6月7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萧克、费孝通、程思远、雷洁琼等出席，与会顾问、名誉理事、理事达三百人。薄一波通过秘书转达对全体顾问、名誉理事、理事的问候，并祝会议圆满结束。李政道特地从纽约来电，表示祝贺。

萧克、费孝通、程思远首先讲话（全文见本期2—3页）。大会进行的第一项议程，由李宝光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议作工作报告。

《报告》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总结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说，“至今七年多的历程中，我会和各省、市、各专业二十多个团体会员一起，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遵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贡献’的宗旨，积极开展工作，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影响日益扩大，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接着《报告》分七个方面列叙七年来的工作成绩，包括举办一系列水平较高的学术讨论会；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和其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书籍；出版《炎黄春秋》杂志；围绕一些重要纪念日，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等。

《报告》谈到了七年多工作体会。第一，谈到“研究、弘扬炎黄文化的立足点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爱国主义大团结”。报告说：“炎黄文化是以炎帝、黄帝为代表，包括蚩尤等众多氏族、部落领袖，带领广大先民共同肇始的。他们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辛勤劳作，自强不息，有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其中，炎帝、黄帝的功绩尤为卓著，为世代传颂，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经过长期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为以后华夏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社会前进，创造了光耀千秋的东方文明。我们说的炎黄文化，就是以炎帝、黄帝为象征，多元互补、历史悠久、绵延至今的中华民族文化。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炎黄文化以其深厚的内涵和恢宏的气势，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振兴，对于我们祖国统一的巩固和加强，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炎黄文化是历史形成、无比珍贵、坚不可摧的精神纽带。长期以来，它把祖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澳门同胞以及远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联结起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习惯以炎黄子孙自称，并以此自尊、自豪。事实充分说明，人们早已超越了血缘关系的界定，而立足于以炎黄为象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认同与发扬。”第二，谈到“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是为了面向21世纪，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报告》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采，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进步起着巨大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对世界文化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也和其它各民族、各国家的传统文化一样，既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精华部分；也有必须剔除和批判的腐朽落后的内容。即使是那些有益的成份，也要跟随时代的前进，不断改革创新。文化上的不断创新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丰厚的文化遗产是包袱还是财富，取决于人们的态度。我们要记取历史上中国曾经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文明进步而被动挨打的沉痛教训，避免重犯自满封闭的错误。要使炎黄文化跟随时代的步伐，有所前进，有所发展。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吸取世界各民族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凡是一切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文明进步的先进文化，我们都应当虚心地学习，认真地吸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丰富和提高我们自己，以便更好地在丰厚的文化基础上不断创新。……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这

理事会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通过修改后的本会章程；

费孝通、程思远任会长

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报告》在最后一部分谈到“近期工作的建议”时，特别强调：“在这二十一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的重要时刻，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时代已初见端倪，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更需要文化上的快步前进和创新。我们如何抓住机遇，谱写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篇章，是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的起跑中能否掌握历史主动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作为全国性的社团，也要站在历史走向和未来发展的高度，来思考和安排自己的工作。”“我们计划以‘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作为中心课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力求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会议的第二项和第三项议程是由冯征作修改《章程》的说明、杜导正宣读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议关于第二届理事会组织人事的建议。在全体理事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章程和推选了第二届理事会领导人（名单见后）之后，会议主持人庄炎林宣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圆满结束！

李政道致贺电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值此第二届理事会开会之际，我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

多年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赞扬。第二届理事会将会使之更加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炎黄子孙更加广泛继承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迎接更美好的新世纪的到来。

我因在纽约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参加六月七日的会，深表歉意。请予原谅。

李政道

一九九八年六月四日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领导人

名誉会长 薄一波 李政道（美籍）
杨振宁（美籍）

第一会长 萧 克

会 长 费孝通 程思远

副 会 长 庄炎林 黑伯理 李宝光（女）
姜思毅 冯 征 杜导正
温济泽 魏 巍 戴 逸
金冲及 冯其庸 李学勤
周干峙 杜子端 欧 初
张 锲 何光玮 于友先
张岂之 汤一介 王国忠
刘 源 吉瑞芝（女） 王仁民
戴治国 吴 塘 宋文茂
鲁 谆 张国琦 王国威

常务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友先 王仁民 王国忠
王国威 王科元 冯 征
冯其庸 刘 源 庄炎林
汤一介 吉瑞芝（女） 杜子端
杜导正 李学勤 李宝光（女）
李耐因 宋文茂 吴 塘
何光玮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 初 金冲及
周干峙 费孝通 姜思毅
萧 克 鲁 谆 温济泽
程思远 黑伯理 魏 巍
戴 逸 戴治国

- 会议主持人庄炎林
- 李宝光代表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议作工作报告
- 冯征作修改章程的发言
- 杜导正宣读第一届理事会常务会议关于第二届理事会组织人事建议
- 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各省市与会代表座谈会

炎黄春秋

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会见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

“文革”中郭沫若与孙辈们在一起

周恩来赴沪迎接李宗仁

孔宋违法结购外汇案五十年后曝光

说“我前世一定是中国人”的泰戈尔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劫难

矢志让聋人回到“有声世界”

ISSN 1003-1170
07>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